

行國
黃惠平譯

恐怖主義與

共產主義

于右任



初版序言

考次基

差不多一年以前，這件工作已經開始了；旋因十一月九日的革命而被中斷。這次的革命，使我忙於其他的實際工作，無暇作理論與歷史的研究。許多月以後，始能繼續這件工作，而中間又曾屢次中斷，幸而卒底於成。

環境的變更，有些地方不利於這種敘述的統一性；中間又因為論題發生些微變更，更增加了不少的困難。今日社會主義的中心問題，與社會民主黨對於鮑爾塞維克底策略之態度，即為構成我之出發點的重心。因為鮑爾塞維克好以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相標榜，且自承係其繼承者，馬克司亦以此為革命的模範。但是巴黎公社的事蹟，我們這一代的人，知者甚少；所以我想把巴黎公社與蘇維埃作一個平行的比較。

為澈底了解公社的內容起見，我不得不追溯第一巴黎公社法國大革命與其恐怖政治的事蹟。因此對於蘇維埃共和國又發現一個新的平行比較，並附帶將法國恐怖統治的根原，及其成果探討一番，藉明公社的真相。

所以在這本書內，有兩種思路，互相淆混，有時且互相牽制。我自己感覺得十分麻煩，

想把這件工作，分爲兩部分。一部分專於說明公社，一部分專於討論法國的恐怖主義。然而爲顧及蘇維埃共和國，與上言兩種現象的密切連帶關係；這個出發點起見，若將其分別研究，又似乎不可能。我希望我能夠排除因這個問題的雙重性質所發生的困難，保存這個思想樹立上的統一性。

在這本書內，雖然有許多地方，似乎對於讀者太深奧了一點。但是都爲重要的紀錄。處於今日如此極端混亂的時代，又無其他的可能。這自然不是說我要把真理犧牲求其適合目前的需要。卻是我到處祇把對於我們目前認爲緊迫的方面，特別提出；現在追溯狼遠的過去的事蹟，亦復如是。

我們祇要觀察俄國與德國的紛擾，我們目前所看得見的，確是一個狠不愉快的世界，充滿了互相殘殺的空氣，與經濟破產的危機。

假使我們整個地將國際情形觀察一番，前途似不如此黯淡，而有一線之曙光。西歐的工人已經抬起頭來了，吾人是否能採用合理的策略，獲得較之東方更大的效果，全繫於西歐工人階級之覺悟。

爲完成此項使命起見，西歐工人必須於東方的錯誤中，吸收有益的教訓；尤須認識各種

鬥爭的方法，建設的方法與其結果。

處於今日革命潮流高漲，與社會黨各派在理論上策略上的鬥爭極其劇烈的時代，我們不應當盲目地讚美革命的陳舊策略，我們亟須加以嚴格的批評。蓋革命的成功，並非全繫於無產階級是否同情這個合理的策理。

重行審查我們的策略，是吾人今日最大的使命。這本書底目的，就是要援助這件審查的工作，完成革命的使命。

一九一九，復爾登堡。

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

我翻譯這本書的動機

黃惠平

幾年以來，因為忙於革命的實際工作，沒有餘暇，從事革命理論與歷史的探討。去年秋間，應中央大學商學院之聘，講授黨義，本想藉此機會將個人幾年來的經驗，與個人對於中國這次革命運動的觀察，加以系統的敘述，藉與全國的革命同志作公開的討論。草稿初成示諸黨內少數同志，均以發表時機過早，徒增革命過程中之紛擾。不久即發生廣州八月十九日之巨變。共產黨殺人放火，時論目之為有主義的有組織的張獻忠，或呼之為『共匪』，然鮮有在理論上指摘其原則與策略之錯誤者，大多數共黨青年。又至死不悟誤以共黨殺人放火的策略，是最徹底的最勇敢的革命行動；自陷於革命的叛逆而不自知。我於是決心將前面所說的那件工作，暫時擱置一邊，着手這部著作的翻譯，一方想藉此顯示共黨殺人放火的真相，及其策略的錯誤，並暴露共黨理論上的錯誤，一方藉以提醒全黨的同志，不要重蹈法國革命，俄國大革命的覆轍，發生不可救藥的錯誤行動。使中國的革命運動功敗垂成延長民衆的痛苦，變為革命的罪人。

上面所說的話，僅將我翻譯這本書的動機。加以概括的說明，自不能包括全部，我打算

在下面分條的解釋。但有幾點容易惹起誤會的地方，須在此處預先聲明的！

1, 考茨基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家，是一個全世界著名的馬克司主義學者。同時是一個議會政策（戰略）的主張者。考氏是一個西方的學者。生於西歐，習聞民主政治與議會制度主張無產階級的革命，可以由議會政策的策略完成其歷史的使命。原有其思想的背景，與相當的理由，以中國民衆今日無組織的狀態與夫缺乏民主政治的訓練。我絕對不相信西歐的代議制，可以完成社會革命的使命，以中國民族現在的民族性與其經濟背景，我尤其不敢相信鮑爾塞維克的策略，與蘇維埃制度可以完成解放中國民衆的革命大業。

2, 考茨基反對鮑爾塞維克的策略，是站在唯物史觀的立場。我們反對共產黨是立在三民主義的立場。我雖然不相信唯物史觀是絕對的永久的唯一真理。但在今日社會科學的範圍以內，我卻相信唯物的歷史解釋，是解釋人類歷史比較正確的解釋。若有人犯思想的幼稚病，把唯物史觀認爲共產黨的專利品，或認爲是馬克司坐在書齋中製造出來的理論，作爲我共產黨的證據祇得聽之而已。

3, 考茨基是一個反對直接行動的社會主義者。在這一點上，我是一個不能完全同情考茨基主張的人。我雖然不相信直接行動，與武裝暴動，是隨時隨地可以收效的革命策略。但是

東方的民族革命，不是像考茨基所謂純無產階級的革命。所以我認定革命黨的直接行動，是奪取政權，摧毀反動勢力的必需手段，至於共產黨那樣幼稚的暴動策略，決不是革命的策略，乃是急進的政治投機。

幾點容易被人誤解的地方聲明以後，我現在開始來把我的全部動機加以分段的說明。

1, 共產黨誘騙民衆專幹殺人放火的勾當，並不見得完全是共產黨中央的決議(?)。或共產黨領袖的音旨(?)乃是由一個錯誤原則出發的錯誤策略的必然結果，流氓無產階級祇能做急進政治投機的基礎決無能力完成社會革命的歷史使命，關於這一點，考茨基在這本書上說得最透澈最詳盡，可以爲中國幼稚的馬克司主義者當頭一棒。

2, 中國這次的革命運動，必然的是小資產階級與農工階級自求政治解放與經濟解放的運動。欲求保障中國革命的勝利，必須鞏固小資產階級與農工羣衆的革命組織，而中國國民黨是適合這個歷史使命的革命黨。若在中國國民黨的立場以外去尋革命的出路，是使中國的革命運動陷於絕地，促成反動勢力的復活，或以少數人的專政誤認爲黨的專政，專以壓迫手段摧殘逮捕黨內思想急進的同志，我敢武斷說一句，結果一定會使中國這個革命的運動慘遭失敗的命運。第一巴黎公社失敗的慘史，就是我們的榜樣。這本書所代表的思想，可以糾正這

種的錯誤行動。

3, 法蘭西的大革命, 俄羅新的大革命, 無論山岳黨怎樣殘酷, 鮑爾塞維克如何橫暴, 但是這兩次轉移人類歷史的兩大時期之偉大的意義, 是一個負社會改造重責的革命黨人, 不能輕輕放過的。中國近來所有的革命文獻, 雖然也時常看見關於巴黎公社事蹟的零篇碎簡, 但是絕少有系統的敘述, 西歐革命文獻中研究巴黎公社的。除了克魯泡特金所著的『法國大革命』一書以外, (就我所知道的說,)要推這本書為最詳盡了。

我在此處祇能很簡單地說明我翻譯這本書的動機, 因為我還打算應用這本書所含的理論與史實(假使為時間所許的話)陸續發表我底一知半解的主張, 與全黨同志作公開的商榷。

末後還須附帶聲明二點:

一, 這件譯述工作, 是我底處女翻譯, 自然有許多錯誤的地方, 我希望將來有發行二版補充修正的機會。

二, 這件譯述工作的完成, 我不得不感謝我的夫人張晴川女士。與上海法政大學同事陳彬和先生蔣國珍先生的援助。

一九二八, 二月二號。 金神父路

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

內容

著者序言

譯者序言

1, 革命與恐怖

2, 巴黎

3, 大革命

4, 第一巴黎公社

A, 巴黎無產階級與其鬥爭手段

B, 恐怖政治發生的原因

C, 恐怖政治的失敗

5, 恐怖政治的遺傳性

6, 第二巴黎公社

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

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

A, 公社的起原

B, 工人評議會與中央委員會

C, 公社中的雅各賓派

D, 公社中的國際主義派

E, 公社底社會主義

F, 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

G, 公社中的恐怖思想

7, 習俗的溫和

A, 野蠻與人道

B, 兩個趨勢

C, 暴行與恐怖統治

D, 十九世紀中習俗的溫和

E, 戰爭的影響

8, 共產黨的工作

- A, 充公與組織
- B, 無產階級的成熟
- C, 狄克推多 (Diktatur)
- D, 腐化
- E, 鮑爾塞維克的變化
- F, 恐怖
- G, 蘇維埃共和國的將來
- H, 世界革命的將來

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

續

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

1、革命與恐怖

歐戰以前，許多社會民主黨人，一致認定不祇是歐洲革命的時代已成過去；即是德奧兩國革命的時期，亦為陳話。誰要反對這種見解，就會被譏為革命的幻想家。

然而革命還是出乎吾人意料之外，居然降臨了！而且出之以極野蠻的，為一個大膽的革命幻想家所不敢期望的方式。

廢止死刑，是一切社會民主黨人自然的要求

但是革命的結果，竟發生了極殘酷的恐怖政治；而且為一個號稱社會主義的政府所施行。俄國鮑爾塞維克今日正在努力奉行；他們拿革命的利益這個口號辯護他們的殘暴行為。

在事實上，確有一種普遍的見解；以為恐怖手段，是革命的本質。凡抱有革命決心的人，即必須承認恐怖手段的必要；而且這種見解，常以法國大革命時代的事實作為有力的證據。好像法國的大革命即為一切革命的榜樣一般。

所以我們要研究恐怖政治的條件及其影響，最好先從研究短褲黨，(Sansculotte)(1)的恐

怖政治下手。這雖然離開現在的時代太遠；但是這種研究方法，卻能使我們得着許多有益的教訓。最足使吾們驚奇的事實，就是法國大革命時代的事蹟，竟有許多與近代的革命，尤其是俄國的革命完全相同的地方。

從另一方面來看，現代的革命亦有許多與十八世紀的革命完全不同的地方。我們祇要把現代的無產階級與實業狀況，交通器具，與那個時代的現象一相比較，就容易明瞭了。

(註一) Sansculotte 短褲黨(法國初次革命時代之共和黨人)或譯為激烈革命黨與急進共和黨

2、巴黎

一九一八年的德國革命缺少一個中心策源地，而一七八九年的法國革命則以巴黎為策源地。我們若不能了解巴黎在經濟上政治上對於法蘭西的意義，就不能明瞭這次革命與其恐怖統治的真義。在十八與十九兩世紀中，沒有一個城市像巴黎那樣有威權。這自然與宮庭所在地，及近代集權國家的都會所在地，有連帶的關係；假使不因交通發達與資本主義的發展發生經濟分權的傾向。

在一個封建國家以內，中樞的權勢與帝王的威權自然很少；政府機能的范围甚為狹隘，

政府機關的組織也非常簡單。因此政府機關容易從這一個城堡遷移到另一個城堡。並且因為交通的阻塞，城市的貧困，不能長久維持帝王的護從；帝王亦常受環境的壓迫，親身遊行全國各城市，藉以增進其人民之信仰與服從心。所以在那個時代，帝王亦如遊牧者一樣，到處尋覓肥沃的草原；到了無可再獲的時候，他就率領其隨從離開此地了。

時過境遷，政治組織亦隨商品生產的發達，與貨幣經濟的出現，而日趨複雜。政府徵諸人民的稅收，亦漸漸的以便於運送的貨幣，代替那笨重而不便運送與保存的天產品。因此帝王的權勢增加不少，同時，政治組織漸變為官僚化的政治，國家亦開始設立常備軍隊；從前那樣遊牧的現象當然隨之而消滅了。從此以後，政治的中心點，常常在一個交通便利商業繁盛的城市，或在一個國家的中心點。這樣的城市，當然比較其他城市日趨於富庶與繁華。並且因為帝王常選擇此等城市為其駐驛地，無形中使這個城市變為一國的首都。於是凡是與一國政治有關係的事務，以及全國的稅收，都集中在這個都會。祇有一小部分的稅金，仍流回各地，而製造物品供給政府與朝廷需要的企業家，包辦租稅的金融家銀行家，均應運而興集居於首都。

同時，帝王已不復容忍貴族獨立專橫，於是極力設法打破其特權，並不許其仍留居其固

有的宮庭以內。他們應當在帝王監視之下，服侍皇朝；他們在地方上的行政特權，亦被取消，且已由皇帝所任命與養的官吏，代替其機能了。所有的貴族，差不多變成了無所事事的專知化費其土地上的收入，貪圖逸安的閒人。所以鄉村的財富愈益集中於都會。他們這些貴族，更利用土地的收入，在都會中建築偉麗的宮庭，度那奢侈縱慾的生活。就是那些同儕應運而興的資本家，也把投機事業與剝削他人獲來的金錢，模仿有錢有勢的貴族營逐奢華的生活了。

此種現象，自然引起鄉村與都會的衝突。都會這個地方現在不祇是一國財富的聚積處，且爲一國奢華生活的中心。對於鄉村當然具有無限的吸引力。就是對於外國喜歡遊蕩的貴族資本家，亦發生同樣的吸引力，便之將其財富耗費於這個都會之中。

貴族當中束身自愛奮發有爲的份子，又被皇朝所吸收以加重用了；於是那些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貴族，除了宴會酣飲遊獵以外，沒有別的理想。因此在都會中產生一種高尚的習俗與遊藝，並產生一種藝術上的濃厚興趣；獎勵科學上的發明，變成爲一般的時髦。因此全國藝術家，與其有學識之士，亦羣集於都會；因爲在這裏可以獲得較好的榮譽與賞鑑。資產階級愈強一天，著作家與藝術家愈容易出售其作品。所以資產階級與貴族在那一個時代，成

爲藝術家著作家底作品惟一的主顧者。

爲滿足各種需要起見，都會更容易吸收許多實業家，商品貿易家。人們尋求幸運的機會，沒有別處比都會希望更大。這自然會使一般有魄力有體力並富於自信力的人，皆由田間來到都會，尋求他們的幸福，發展他們的才智了。

這自然不能使每個人都達到原來的希望。也有許多人生活落伍墮爲失業無產階級，仍在都會中力謀自己的生路形成都市的特色。因爲在都市生活的人，各人幸運的變化，希望較多且易於利用機會改變自己的命運，有如 *Ricaut de La Marinière* (1) 所描寫的窮人一樣

(註) *Ricaut de La Marinière*

不僅藝術與科學的發達當都市生活的特色，極端的縱慾主義，悲慘的質困，犯罪的繁夥，亦爲都市最鮮著的特色。

這一類事實的社會特性，當然與其居民精神上的特性，適相啗合。卻不是一切都市都是如此，在這裏有時質的增加亦變爲量的擴大。

在一個小國或經濟落後的國家，重要的都市都是區域極少的城堡。前面所說的那些都市特質，當然不大十分顯著。在這樣一個都市以內，在政治上在經濟上暨在思想上，居民與宮

廷的關係完全是一種隸屬的關係，並富有粗魯幼稚的傾軋。這自然影響到鄉間的居民，因為他們以生活都市中的同胞爲其思想的領導者。

德國那種根深蒂固的帝王思想，與其小國分立的政治狀態，可以證明前面所說的話。就是在民主思想極發達的時代，一班爲民主思想而奮鬥的勇士亦驚奇保皇思想牢不可拔的勢力。這種現象，柏賴 Borne 亦曾失望地大叫：「德人是侍僕，其他民族是奴隸。」這種思想海涅 (Heine 德國大詩人) 曾用下面的語句嘲笑過：

「德意志，一間溫和的兒童室，

不是羅馬的暗殺場。」

在一個大都會裏，思想方面可以發生不同的傾向。都會愈大，宮庭內的人數與留居都會尋求幸運者的人數之比例當然較少，而發生的影響自亦隨之而弱。所以失意者與失望者的人數愈增，他們的力量愈益擴大。這種現象不但給這些失意者以無窮的勇氣，且亦可促起那班對於社會弊害認識清楚而自身並無失意之事的人一種反抗起來。這種反抗，到處可以發現。不過在微小的都會裏，這種勢力是一種潛匿的勢力。而在大的都會裏，有時容易表現出來了

十七世紀與十八世紀當中，歐洲大陸的大都會，當然首推巴黎，並且也是那是歐洲最強大的國家底首都。在十八世紀之末，巴黎已有六十萬人口。威馬（Weimar）在那個時代，可以說是德國的文化中心，然而的只有十萬人口左右。

巴黎的居民，素來富於反抗的精神。例如參加一六四八年 Fronde 的大運動。這個大運動起原於國會與政府之爭，巴黎城內四處建起戰壕攻擊政府，一六四九年國王僅以身免。同年英皇伽爾第一（Rari）也被人民推上斷頭台了。這個爭鬥，一直延到一六五二年，結局還是因君主的讓步而得到和平。但是這種讓步，不久他又從新鞏固專制政治的基礎。最足使人驚奇的一點，就是在這個鬥爭當中，大貴族竟為首都市民的同盟者。因為大貴族要反對君主，捨此以外更無其他有效率的方法。所以巴黎居民反抗魯得斐 Ludvig，並沒有像倫敦居民反抗伽爾（Rari），遇到那樣的障礙。

Fronde 鬥爭的發動，是在魯得斐十四（Ludvig XIV）的青年時代。所以巴黎人民的暴動，與他自己的逃亡，給他一種很深刻的印象。剝後他為預先防止發生同樣的事變起見，他把皇宮移出巴黎，又因政府的所在地不便移動。所以他選擇一個與巴黎相距不遠，却不致為巴黎的叛變直接波及的地點，做他的皇宮所在地，這就是全世界著名的距巴黎何止十八克羅米

突遠的凡爾塞（Versaille）。一六七二年，他開始在凡爾塞建築壯麗的皇宮，花費法國人民數萬萬的佛朗。在以後諸世紀中，確有幾次證明凡爾塞形成了革命的巴黎一道有力的防禦線。

巴黎人民對於中央集權制度的國家，雖然抱堅決的反對態度，却是他對於國家的地位，並不完全一致。一方面，巴黎要求脫離中央政府的羈絆；他方面，巴黎的富庶與勢力，又建築在法蘭西廣大的領土與中央集權的國家上面。所以巴黎一方要求地方分治，一方却從中央集權這個制度上面獲得許多的利益

十八世紀以降，法蘭西將征服的省區形成一個統一的國家，惟一的結果，造成了巴黎優越的地位。勞爾薩斯省人民（Lousier）怎樣會同布雷唐人，（Bretoncu）佛來曼人（Flamen Von Dunkirchen）怎樣會與加斯可格來人（Gasconner）結合；全賴這些地方與巴黎都有文化的經濟的關係。這些地方的優秀子弟，或在巴黎求學，或在巴黎營商，無形中使他們發生一種民族感覺和意識。巴黎一方是支持中央集權制度的堅強柱石，一方又是中央集權制的堅決反對者。這個矛盾的事實，完全反映在巴黎與各省的關係上面。在巴黎容易使人覺察全國的弊害與錯誤，而且容易有這種勇氣曝露這些弊端和錯誤，更容易獲得力量糾正這些弊端和錯誤。所以巴黎時常是全法蘭西受痛苦的人民的先驅。各省人民因為平日散居和文化落後的關

係，自然缺乏相當的勇氣和能力；他們視巴黎爲其先驅，爲其救星，所以他們時常拿神秘的精神服從巴黎的領導。

却不是完全如此。巴黎的富庶和能力，不祇是巴黎居民工作勤勞的結果；而擷取各省區人民勞動的剩餘價值，亦爲構成巴黎的富庶的要素。而此大部份流到巴黎之剩餘價值，一部分被人浪費於侈奢的生活，一部分作爲資本蓄集之母財。一部分且使剝削階級的富庶和能力因而激增。

因此巴黎一方爲各省人民信仰的中心，一方又爲仇恨的對象。在各樣不同的歷史進展上，有時信仰心戰勝仇恨心，而有時仇恨心却勝於信仰心。

這種經濟的衝突，因思想上習俗上的不同，愈加劇烈。在各省區與鄉村間的生產關係變動極緩，因此在思想上富於保守主義，不輕易放棄祖宗遺傳下來的見解和習俗。假使有人敢於破壞此種信念，就是社會的姦賊，即須受社會極嚴厲的制裁；因爲在一個鄉村或小城市之內，任何人都都在社會監視之下，不敢輕起反抗習俗的思想。但在一個大都會裏面，就沒有這樣的社會監視和制裁了，對於祖宗遺傳下來的習俗，不但可以大膽的批評，而且可以完全不受習俗的拘束，不論上流人物與下等人物都是如此。因爲所謂上流人物如貴族資本家之輩，

大抵都是習於驕奢的人物，他們那裏還能受遺傳習俗的束縛？所謂下流人物，又因其過度的貧困與其生活的飄流不定，斷無財產的拖累，又無家庭的牽掛，又何從死守那遺傳的習俗呢？這不用說，在所謂上流人物與下流人物中間有一道很寬的幸運鴻溝。而所謂知識階級，雖有機會接近貴族和資本家的生活，但是大多數也是無產階級一樣，感着過渡的貧困與生活的飄泊。

這自然不是驚奇的事，這些極端守舊的小鄉下人，會討厭那些無法無天的巴黎人，那些機巧的巴黎人，會輕視這些俗根十足的鄉下人。

不但道德觀念上是如此，就是在宗教信仰上亦發生同樣的衝突。鄉村的農民，根於那樣狹隘的視線，他們當然相信宣教師是惟一有知識的人物，祇有這班宣教師能拯救他們的愚昧，給他們以外界的新知識。至於這些宣教師的知識早已在科學的面前宣布破產的事實，在鄉村生活的人，當然沒有絲毫的印象，他們祇知道盲目地信仰教堂與教義，尊崇並守死從那裏得來的知識而已。但是對於巴黎人，宗教的信仰，教堂的財產與威權，却早已不佔任何重要的地位了。

在中古世紀，教堂雖然曾為孕育科學的地方。但是文藝復興以後，教堂對於科學上的貢

獻已退處無聲無臭的地位了。都會居民已不復視教堂爲真知識的傳播機關，而認爲傳播新知識的障礙物了。宗教家底思想家對於一切打破宗教迷信和權威的知識採取競爭的態度，想利用政權企圖壓制新知識的勃興就愈無忌憚；而新知識界則報之以極有力的精神武器，與澈底的探討態度。假使他們能夠獲得統治階級的同情援助，抑或中立，他們對於宗教的攻勢，就加倍的厲害。這些統治階級，不但輕視宗教遺傳的教義，且有時極端憎惡教堂，因爲天主教不肯無條件地降服於他們的統治機關之前，所以對於宗教的反抗，在那個時代沒有反抗專制政治的那樣危險，且爲一般人所歡迎。

話雖如此說，我們在此點也可發現一種矛盾。統治階級雖然是反對教堂。但是他們同時又覺得教堂是統治下層階級的良好工具。福祿特(Voltaire)曾經說過一句話“Ecraser l'infamie”[毀滅這些「教堂」]；但同時他又覺得宗教是下層人民必需的東西啊。

同樣的矛盾，我們也可從巴黎的下層階級與其思想代表者中間覺察出來。自然他們都是反對教堂的，並且不願人們提起宗教兩個字。但依無產階級的階級地位來說，在大體上他們都是富於急進的。從反對教堂的出發點來看，他們當中却有的是因爲信仰無神論與唯物主義，有的是因爲感覺到教堂是政府官吏與剝削階級利用的機關，而根本鄙棄的。這個信仰上的

衝突，換句話說有神論與無神論的衝突，一直到十九世紀才算告一段落。路易布朗（Louis Blanc）在其所著「法國革命史」內，尤與主張有神論的盧梭（Rousseaus）與魯柏士比爾（Robespierres）站在同一的觀點，反對服膺無神論的諦特羅（Diderot）與亞那夏里士（Anacharis Clouts）

「主張無神論者推崇人間的無秩序狀態

具以天國的無政府狀態為其前提。

於此路易布朗却忘記了天上與上帝對於無神詐者同樣的不存在呢。

所有這些衝突矛盾，一如階絕的衝突，會在一個大革命的爆發時期內掀起劇烈的爭鬥來

3、大革命

魯得斐十四（Ludwig XIV）畏懼巴黎人民反抗，將其皇宮移至凡爾塞，已如前面所述。

以後復將貴族最後的勢力，摧毀無餘，大了皇室的勢力，並且不惜向一切鄰國挑釁，以戰爭擴張王國的版圖，使法蘭西變為歐洲最強大的國家。這種不斷的戰爭，自然使法蘭西民窮財盡，目瀕危險之境。最後一次的戰爭，即所謂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從一七〇一年延長到

一七一四年，而結局仍無利於法國。假使法國當時已有革命的階級存在，早已引起一次大革命的風潮了。至於人民對於魯得斐的仇恨心，最好拿他一七一五年死時的情形作證：

「爲着節省時間與金錢起見，皇帝的葬祭儀仗甚爲簡單。巴黎的人民相信從壓迫中解放的日子到臨了。當他的棺材經過街市的時候，沿途的觀衆向皇棺痛罵，甚至有向之投擲穢物與石塊者。各省的人民亦歡聲雷動，四處舉行祈禱，慶祝人民脫離暴君的壓迫，並表示希望王位繼承人給法蘭西人民以和平，自由，減稅。」[M, philpen, Das Zeitalter Ludwigs XIV(518)]

法蘭西人民不幸得很，還要在大革命潮流中將自己命運的支配權拿到自己手裏以前，尤須遭受一次悲慘的教訓。

滿目瘡痍的法國，尙未完全復元，新的戰爭又繼之而起。如一七三三—三五年因波蘭與勞德林根 (Lotharingens) 問題的爭執，法國又與奧國開釁；一七四〇—四八年因參加奧國王位繼承戰爭，又與普魯士同盟反對馬利 (Maria Theresia) 與英國；一七五六—六三年卽所謂七年戰爭，法蘭西又援助馬利反對普魯士與英國，一七七八—八三年爲援助美國的獨立又向英國宣戰。

繼續不已的戰爭，不但使法國精疲力竭；且使法國日陷於貧困的境況。戰爭賜與法蘭西

的並無一物，連戰勝的榮譽都付之闕如啊！

君主得着勃興的資產階級底援助，壓倒了貴族階級，他本不想根本消滅貴族階級的勢力，不過要減削其勢力以便於統治。君主自居爲貴族的領袖，且以貴族爲維持其統治權的工具。所以君主喜於任命大貴族階級出身的人物掌握國政參贊軍機，雖然他同時設法摧毀貴族階級的獨立願望，使他們在思想上經濟上宣布破產，變爲君主的附庸。

貴族階級在道德方面經濟方面破產的現象益趨顯著，他們對於農民的經濟榨取和土地的侵蝕愈加厲害。因此國民經濟的基礎更爲動搖，同時這些不幸的農民要負擔許多苛捐雜稅。而貴族以狡詐的外交，不斷的戰爭，摧毀國家獨以爲不足；且思以掠劫的手段挽救經濟破產的危機。君主與教堂亦擁有廣沃的土地，當然與貴族結合一致剝削平民。

這樣絕望的環境對面，站立着有力的勃興的資產階級與無數的知識階級。這班知識階級自然很敏銳地發現加害於國家與社會秩序的弊害，絲毫不客氣的加以抨擊，比較歐洲任何大城市知識階級爲有魄力和勇氣。除此以外，巴黎還有一班在全歐中最有力量與自覺的小資產階級，與集居一處生活落伍的大多數無產階級。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個可怕的鬥爭，當然是無法避免的。祇要稍有機會，這些衝突，即將乘機爆發，使法蘭西王國陷於混沌的局面，

財政破產；政府的信用掃地以盡；內國公債無人承銷呢。

這個代表貴族教師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會，自一六一四年以來從未召集開會。到現在這個垂死的國會，應當援助破產的政府，通過增加新稅，允許政府發行公債，恢復政府的信用，延長其殘餘的生命。於是國會的選舉，在一七八九年舉行了。被選舉的議員由國王召集，在凡爾塞開會了。在國會裏面，除了少數宮庭侍臣以外，所有各階級的代表均激烈地反對統治階級。一七八九年五月五號，當他們集合以後，並不通過增加新稅，僅祇從事改良舊稅。在這點上貴族與教師自然與資產階級的想法不同。在各階級互取敵視的攻擊情勢下面，佔最後勝利的，乃是資產階級。這個國會竟成爲立憲的國會。她的使命，是爲法蘭西創造新的憲法。這個國會的權威，完全是一種道德權威。她建在這種意識上面，全國大多數的人民是她的有力的後盾。這種權威却還不能抵抗物質的暴力。君主猶統有全國的軍隊而且這些軍隊忠於王室樂爲効命。

但是王室對於 *Fronde* 暴動的回憶，得了一個深刻的教訓：祇有先把革命的巴黎摧毀，才可大膽地下手解散國會，驅散議員。所以皇室立即調動各處軍隊，集中巴黎，企圖防止人民的反抗。當皇室相信佈置已經周密不怕人民的反抗了，就開始解除擁護國會的大臣萊格（

Necker) 的職權(一七八五年七月十二日)了。

假使巴黎居民對於這事體抱不聞不問的態度，或者這個鬥爭可爲軍隊所懾服，革命的命運將成泡影。但是巴黎人民還是不顧一切悍然舉事，擊潰皇室的軍隊，巴黎全城的無產階級與市民竟衝進了傷兵院，奪取了三萬枝槍枝，攻破了巴士的(Bastille)前面的專制城(17,7,1789)。於是君主與其侍臣不得不屈伏於民衆勢力之前了。全國的農民亦羣起暴動。但在以前全國各處已有發生暴動的徵候，不過散漫無力，容易爲政府所鎮壓罷了。現在這般普及全國的民衆大暴動，自然非任何力量可以抵擋得住了。在那時，巴黎已經將革命的事業從危險中拔救了出來，且使之深入民間了。

這陣狂風暴雨又漸漸的呈現消沈的氣象了。皇室與其封建餘孽又恢復了勇氣，起始拒絕接收國會的議決案，並暗暗的集中軍隊。於是巴黎人民以爲國王與國會仍留居凡爾塞，則革命的勝利將失其保障；祇有國王與國會，在人民直接監視之下，方可保障革命的勝利。一七八九年十月五號，巴黎市民遂整隊由巴黎出發到凡爾塞，把國王帶回巴黎，

此時全國人民的心理都希望馬上得着和平，安靜地開始製訂憲法，與積極建設的工作，過安居樂業富庶而愉快的生活。一七九〇七月十四日，國王魯得斐十四向國民宣誓，盡忠履

行新憲法所賦與的義務與權利。但在國王的內心生活，則以此時一切的行動，非自由意志，係出於強迫的。所以宣誓以後，不到一年，國王竟於一七九一年六月二十一日潛逃，不料爲謀不臧，在他未達到安全地帶以前，竟向國民宣言，解釋他的行動，並遺下一封告國民書，聲明一七八九十月以後的一切命令係被人強制所發的命令均爲無効，於是偵騎四出，捕拿逃王，帶回巴黎了。

在前次大暴動的時候，巴黎已經有一大部分仇恨王室的人民，堅決的要求魯得斐十四退位。不過因爲忠君的思想猶深印於一般國民的腦筋，以致未能實行。假使那種要求見諸事實，或不至演成這次的悲劇呢。

但是悲慘的命運無可倖逃。一七九二年法蘭西在魯得斐十四統治之下，被迫與歐洲聯盟國宣戰。這次戰爭並非純粹侵略的舊式戰爭，乃是全歐君主同盟對一個已獲得自由的民族底戰爭，是一個大流血的戰爭。魯得斐十四竟勾結祖國的敵人，威嚇法國革命的人民，想給法國的革命一個不可挽救的致命傷。

在這種情勢之下，國會雖然猶沒有決心犧牲背叛國民利益的國王；但是人民對於崇拜國王的道德力量，到此時已消毀殆盡。這裏又是具有勇氣的巴黎人民敢於將國王重行拘捕，從新

召集國會 (Konvent)。這個新國會的任務應為創立共和政體，頒佈民主憲法（一七九二年八月十號）在新國會召集後的第一次會議席上，就全體通過宣佈廢除帝政（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一號）。魯得斐生存一天，巴黎人民對於基礎尙未鞏固的共和政體，猶抱無限的隱慮。所以巴黎人民要求處以勾結外援背叛祖國之罪，而國會延不通過。但是人民的憤恨，無法平熄，等到發見密櫃內而的叛逆證據以後，更是火上加油了。這些被人發覺的證據，證明國王賄買國會議員（米蘭帕Mirabeau亦在內）作其爪牙，暗通外敵，密遣衛隊，援助奧人，攻打法國，且資助敵人以巨額的餉糈。

雖然如此，國會中還有一派極力主張援救國王的生命。他們提議將國王交付全國裁判，以人民大多數的意志，決定其命運。這種想掀動各省反對巴黎的嘗試，遇着巴黎人民極猛烈的反抗；在國會以內恐懼巴黎人民的心理佔了優勢。這個交魯得斐付得全國人民裁判的提議，竟以四二三票對二七六票被否決了。於是魯得斐的命運決定了。一七九三年正月二十一號，一個聲勢赫赫的國王被推上斷頭台了。

那些為國王極力緩頰的共和黨，即普通叫做基羅的司特 (Girondisten) 這個命名的起源，就是因為共和黨主要的議員大半都是由南法選舉區基羅的 (Gironde) 選舉出來的，他們對於

巴黎，抱極端仇恨的心理，想把巴黎優越的地位取消，他們的政治理想是一個地方分權的國家。

「在國會開幕後的第四天，那裏有名的基羅的司特拉瑣司(Lasoyce)在他的同志歡呼之後，反覆地的說道：我不願意看見爲陰謀所籠罩的巴黎，在法國的地位，亦如羅馬之於羅馬帝國一樣。巴黎的影響應當減少到八十三分之一，(2)其餘的省區應當與巴黎有同等的地位」(Cunow, Du Partien der grossen Revolution S, 349)。

註(2)法國當時的省區有八十三個

橫在基羅的司特與巴黎之間的衝突，終於採取猛烈的形式。在一七九三年三月三十一號到六月二號的大暴動當中，巴黎人竟放逐與逮捕三十四個基羅的司特議員。而基羅的司特柯得(Charlotte Conday)則於七月十二號刺死謨拿(Morais)作爲報復，同時煽動羅曼省(Normandie) 佈來太(Bretagne)與南法各省反抗國會。巴黎也不肯絲毫放鬆，於十月三十一號立即搜殺留居巴黎的基羅的司特。

4. 第一巴黎公社

A 巴黎無產階級與其鬥爭手段

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

在前面幾章，我們時常提起「巴黎人」這個名詞，自然不是指所有的巴黎人。在事實上巴黎人當中，也分成許多互相衝突的階級。此地所說的巴黎人，當然是指那些佔首都人口數大部分的市民與無產階級。即此處所謂無產階級，亦非近代的產業工人。在那個時代巴黎雖然也有少許製造工場，但大多數的勞働者不是手工業即是挑夫雜役侍僕一類的勞働者，此外尚有許多獨立經營手工業者，家庭工人與各式小商人同樣地生活於貧困與不安定的境况下面。

祇有這樣貧困與不安定的生活，才使他們的社會地位成爲無產者。但依其階級地位，換句話說依其收入之來源來分析，他們的意識是小資產階級的意識，舒適而小康的生活是他們惟一的理想。那是再錯誤沒有的了，假使我們把收入狀況 (Einkommenslage) 與階級狀況 (Klassenlage) 互相調換，如拉薩爾 (Lasalle) 的主張一樣，或如我們的俄國同志所想像的一樣。他們相信貧農與富農的階級利益是相反的，貧農的階級利益乃與城市的無產階級是一致的。另外一種人也患了同樣的錯誤，他們相信：小資本家與大資本家有不同的階級利益，並且以爲小資本家反抗金融資本與無產階級反抗資本主義一樣。其實小資本家想變成大資本家，亦如貧農想變成富農，增加其財產一樣，社會主義的社會，並不是他們所有的理想。小資本家與農民一樣地拿勞働者作犧牲品，增加其收入，不過手段不同：前者以減低工價，延長工

作時間；後者以提高生活必需品的市價，剝削勞動者罷了。

所以在法國大革命的急潮當中，就是巴黎最貧苦的人民，姑不論其無產階級的生存條件，依其階級環境來說，仍是富於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因此他們之目的與小資產階級的目的絲毫地沒有分別；不過他們的鬥爭方法接近無產階級的鬥爭方法，為一般富庶的小資產階級所不同情罷了。

那些被飢寒驅迫的民衆不能忍耐期待了，生活使他們走入絕望的道上；死裏求生，是他們選擇手段的惟一標準；他們除了枷鎖以外，一無所失。所以在舊的社會關係大搖動的時期，他們敢於作一切他們所願做的事，他們相信可以佔領全世界的一切。

依賴這個信念，佔巴黎人口大多數的巴黎無產階級，獲得一種非常的力量。這種力量，就是法國大革命的推動機。他們那種絕望的無顧忌，使他們變成巴黎的新主人，並使巴黎變成全法蘭西的主人，戰勝了全歐。

他們鬥爭的手段，就是武裝暴動。她却不是自然地發生而無準備的行動；她是一種有組織有步驟的行爲。然而她的起源，是原於民衆自發的創意；絕非領袖們的先見。也祇有如此才能在相當時期形成一種不可抗拒的憤怒。一種暴動假使需要領袖來號召而非發自下層羣衆

自然的要求，即是證明缺乏暴動的原動力，必將立刻歸於失敗。在革命高潮急漲的全期中，羣衆時常是前進的堅決的推動者，而領袖時常是後退的遲疑的推宕者。倘使情勢逆轉，民衆厭倦了，反需要領袖的鞭策，革命就會馬上走入失敗的途徑。

一個革命的暴動，祇有靠羣衆自發的創意，不賴領袖的豫想，才有成功的可能。這並不是說，缺乏組織的暴動，有首先成功的希望。法國大革命的巴黎武裝暴動，是建設在民衆組織上面的呢。

在大暴動發動之初，當民衆攻擊巴士的獄的時候，已開始着手組織的工作，以後更漸漸地堅固而永久了。

在大革命期中，每個市區均要求最大的自治權。剝後憲法會議，更於一七八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頒布的法律，批准那因中央瓦解後適應環境所產生的市區自治權。這些自治區域，有一種最高的自治行政，組織地方警察並可命令市民自衛軍，即所謂國民自衛軍。這種武裝團體，遍設於全國各城市。但同時資產階級，想把下層階級的人民，離開這種武力，以使操縱，於是在國民會議，提出一種巧妙的區分，即所謂消極市民與積極市民的區分（*Passiv und Activbürger*）。積極市民，是那些繳納直接稅至三天工銀以上的市民。在市區代表會

議與國民會議，祇許積極市民有選舉的權利；國民自衛軍的徵募，亦祇限於積極市民。於是
一切團體，發展成爲有產階級的代表者了。但巴黎消極市民與積極市民當中同情消極市民者
，在正式的自治代表團體以外仍結合一致，並自行武裝起來。

國會的選舉差不多可以說是一種普通選舉，知對於第三階級，大多數還是間接的。

在選舉期內，巴黎分爲六十個選舉區，每區選舉若干投票人；當投票人選出以後，這
些選舉區的劃分，就應歸消滅。但是出於原意之外，選舉區仍舊存在，並由人民的自由創意
，變成一個帶有永久性的城市行政機關。在全巴黎當七月十四日巴士的暴動以前的叛亂一瞬
間，這些由選舉區自動形成的城市機關開始武裝民衆，發號施令，有如獨立機關；在奪取巴
士的獄大暴動以後，這些選舉區就變爲法律所承允的城市行政機關。爲便於彼此互通聲氣起
見，她們創設一個中央交通局，由各區代表組織而成。藉此互相交換消息，報告各區行政狀
况，這樣由下而上的各區聯合，純係民衆的自由創意，以革命手段形成的一種組織，這就是
公社 (Kommune) 的萌芽。當國民議會漸漸地將王權消滅的中間，這些選舉區乘機也漸漸地
擴大其職權範圍，恢復巴黎與各省區間的聯絡，並爲八月十號革命的公社運動造一基礎。（
參觀克魯泡特金所著的法蘭西大革命一七四，七九頁）“Raptokin, die franzosische Reool-

tion”

國民議會想把市區議會取消，於是在一七九〇年五月二十七號頒佈法律，變更巴黎選舉區域的劃分，以四十八個分區，代替六十個市區，在分區議會內祇有積極市民有參加之權。但消極市民並不遵守這條律禁。從現在起，分區幾爲一切革命行動之中心點，對於一切地方與國家問題，沒有不努力參加的；各項公共問題的解決，沒有不設法干預的。因此巴黎所有的城市行政機關，漸爲其所吸收，直接管理之，或派遣代表，或任命委員會主持之。這些事實，自然會使各分區的會議不斷的舉行；也祇有富於永久性的分區組織，才能發展其工作。

當一七九二年八月十號，各分區竟將無權的城市行政機一概取消，創立一個新的革命的公社：由每分區選派三名委員組織之。從此時起，巴黎公社爲全市各分區所支持，取得革命的進程的支酌地位。以往的歷史記載，對於此事沒有付與她應有的價值，實在一件遺憾的事情。她們的工作確是浩鉅而偉大的工程，歷史家不察反以法蘭西大革命的光榮之冠套在雅各賓派俱樂部的頭上，而吝與創造這些分區的人真是令人不服，即是雅各賓派對於革命的貢獻，亦全賴此分區的地方組織。就事實而論，雅各賓派時常是大革命過程中的猶疑份子；祇有那毫無所失的無產階級，才能毫不遲疑地大膽地衝破革命過程中不可預知的難關啊。

(B) 恐怖政治發生的原因

在大革命中，巴黎的無產階級拿公社做工具取得了統治的地位。但公社亦包含一些內部的矛盾，亦如巴黎與鄉村的矛盾，與當時無產階級在社會中的地位發生的矛盾現象一樣。當時，無產階級依其階級意識而言，他們是站在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對於生產手段的私有制度，毫無澈底反對的勇氣和決心。因為他們需要生產手段的私有，繼續生產的工作，與維持其生活。從另一方面來看，他們又仇視富人的私產，與奢侈的生活，為他們窮困的來源。祇有他們這種反對封建生產制度與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的決心，才能給他們無限的勇氣和毅力，向一切反革命的勢力進攻。而巴黎又因為所處的地位重要的原故，於無形中即變成了革命的先驅，為全國民衆所注目。在這個反對封建制度，反對君主政體，並且不惜與反動的全歐為敵的大爭鬥當中；法蘭西全民族的力量，（不用說那時的法國是世界最強的國家）是巴黎無產階級的後盾。有這樣碩大力量做後盾的巴黎無產階級，當然敢於反抗全歐的強權，將政權由其手中奪轉過來；當然會增加他們對於偉大革命事業的自信力；使巴黎的無產階級，為以後第二次公社革命以至於十九世紀末年全世界革命的無產階級一個可驚可泣的榜樣了。

無產階級，又為巴黎最貧困的消費階級需要低價的食物甚為迫急，尤以大革命的時期內

爲最厲害：所以法國的大革命，露骨點說，也可叫做飢餓的暴動。因此引起貧困的巴黎人，與農民中間，商人錢商間，日趨顯著的衝突。在那個時代，這班人是受私產制度庇蔭的幸運兒。在小經營的經濟狀況下面，取消私產制度又爲不可能的事；而且沒有人敢於作取消私產制度的嘗試，更沒有人敢於宣傳。當巴黎無產階級，欲利用其在巴黎奪取的政權與巴黎超越各省的優勢，避免這項衝突的時候；他們就感覺到以少數壓制多數終不是永久可能的事，拿過去的勝利，挽救目前的失敗，也是夢想。

在革命期內，無產階級都這般希望，以爲封建制度的崩潰即是無產階級從貧困的運命下面解放出來的日子，於是他們努力於政治自由與政治權力之奪取。不料革命的利益仍歸於小資產階級與農民的手中，大都會的貧困情形，不但絲毫沒有減少，且有時反而增加了。

飢荒與物價飛騰，成爲全革命時期中最普遍的現象。有人以爲這是偶然的現象；因爲恰恰在這些年頭，農業的收入很不順利。據吾看起來，這決非偶然的現象，是與革命有相互關係的。在那個時代，法國的農村經濟還未脫離自給的狀態。農民對於都市的製造品的需要，除了少許奢侈品以外，可以說是很少；不但一切生活必需的食品衣服自己生產，就是簡單的家具與農具亦在農民家庭內自行製造，此外尙需城市實業供給的東西也有鄉村手工業者滿足

其需要。

迫使農民售其食品於都市的東西，不是他們對於都市製造品的需要，而是國家強制徵收的租稅。假使農民不將其生產品穀物酒牛等類售諸市場，就無法繳納租稅。此外農民還須以自然物繳納地租於其貴族領主，或在其領主的土地上面供給勞力。以這樣的方式，集中於貴族領主的農業生產品：一部分為貴族領主與其家屬所消費；一部分則以交易的形式售諸市場，換取金錢，在都市中營縱恣的生活。

從一方面說，農民對於租稅與地租的負擔，使金錢流聚於巴黎，同時在此亦有大宗金錢的流出；從他方面說，巴黎又使用這樣斂聚的金錢，購買農產品，維持其生活。

革命的急潮掃蕩了封建領主的勢力。在過渡期內，即一切應繳的租稅亦無形豁免了。因為國家尙未能利用其政治的權利，強制徵收。在這種情形下面，農民自然不似以前有農產品急於求售的必要。他們開始利用新的自由，飽食暖衣並企圖消滅國家與封建制度所遺留的貧困狀態。惟一的引誘能使農民將其農產品售諸市場，就是物價的騰貴，此外並無理由可使之以賤價出售：祇此一層，已足使巴黎生活昂貴，發生與各省的劇烈的衝突。在一七九三年，議會組織六千名革命軍，派赴鄉村徵發巴黎所需要的生活品。

一九一七年革命後的俄羅斯，亦採取同樣的手段，即所謂戰時共產主義，但不幸遭同樣的失敗。從許多現象當中，這是俄羅斯的革命與十八世紀的法國大革命完全相同的一點。

因對外戰爭而引起敵國的封鎖計劃，阻止外國糧食的輸入，這種衝突，即愈趨激烈。使全巴黎陷於饑荒的苦境，增加鄉村人民的戰費負擔，尤其使他們感着痛苦的。莫如強制徵兵的實行。戰事順利，是巴黎人惟一的出路；戰事失敗，即將使革命中心的巴黎慘遭崩潰的命運。何況民族的感覺，在巴黎特別發達呢？法國的強大是與巴黎的強大有不斷的因緣的。所以國會中的極左派，即所謂山嶽黨，常以「一個整個的共和國」相揭發，以愛國家與急進革命家有同等的意味啊。

農民對於戰爭的態度則完全不同。生息邊境的農民，自然不願外兵的侵入，尤不願因軍事上外國勝利使封建勢力有死灰復燃的機會；因此邊境農民之富於愛國思想與巴黎人一樣，勞爾薩斯人 Elsassern 是最明顯的例子。離邊境較遠的農民底觀念，就有些不同了。他們不了解戰爭的政治意義，祇感覺戰費負擔的痛苦。在他們心目中，這都是那些屠戮皇室無法無天的巴黎人底罪過。有幾處地方像 Verde, Norman, Bretagne 幾省仇恨巴黎的心理竟達極點，祇要得到機會就公開的攻擊巴黎。這種機會有時為反革命的貴族階級所釀成，即革命的資

產階級特別是基羅的士特，Gwodhisten 亦有時煽動各省人民反抗巴黎。

金融家與農民，以同樣的情形，與無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是互相衝突的，並且比較前者更劇，影響更大。但這不是近代所謂勞資的衝突，在那個時代，勞資的衝突，並無何等重要的影響。在大革命以後，聖西蒙 (St. Simon) 尤認定那時的實業資本家是屬於勞働階級的。就當時的情勢來判斷，這種衝突是金融資本與商業資本以及奸商囤積商投機商人的一種衝突。這班商人雖不是造成饑荒現象的主動人，但他們却乘機牟利，剝削平民，增加平民的痛苦。這裏犯不着加以詳細的說明；我們自己飽嘗這種滋味已經有十年之久了。

特別是在人民貧困當中，這種因為抬高物價而獲重利的事實，容易激起一般人的憤怒心。此外因供給軍用品與從事土地投機事業而獲取的利息，亦同樣地並存着。國民議會雖然曾經把那佔全國土地面三分之一的教堂產業，與那逃亡國外反革命的貴族底財產盡行沒收了。但此項充公的巨大產業，政府不但沒有將其分配與一般貧困失業的農民，也不保留作為國家的產業，竟以財政上的困難，將其出賣。財政的困難，本為推動革命的一個原因；在大革命以後，不但沒有絲毫減輕，而且更加紛擾：因為農民拒絕完糧納稅，政府收入減少。同時那班以少數金錢從國家手中獲得土地的人，時常專以分割土地為目的，收買國產，然後漸漸

地將此分割之土地以較高之價格售讓他人，從中取得極大的利息。國家財政上的困難，並因此而減輕；反而誘發了土地的投機事業。

國家此時祇有濫發紙幣之一法，彌補財政的缺陷；於是迫不得已開始濫發革命紙幣，不久就陷於不可收拾的地步，成爲生活昂貴物價不定與匯率低落的一個新原因。在這種情勢之下，自然會有一般奸商與做投機生意壟斷市場的人從中漁利。這樣一來，在舊式的封建財產制度的廢址上面，建設起一個新的資本主義制度來了。發達的程度，適與無產階級的貧困與其統治權之奪取，成一正比例。這個事實，給與吾人一個深刻的認識，就是若社會的客觀條件尙未完備，徒欲從事於政權之奪取以變更或取消經濟上自然法制的運行，是一件絕不可能的事實。所以巴黎的無產階級，雖在奪取政權以後，仍然是饑寒交迫無處聊生。

Im hungerigen Magen Foingang finden, Nur Suppenlogik mit "Knodelpunden"

他們毫不考察：什麼是在已成的經濟條件下面是可能的？什麼是可以避免的？他們有了政權，而且有了決心利用這個政權，努力追求一個自由平等富庶的理想國之實現，有如資產階級的思想家所預允他們的口頭禪。一旦發覺變更生產的行程關係是不可能的時候，他們就想馬下拿政治的力量變更生產的分配關係。這種力量，今日我們已經司空見慣不足爲奇了。

。例如國家規定最高價格，強制人民購買公債……等但是這些手段，因為當時生產組織的散漫，統計的缺乏，中央政府支配地方的無力，對於濟貧扶弱的事業上還不及今日之有効力可以減除一部分人民的貧困：因此無產階級的政權與其經濟狀況，形成極大的矛盾現象。以戰爭的關係，使這種矛盾的痛苦，發生更險惡的傾向。於是激怒了無產階級中的當權者，不惜使用極端的毒辣的手段，流血的恐怖；想從絕望之中，挽救那不可避免的失敗。

(C) 恐怖主義的失敗

巴黎的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以公社的名義統治了全法，為避免直接統治的名義，他們提出一個口號「一切權力歸於公社」。他們很知道：要想統一全國，全賴一個能代表全法的議會。所以他們統治全法，不是以反對議會，乃是以利用國民議會為手段。

列甯 (Lenin) 似乎也採取同樣的政策；不然，列甯主張進行憲法會議的選舉，並且主張召集憲法會議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體。所不同的：公社有較大的眼光，知道利用這個有價值的機關；而列甯則於其握得政權的第一天，就已經厭憎這個機關，把他置諸腦後了。

在國民議會裏面，那些與公社共同奮鬥的山嶽黨，雖然是佔着少數；但是多數派，也不是一些戮力充滿主張確定的政治家。還有許多人遇事徘徊遲疑；這班人容易受巴黎民軍的操

縱指使；假使他們在國會中不與山嶽黨一致的時候，祇要加以有力的威嚇，就可軟化下來。山嶽黨就用這種手段操縱這些軟弱人物，在國會中居多數派的地位。

但在局勢千變萬化的時候當中，自然需要敏速的處置，果斷的解決；反之，持國會的立法行動，是不能滿足時代要求的。何況國會的立法自身並沒有糾正社會產生的弊害與困難的能力呢？無論怎樣嚴厲的條例，既有條文之規定，他的使用範圍，就已經有了一定的限制，巧滑的壓迫者，就可利用這些條文作犯法的事情，每一個高壓政策，假使她反抗那為當時關係所產生與不可免掉的現象，遲早間必會引起超越條文外的行動及違法的壓迫。換句話說，這種高壓政策就會立即過渡到狄克推多制。

人們往往有一種語解，以為狄克推克是一種政體；在實際上，狄克推克乃是一種政治境况，一種隨意的統治權由少數或一個不受形式束縛的統治者所使用的政權。凡是比較由多數人合作的團體，與辦事上的便利起見，就需要條例與法規的約束了。政治上狄克推克的特殊形式，就是個人獨裁制。把階級獨裁視為一種政體，可以說是天下最滑稽的事。沒有法規的階級專政，乃是完全想像不到的；因為那些條文，對於重利盤剝者，做投機生意者，反革命者，表示其無力量，於是無產階級遂厲行狄克推多。

一七九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國會已開始成立「公共安全與國防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由少數委員組織之，國會付與的權力，幾與一個絕端專制統治者相等；委員的人數起初雖規定二十五人，後減至九人。委員會有權監視國務大臣與軍隊統帥，任免行政官吏與軍隊長官，可以派遣全權委員，若認為必要還可以頒佈為國務大臣所必須遵守的訓令。這個委員會雖然對國會負責，亦不過表面文章；在事實上，國會竟戰慄於這個委員會之前。然為防止其濫用權力起見；委員會的人選，每月須改派一次；對於國庫，無直接處分之權。不久這個委員會，就變為山嶽黨獨佔的機關。這個機關獨裁的權力愈大，個人獨裁的傾勢愈益濶滋暗長，終乃造成羅伯司比爾(Robespierre)個人獨裁的局面。

此外又創設兩個為獨裁制度的工具的機關；一個叫做警察委員會，或叫做公安委員會；一個叫做特別革命法庭。這兩個機關，都可任意處理一切反革命刑罰案件，裁判叛逆份子；祇要一個所謂「愛國者」的告發與懷疑，特別法庭就可判決死刑，而無提出上訴的可能。

路意布郎氏(Louis Blanc)在其所著的法國革命史中，描寫這個實施恐怖統治的組織如下：

「我們發現一個不嫌辛苦的俱樂部，這就是雅各濱俱樂部，全巴黎在其呼吸之下討生活。

巴黎將全市分爲許多的人民集會，叫做分區，表示其公共意志。爲分區中心的公社，負有將巴黎的公共意志傳達到國會的責任。

國會就把這些思想製成法律。

保安委員會則有執行這些法律的全權。不論中央行政機關，選擇官吏，國防軍隊或省區內皆可派遣代理委員代執行其職權。全國境內大小各區域，均普設這種革命委員會。

公安委員會則專司揭舉反叛的陰謀。

特別革命法庭則專司裁叛與懲罰反革命的叛逆者。

這就是革命的機關。」

這些可怕的機關，處理案件，雷厲風行，毫無顧忌。以爲祇要把一切偷運禁品者做投機生意者重利盤剝者處以死刑，就可從根本上消滅這些喫人階級。

但當時經濟條件不但不能實現這種希望，而結果恰得其反。大都市的貧困紛擾的現象有增無減。貧困的原因。不是金錢的缺乏，乃是金錢的過剩。在這種局勢下面，恐怖統治的嚴厲取締，不但未曾阻止金融上之投機，反而貪贓枉法的案件層見疊出。

枉法的人被拿獲的危險愈大，更容易分其由不正當途徑得來的金錢，賄買揭發的官吏，

爲之代守祕密。社會愈窮困，行政機關就愈容易昧着良心，開闢不正的財源。

因此斷頭機儘管不停，而新的財產繼長不已，巨富與斷頭者日爲比鄰，飢荒的危境有如水漲一般。

這些勃興的巨富，大都是由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出身的，由革命黨出身的也不少。這班由革命黨出身的人自然是革命黨中最狡猾卑鄙的黨員。而革命黨中富於犧牲精神的黨員，不幸爲了不斷的鬭爭，與向國內外反革命的勢力進攻又消磨幾盡了。

於是革命的無產階級，在兩面夾攻之中，日趨於消沈了。一部分良好的份子，因爲革命的戰爭，飢寒的壓迫，傷亡迨盡，一半在革命之後，走入剝削階級隊伍裏去了。綜合來看，革命的隊伍已經遭受了重大損失。碩果僅存的革命份子，也就漸漸他喪失勇氣了。四年大革命的結果，農民與錢商得了不少的利益；而勇於犧牲取得全法蘭西政權的無產階級，仍然哀號於飢寒之中，處境之苦，較革命以前爲尤甚！就是拿那不惜大流血的恐怖政治，也不能改善其生活境况。處這種情勢之下，他們自然絕望了，不敢再有所希冀了！於是乎懷疑，膽怯，疲怠等等現象，自然隨之而俱來了！

但是另一方面，巴黎公社的生存，又全賴一切公民努力參加公社的活動：每天參加分區

會議，尤須在可能範圍內，自行解決一切行政事務上的問題。這自然不是永久可能的事。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不能永久拋棄生產工作，而專理公共事務；不然，他們又將如何維持其生存？那種時斷時續的工作，已不能使他們繼續生活下去了。當革命的火焰尚在他們心中燃燒的時候，當他們對於革命能改善其經濟狀況的希望尚未達絕望境地的時候；他們還能忍受因革命而遭受的物質上的痛苦，一旦對於革命開始懷疑，即將厭惡政治，希望恢復原來的生產工作，減輕自身的痛苦了。

於是他們甘願放棄一切政治的活動，將政權慢慢移轉到那班支領薪俸的官吏手裏去，形成以後帝國主義貴族政治的基礎了。

同時因情勢之推移，一般富有資產與受其資助的人，他們有空暇的時間，漸在各分區佔有多數；而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則為工作所束縛，不能出席議會，於是發生一種看產階級終佔優勢的危險。

一七九三年九月九號，國會有一個議決案，限制分區會議每週舉行兩次；凡是靠勞働度日的會員，每參加會議一次，得領取兩個佛朗的津貼。但是這個決議案終究不能挽回大多數人對於會議的厭倦心，而為革命工作向後退的一種顯著的表现。領袖與羣衆的關係亦因之

而生變化；在革命潮流高漲的時期內，羣衆推動猶疑不決的領袖向前進，並給與不斷的刺激，鼓舞不少的勇氣。領袖與羣衆間的關係能保持此種狀態，方是一切民衆運動勝利的保障。大抵革命時代的領袖人物，比較民衆的態度總有些躊躇：因為他們富於判斷的能力，容易認識事件可能的成分與其困難的緣故。

到此時呢，環境變化了，領袖人物爲維持其昨日的勝利，杜防明日的失敗起見，雖然需要民衆力量的撐持；但是民衆確實疲乏不願努力了，開始懷疑革命，不能再行興奮了。一個民衆運動達到了這步田地，就是證明這個運動缺少潛在的動力，或者因爲這個運動的成功條件尙未成熟，或者得而復失。

爲鼓勵民衆繼續奮鬥，統治當局必須表現其有力以便麻醉民衆欺騙民衆，這也是使恐怖政治延長壽命的一個動機。

革命領袖的狂念，也可發生同一的影響：他們一旦感覺本身勢力基礎動搖的時候，就千方百計謀作最後的掙扎，不惜屠殺一切階級的叛徒與其同情者；有時竟反對同黨中的異派，於是每一個錯誤，與冒失的行爲，都可引起當局的憤怒。

一個革命的時代，比較平常時代更容易發生愚笨的動作：因爲人類的情感，在這個時代

，特別興奮，而新的困難，却跟着新生的關係，如雨後春筍般的發生着，這是革命過渡時期內必然的現象。若是沒有能力阻止革命的前進。一旦革命潮流開始後退的時候，即是一種很小的錯誤，也可發覺很壞的影響呢。

革命的當局，愈感環境的不安，就愈想不擇手段，以便鎮壓一切的敵人，也就愈感無有採用極端高壓手段的必要，以挽救革命的危機。

山嶽黨的份子本極複雜：內有信仰上帝的，有生神論者，有持身端正者，有驕奢縱慾者，有過激的，也有溫和的。在革命的初期，却能團結一致共同奮鬥。當他們開始播弄暗潮互相仇視以恐怖的手段彼此殘殺的時候；革命立即陷入失敗的窠臼，革命的前途更加黑暗了！羅伯司比爾派曾以過激派的罪名加之於黑伯派 (Fraktion der Hebertisten) 的頭上，以貪贓枉法與溫和派的罪名加之於但唐派 (Dantonisten) 的頭上，將他們一個一個的捕交特別法庭，判處死刑，數月以前的基羅的士特 (Girondisten) 亦遭同樣的命運。

恐怖手段的無限行使，已經是革命行將失敗的預兆。更不幸的，就是這種手段，無形中引起巴黎公社底民衆互相水火，積不相下。那般被殺者底信徒，遂挺而走險，變爲反對革命政府的人物。同時政府方面，又因民衆的冷淡，遂將原來爲各分區所行使的行政機能，變廢

地剝奪了，將其移轉於國家所任命的一些官吏的手裏。所謂政治警察，完全操在兩個中央機關的手裏，這兩個機關握有國家的實權，此即前面說過的保安委員會與公安委員會。而警察就變成獨裁政府的強大工具，她的行政機能。遂由公開的性質，漸漸變為祕密的行爲。

於是這個祕密警察形成一種神祕的力量，左右了全國人民的呼吸。

革命政府的當局，想用這種手段，保障自己的勝利，終無效果。支持革命政權的基石，日潮腐蝕。他們惟一的與最後的方法，祇有造成大恐怖與提高警察的權限，給果釀成人人自危的局面。一旦到了緊急的關頭，這些領袖們皆爲民衆所唾棄，且不願與之爲伍了。

克魯泡特金是一個極端崇拜革命巴黎公社的人，決不是反對公社運動的人。他描寫這個不幸的恐怖情形最爲詳盡。他在其所著的「恐怖」一本書六十七章裏頭討論法國革命，說道：

「捨對外的戰爭一點不說；當時最黑暗的地方，就是南方各省人民不平的呼聲。雅各濱派奪取政權以後，竟不分青紅皂白，大批的屠殺反革命領袖與其黨員；激起了全國人民深刻的憤恨心，不惜短兵相接，各趨極端；因此空氣日趨險惡，無論何處何地，特別是在巴黎，報復之風盛行，人人惴然有朝不保夕之勢」。

克氏在此處並接着舉出幾個例子，來證明羅伯司比爾是如何的感覺地位的動搖，當時的

恐怖政治是如何的趨於極端。

路意布朗氏，則謂羅伯司比爾自己已經看出因恐怖制度所發生的不良影響，本思加以阻止；但是他沒有好的手腕與方法，制止黨中的過激派。魯意布朗氏曾經說道：

「羅伯司比爾的原意，想把那班曾使世界戰慄的人戰慄於革命之前。他曾經有過一次大膽的計劃，想拿他們自己的棍棒，把他們自己打倒。換句話說，以恐怖制止恐怖。」(Histoire de la Rvolution Francaise II, S, 748)。

羅伯司比爾的動機是否如此，自然是值得令人懷疑的；不過他堅決主張實行 (Das Gesetz Vom 22 Prairial)，這種條例，撤消政治犯最後的法律保障，却是無容諱言的事實。特別法庭審判政治犯，不許有辯護士出席，訴訟手續缺乏明文的規定，僅受所謂「健全的理智」的限制。一切的裁判，純持法官的良心與可以任意製造的證據，為最後的決定。

羅伯司比爾在一七九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曾自如下之聲明：

「有人想以法律的詭計，支配革命。把對待共和國叛徒的階段，視為為私人間訴訟相比，那真是豈有此理。自由之鐘響了，我們最好以叛徒自己創造的刑法處置他們自己。」

惟一的刑罰就是死刑。凡是散佈謠言，紊亂風紀，煽惑民衆的人，皆當處以死刑。政府

利用如此的規定，可以處分一切反對黨人。

克魯泡特金對於此事，曾經很激昂的說道：

「這種條例的頒佈無異宣佈革命政府的破產。……在事實上，六星期以後，這種條例的影響，已經使反革命的勢力，達到了成熟的階段。」

根據這種條例，立即宣佈五十四人的死刑。

「這種新條例頒佈以後，立即宣佈五十四人的死刑。於是到處稱呼這種條例爲羅伯司比爾條例。這樣極端的恐怖政治，當然馬下激動了全巴黎的憤怒！」

接着就發生一次控訴一五〇個政治嫌疑犯的案件；先後分三次執行死刑的判決。

「把這些殺戮的慘事，過分的描寫，是一件浪費筆墨的事。我們祇要知道；自從革命法庭成立那一天起（一七九三四月十三號）到次年六月十號止，中間經過僅僅十四個月的光陰，巴黎革命法庭，已判決二千六百〇七人的死刑。自從新條例頒佈以後這個革命法庭反在四十天的短時間內，（一七九四六月十九號——七月二十七號）竟判決一千三百五十一人的死罪！」

載這些犯徒到斷頭台去的囚車，每日不斷的經過巴黎街上。五個凶惡的劊子手，簡直沒

有一天的休息。這種慘酷的現象，使巴黎人民發生憎惡的心理。被處死刑的人，已經沒有安葬的地方。若想在住民區域中尋一個埋葬的地方，每次都引起該處住民嚴厲的抗議。

巴黎勞働階級的同情心，現在移到死者身上去了！因為巨室已經逃亡國外，或潛居境內，不敢露面。於是斷頭台上的雄鬼，大多數都係貧寒的平民。依路意布朗氏推算：革命法庭判斷死刑的人二千七百五十人當中，祇有六百五十人是由資產階級出身的人。當時外面還有一種謠言說：公安委員會內有一個復辟黨人，專於從事殺戮的煽動工作，藉以激起人民對於共和政體發生厭惡生的心理。

雅各賓派政府崩潰如此之快完全由於這種無情的大屠殺已是不容疑感的事實了。

在雅各賓派與羅伯司比統治之下，人人朝夕自危於是一切反對政府的人，不分過激派溫和派基羅的士特山嶽黨無產階級資產階級……都團結在一個共同目標之下，反抗羅伯司比的政府。

所以羅伯司比的勢力，僅僅經其反對黨的一擊，即行崩潰了。然而他還想作最後的掙扎，向民衆發出警告書，希望恢復民衆的同情心；但積恨太深，終歸失敗。同時巴黎公社，也失却向來的威權。於是革命的大勢日趨不利；兼以當時社會經濟條件如此，遂把資產階級

擁上統治階級的地位了。

5、恐怖政治的遺傳性

羅伯士比爾的失敗，是一次最悲慘的失敗，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不但不願爲代表其利益的政黨而努力奮鬥；反以推翻羅伯士比爾，爲解除其痛苦制止大暴動大屠殺的出路。

這種不幸的慘敗不久即被人們忘記了。

人們所念念不忘於懷的，還是這次革命的偉大時期的回憶：革命的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活動，他們怎樣計劃武裝暴動，佔領國會，怎樣以國會爲武器，統治全法；怎樣以一國之力，反抗全歐；並且在短期內戰勝全歐。

拿破崙底武力統治，與拿破崙失敗以後財政貴族的統治；造成了政治上的反動局面，黑暗的時代，使一般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與革命家對於現狀愈感失望；於是大革命時代的遺傳，更容易與革命家的內心生活密合一致。

祇有極少數人才能用冷靜的頭腦，採科學的精神，爲科學目的，研究革命的歷史。這就是說，研究歷史的目的，是在將人類進化的因果關係說明出來，求其與爲吾人所體驗的各項關係的全體和諧一致。用另外一種語調來說：研究歷史的目的，是在宇宙觀的深刻體驗，真

確知識的繼續獲得，固定原理的不斷探討。

任何一種科學，都是以實際的應用爲出發點；而非發自哲學知識的衝動。例如抽象的幾何學，依其拉丁名詞加以解釋，幾何學不外是一種測量土地的技術；就可以給吾人一種鮮著的證明。

所以歷史也是以實際的應用爲出發點。歷史家讚美吾人祖宗的光榮行爲，亦不過想藉此鼓舞後人步武先烈創造同樣的光榮事業。此等歷史的任務；不在於真確知識之傳授，僅欲在倫理上政治上發生良好的影響；故不必嚴格於事實上真翔確當。有人往往過分看重這種影響的力量，有時不惜僞造事實，淆惑黑白。所以捏造歷史的事實，與歷史有共同長久的生命。

就是在今日科學昌明的時代，捏造歷史的事實，猶爲大家所公認，並未完全消滅。一切野心的國家。均以此爲製造一國人民愛國心的絕妙工具。

另外還有一種實際的用處：就是歷史有時爲保障特殊利益的手段。一個強權國家，一個特殊階級，或一個特殊家族，往往喜歡拿過去的習慣，已經的條約，作爲維持他們特殊地位的理由。這類的真實，供給捏造事實的史家不少的材料。天主教堂的大部財產與其威權，教皇教主教師的勢力，俱是建築在僞造的經典上面的。

自從寫字讀書的能力，已普通及於民間，不爲少數的特殊階級所獨具的能力以後，製造偽書的現象，已不復流行於知識界了。但是歷史的科學，至今猶爲人所誤解。人們好以主觀的見解，本身的需要，判斷歷史上的是非。大戰以後，交戰各國的歷史家，各就其本國的背景，利用科學的名義，辯護本國的行動；不禁使吾人爲之太息。

其實歷史的任務，既不是誇耀先人的光榮行爲；也不是專爲保障人類的正義。歷史的正任務，乃在增加那班知道利用過去經驗的人們的能力。

這種能力的增加，又有兩方面的意義：

從一方面來說：研究歷史，可以增加人類底智力。因爲歷史指示吾人以先人失敗成功之途徑，提高吾人的認識力，使之迅速抉擇有效的手段處理事件，不令再蹈失敗的覆轍。

戰爭史的研究，在軍事學上，已收有極大的效果。每個幹練的軍事家，對於戰史，都有深博的研究，從中獲得許多有價值的經驗。

政治史的研究比較困難一點。此處研究的範圍與材料，比戰爭史浩繁得多。因爲政治這個東西，不是一件無意志的工具；可以由一個強有力的人物任意運用。政治是一個不易捉摸的怪物。因此政治——的關係，較之軍事的關係異常複雜，變化無常。就是對付一件簡單而

容易捉摸的政治案件；假使我們盲目的仿效先人的成例，不知利用由歷史所指示的一般原則，適合於當時當地的特別環境，也可發生不幸的結果。在政治上，社會的客觀條件，各國的特殊環境，與時代的差別，是不容易看得出來的。所以將過去的經驗，呆板地應用於某種僅在外表相同的事實上面，結果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而且容易淆惑事實的真相與需要，遮蔽吾人對於事實認識的視線。

所以政治史給與人類的教訓，自然就少。

大多數政治家，研究歷史的動機，也不是純粹以學習為目的；或者據有別的成分在內。現在我們說到另一方面的意義，歷史怎樣可以增加人類的能力？

任何政黨為階級，都可在過去的歷史上發現有同樣性質的政黨與階級。過去的爭鬪，如剝削者與被剝削者，有產者與無產者，貴族與民主，專制與共和的爭鬪；亦如吾人今日所有的社會鬪爭一樣。過去時代的政黨與階級，自然建立在另一個的社會基礎上面，與吾人今日不同。即是同樣的現象，也各有不同的意義。然而在政治上，儘可以過去的現象，衡量目前的現象；拿以往的成功失敗，作為今日行動的標準。特別對於政治宣傳方面，猶可以發生很好的效果；假使我們能夠舉出先人的豐功偉績，做我們的榜樣，增加我們的能力。在消極方

面，也可以增加我們自身的力量，假使我們能夠給反對方面一個充分的證明，先人是如何因此而失敗的。

這自然產生人類研究歷史的濃厚興趣，但不見得對於歷史的有若何的興趣。於此我們又發覺一個驅使人類捏造史實的一個原因；任何政黨的著作家，都盡力歌誦本黨而醜詆敵黨。從所有研究歷史而產生實際需要之中，祇有那為研究精神所鼓舞的史家，才可以阻止捏造史事的傾向，明白認識本黨先覺失敗和成功的原因，而加以嚴刻的批評。從這個基點出發，才能過渡到科學上的真理。歷史的研究：才能夠完成其探討因果關係的本來目的。

至於他的動機，就會使歷史的價值一落千丈。幸而在今日情勢之下，反對方面的批評。可以阻止這樣的嘗試。而宣佈戒嚴，檢查書報，在放逐新教徒時代雖為阻止思想自由發展的手段；在今日已不能完全適用了。然而在人民教育程度很高，思想絕對自由的國家，基於主觀而不翔實的歷史記載，仍然不少。

自然我們不能相信一切不翔實的歷史記載，都是有意蒙蔽讀者的著作。在事實上，有許多歷史家，自身囿於黨派的成見和偏見，不能發見事實的真相呢！

尤其使這種現象容易發生的：莫如參考材料的來源，出自黨派的鬭爭。社會關係的複雜

如此，就是胸無成見的研究家，也不容易覺察此中的錯誤；而發生什麼是真理的疑問。

里沙克那氏(Lissagaray)在其公社史(Geschichte der Kommune)的序言裏頭說的很對：「若以偽造革命史跡，流傳民間；或以歷史的歌謠，麻醉國民。不論其爲有意或無意，都應受懲罰，正如地理家以不準確的地圖給與航海家應受懲罰一樣。」

就我所知，吾黨同志中不乏勇敢忠實之士，對於革命的事業，確能盡職；但有一件佐我抱無限遺憾的：就是他們好以鮑爾塞維克的歷史歌謠蒙蔽民衆。

寬點來說：就是一個態度忠實富於良心的著作家，若是自己曾經捲入漩渦，也要感着困難。在革命的急潮當中，潛伏人心的各種好壞感情，都一齊迸發，不論好壞，不易遏制。於是社會鬥爭採取以激烈的形式，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黨見的堅持，信仰的篤實，在革命成功的要素上，較之其地歷史上的場合，更佔重要。所以在法國大革命期內，對於大革命的動力，與其超乎常情的表現，和巴黎公社與恐怖政治，都會經過過極劇烈的辯論，乃是一件容易了解的現象啊！革命的敵人，就以這些事實，證明革命的慘酷。反之革命信徒，則以辯護這些行動爲其天職。他們並不說是恐怖政治爲革命期內的一個特殊現象，屬於過去時代而將來不會再發生的現象；或說是那種恐怖政治爲當時特別環境所迫成的事實。他們還要更進一

步，以恐怖政治，爲解放被壓迫民衆不可死避的現象。馬克司在一八四八年亦以革命恐怖手段，爲保障革命的勝利的力量；雖然他對於一七九三年的遺傳性，所經持過反對的批評態度

在新萊因新聞 (New Rheinische Zeitung) 上馬克司曾屢作論文；替恐怖主義辯護。一八四九年正月十三日，馬克司在這個報上，發表一篇文章討論匈牙利的革命，非常重視這次革命的意義。他說：「自一七九三年以來，惟有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政府敢於以一個爲反革命的優勢所包圍的民族，僅持革命的熱情，反抗那卑鄙的反革命的憤怒；以赤色恐怖鎮壓白色恐怖。從許久以來，我們開始第一次發現一個真有革命熱情的領袖，敢於以國民的名義，向敵人作殊死的戰爭；集但唐 (Danton) 與開洛 (Carnot) 兩人的性格於一身，爲其民族增光。這就是匈牙利的革命家葛蘇士！」

在此以先，一八四八年十一月七號，馬克司於同一報紙上發表一篇關於維也納陷落的文章。他說：「給七月大革命一個致命傷的反對勢力，已在巴黎被擊破了。赤色共和國勝利之後，立即調動駐屯國內的軍隊向遠近的邊境移動。革命與革命的勢力，均集中疆場開始作最後的比賽，我們回憶七月的史跡，追懷十月的悲壯（維也納約陷落是在這個月內）我們不禁

大呼：『*Yavitchi*』七月到十月幾個月裏毫無結果的殺戮，二月到三月兩個月裏若長的慘劇，與反革命本身的殘忍，使民衆得着一種沈痛的教訓：覺得要減少革命過程的痛苦，使舊社會三點滅亡，新社會早點誕生，祇有一條路可走，這就是革命的恐怖主義。

實際的證據，沒有舉出，但在革命家的內心生活，發現了激增的矛盾；過去現象的研究，使他們又成爲恐怖主義的鼓吹者，那是不容諱言的事實。但是現今的境況，又發生了相反的傾勢。因爲人道主義的思想，深入人心；單管人命，濫用死刑，尤爲今日文明的人類所厭惡了。人道主義的思想，支配人類的實際生活，較之那研究歷史的結果而發生的恐怖主義之信仰，更爲有力。

伯爾里 (Borne) 在其「巴黎函牘」第六封信內，曾經論及一八三〇年六月的革命家云：

「他們狠迅速地勝利了，也很快的平靜了。民衆對於他們所遭受的災害，狠溫和地報復了，而且很快的忘記了。除了在戰場上的公開戰爭，傷害了敵人的生命以外，繳械的俘虜，從未殺戮一人，逃亡的叛徒，從未窮追一次，潛匿的敵人，徒未搜索一回，犯嫌疑的份子，也沒有助以任何方或騷擾，民衆的行動不過如此罷了。」

一八四八年二月的巴黎革命家態度寬容，亦如一八三〇年的革命家一樣寬容大量。即在

同年可怕的七月鬪爭裏面，那些參加戰鬥的工人，也是富有英雄的氣概，抱有堅決的忍耐；並非基於好殺的動機。却是他們的敵人，才算是一些殺人不眨眼的動物，他們不但捏造武裝暴動的慘酷事實，來煽動軍隊屠殺革命的工人；而且激怒知識階級，使他們仇視民衆。甚至資產階級醫生，還要拒絕診治受傷的革命戰士。馬克司曾在萊因新聞發表一篇有名的著作。他狠憤慨的說道：

「科學不是爲平民而存在的。平民惟一的不能以筆墨形容的罪狀：就是他們敢於爲自己的產存而奮鬥；不肯帖伏於魯易腓力普（Louis Philip）與瑪挪士特（Hern Manast）底鐵蹄之下！」

這是馬克司對於此種可恥之事的一種憤慨話。在這種深刻印象之下，馬克司用了他極沉痛的文章。播植在全巴黎工人的腦海中。當他們於一八七一年組織第二巴黎公社再度奪得政權的時候，猶有狠深刻的印象；因爲當時的工人，還有許多是曾經親身參加過那次鬥爭的人，於是大家預料以爲真如馬克司所言，工人報復的機會到了，恐怖的日子快要降臨了。

但是馬氏在其研究公社的著作，討論一八七一年的法國內亂（Der Bürgerkrieg in Frankreich）一書內，却又加以與前文不同的說明：

「從三月十八號起到凡爾賽軍隊逼進巴黎城那天止。革命的無產階級，雖避免了一切強暴的行爲；而革命與反革命的上層階級，反充滿了這種的殘暴行爲呢。（見同書 *Art. III*, 9, 36）

馬克斯在此處把強暴的行爲，認爲是上層階級反革命的行動；否認其爲無產階級的革命手段，不啻從根本上反對恐怖主義。

不久以前，有人咀咒我對於鮑爾塞維克的態度，是馬克司主義的叛徒；並且抄襲馬克司討論一八四八年的政治的言論，作爲引證。

我們現在可以發現背叛馬克司主義，不是我的罪名；馬克司自己已於一八七一年實行了。尤其使我們不能忘記的一點：就是馬氏前後的意見自相矛盾，中間曾經有過二十年的學術研究功夫。而此二十年研究的結果即爲大家所知道的一部偉大著作「資本論」的出世。若是我們討論恐怖手段是否爲革命的必需手段這個問題，要引證馬克司的話，就不能單引證一八四八年的馬氏所說的話，把馬氏在一八七一年所發表的意見拋在一邊。恩格斯(Engels)也和馬克司一樣，對於恐怖表示拒絕的態度。他曾於一八七〇年十一月四日寫信給馬克斯說道：

「吾人以爲恐怖政治有兩方面的解釋：一種是統治的人鼓動恐怖，一種是統治的人，本

身被人恐怖。(La terreur) 恐怖行爲的大部分，是無效果的暴行，而爲那班時懼本身政治地位動搖力求自固的人們所憤使。我敢堅持我的見解，以與一七九三年恐怖政治的罪惡，應當由那班膽小如鼠而以愛國者自稱的資產階級與那班拘謹的細民以及乘機打劫的暴徒，負完全的責任。

(Briefwechsel Zwis chen Masse und Engels IV, 379, 380)

馬克司的話是完全對的；當他以滿意的口吻指示出來說：第二巴黎公社，能夠不蹈第一巴黎公社的覆轍，避免一切無謂的暴行。即使在公社存在的時代，發生此類的行動，公社絲毫不負責任。這自然不是說恐怖主義的思想，在公社內沒有相當的影響；或者爲全體社員所反對。在事實上，絕非如此。

我們於此願作更進一步的討論，把巴黎公社與蘇維埃共和國作一個平行的比較；因爲後者常以前者爲其榜樣，辯護其一切行動。而且恩克斯亦曾在馬克司所著之「法國內亂」一書的第三版序言裏頭，聲明巴黎公社是一種無產階級獨裁的政體。所以我們對於這個獨裁制度，作進一步的考察，不是一件而益的事。

6、 第二巴黎公社

A 公社的起源

一九一七年的蘇維埃共和國，也如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一樣：同是對外戰爭失敗的結果。革命的主動者，二者同是革命的無產階級。祇有上舉兩點，是完全相同的。

鮑爾塞維克所以能夠獲得政權；就在他們能夠迎合人民厭戰的心理，排除俄國多數政黨的非難，堅決地主張停戰媾和。並且不顧媾和的結果，在國際上發生如何的變化。所以他們被人罵爲德意志軍國主義的走狗，正如印度的，愛爾蘭的獨立黨人，以及意大利的無政府主義者，在那個時代，被人罵爲同盟國的偵探一樣。法國的急進黨對於一八七〇的戰爭，則抱完全不同的態度：當他們推翻拿破崙帝國，宣佈第三共和政體，發現德國要求永遠割讓勞薩兩省的野心以後，他們反拒德意志君主同盟的精神，差不多等於一七九三年第一共和時代反抗全歐君主同盟的精神的復活。於是第一共和時代的精神久困復蘇，當時巴黎的無產階級，仍然繼續第一共和時代無產階級的精神，極力主戰。他們以爲祇有繼續對德宣戰，才是擁護共和政治的出路。

但是一八七〇年的法國農民，已非一七九三的農民了。第一共和時代，法國農民猶極端仇視巴黎，嫉妬巴黎的統治；到此時，他們也感覺有共同抵制國內敵人的必要了。因爲敵人

的勝利，將使封建的剝削勢力，死灰復燃；已經分配與農民的教堂產業，有得而復失之虞。一八七〇的法國農民，認識普魯士的勝利，絕不至發生同樣可怕的現象。他們注意的中心點，卻是教堂的利益；而勞薩兩省的損失，在他們心目中，反不甚重要。惟有因戰事而發生的過重負擔，使他們感受莫大的痛苦。在戰爭期內，除了勞薩兩省的人民，在最後的瞬間反對割讓，猶作困獸之鬪的念頭以外；全法的農民與小城市的居民，均一致要求和平。這種和平的思想，自然與急進的好戰的巴黎發生衝突；而為反動派帝制派所乘。

一八七一的法國情形，亦與一九一七年的俄國情形一樣：主張和平的政黨，順應人民厭倦戰爭的心理，壓倒了主張繼續戰爭的政黨。但在 一八七一年，和平的意志，不是像在俄國一樣，增強了過激派的勢力，反而延長了反動派的壽命！

在一八七一年二月八日，一個負有停戰媾和的任務的國會選舉出來了。國會內部的份子，祇有兩百名是擁護共和政體的人物；反而帝制派的議員，則佔有四百名的坐席。「全國各省一致的要求和平，不管付以任何的代價。而巴黎則不顧如何重大的犧牲，主張繼續宣戰。巴黎所產生的國會議員底惟一任務，就在貫徹繼續戰爭的意旨。以割讓土地為換得和平的代價，那是巴黎絕對不能容忍的事。」（參看 Louis Dulrevih, La Commune Paris Jussies Rouff）

同年二月十二日，國會在波多士（Boulay）地方召集開會；以五一六票對一〇七票批准媾和條約。而此主戰一〇七票當中，差不多有一半是巴黎的代表。

批准媾和條約，是選舉這次國會的惟一動機。人民投票的標準，也祇顧及這一點；所以帝制派在國會中佔多數，並不是人民反對共和政體；不過是人民需要和平的一種表示而已。等到議和成立以後，國會就應閉幕。一個新的國會，就應當馬下選舉出來；決定法國的憲法。而選舉的結果。或者可與在波多士所召集之國會有些不同，因為反對共和的勢力，沒有反對戰爭的心理，那樣普遍而強烈。在事實上，一八七一年四月三十日全法的地方議會選舉，共和黨人果然佔了絕對的優勢。這正是國會中的腐敗貴族所嚇怕的事，於是他們就努力設法維持原有國會的地位，破壞新國會的召集。

這個國會儼然以合法的國會自居。若是他們內部不起爭端，也許帝制又要復活。共和的政體得以維持，也就是因為他們內部意見紛歧：一半主張擁護現有的王朝，即一八三〇年的王室統治的法國，一半主張擁護新立的王朝，這是一八三〇年革命以後所擁載的王室。雖然如此，他們仇恨巴黎的心理，還是一樣的。所以支持法蘭西共和政體的柱石，就是巴黎。這個柱石，自從一七八九年以來，屢次表顯過很大的力量；所以巴黎的勢力一天不消滅，帝制

的復活，就一天不可能。

各省的人民，仍然不斷的反對巴黎。拋開巴黎人信仰的社會主義不說；在他們的心目中，巴黎人盡是一些傷風敗俗冒瀆上帝野蠻好戰的動物。國會方面，對於巴黎也自始至終表示非難。可憐那些勇敢的巴黎人，爲了保障祖國的安全，忍受了五個月的長期血戰。到了現在，還須遭受本國同胞的凌辱。國會與其選舉的行政首領梯爾氏（Thien）的隱憂，就是怎樣可以解除巴黎的武裝；使巴黎再無反抗帝制陰謀的勢力。如何可以奪取巴黎的自治權，使之喪失首都的地位。巴黎的武裝暴動的爆發，卽由此種局勢爲其導火線。

吾人於此，可以知道法國革命的環境，與俄國鮑爾塞維克是如何的不同。俄國的鮑爾塞維克有廣大農民的羣衆，作他的後盾。能夠利用人民要求和平的心理，獲得社會的力量。卽在國會內與鮑爾塞維克對抗的，不是反動的帝制派，而是社會革命黨人與少數派社會民主黨人。

所以鮑爾塞維克的革命與第二巴黎公社，不但出發點不同，就是最後的動機，也是不同的。

鮑爾塞維克之獲得政權，事先已有預定的計劃；所以一擊之下，立卽佔領整個的國家機

關；以猛烈嚴酷的手段，對於所有的政敵，加以政治的經濟的迫害。就是對於本屬於無產階級的政敵，也採取同樣的對付手段。巴黎公社的起事，不但出於平常人意料之外；而且爲革命家自身所驚奇。他們當中的一大部分，還不願馬下發生這樣公開鬪爭事實。但是基於大革命時代的遺傳，武裝暴動這個革命策略，容易爲巴黎民衆所接受。而贊助這種策略的革命家，在社會主義者當中，就要首推布朗葵派(Banglston)了。布朗葵派同雅各賓派後雖在戰爭當中，曾有許多次騷擾的嘗試，卒因得不到相當的援助，歸於失敗了。

十月三十一日買志(Metz)陷落的消息，傳到巴黎以後，他們立即將公社的選舉，宣布展期，以便前線的軍隊專心對外作戰。而他們所持的理由，同一七九二到一七九四年的第一巴黎公社一樣，出於愛國的動機，絕非站在社會主義的立場。於是一部分擁護政府的國民自衛軍，以後不費一矢不折一兵，就把公社運動鎮壓了下去。政府軍隊，亦未碰到任何有力的反抗。

政府爲鞏固其地位起見，乃於十一月三日在巴黎舉行人民投票。投票的結果：居然有五五八，〇〇〇票信用政府，祇有六三三，〇〇〇，票是反對政府的。

那班直接參加革命行動的人物，雖然當時在巴黎流行的愛國口號之下，極力主張繼續宣

戰；但不久就不惜背叛自己的主張了。當政府將戰爭失敗的消息宣佈的時候，結果引起了革命家的憤怒，隨即發生比較十月三十一日的暴動更可怕的內亂。但是這次的內亂，旋即被政府毫不費力鎮壓下去了。

這次的失敗，那班直接參加革命行動的人，都垂頭喪氣，無法自振。所以他們在三月十八日以前，猶未着手準備第二次的暴動；而國際社會主義者，就根本反對暴動的計劃。當拿破崙被九月革命運動推倒以後，馬克司立即寫信給恩格斯說道：（6, 9, 1870）「當我正要坐下寫信給你的時候，徐賴理（Sennellien）同志忽然走來對我說：他準備明天離開倫敦到巴黎去，預備在巴黎祇勾留數日。此行的主要任務：是要與巴黎支部協商國際的事情。我認爲這目前必須商辦的事，因爲全法的分部都向巴黎集中，在國際名義之下，做出許多不合理的事情來了，他們想立刻推翻臨時政府，組織巴黎公社，任命俾亞特（Piat）爲法國駐英公使。」

……
馬克司接着又說：

「我今天從巴黎支部接到一份忠告德國國民的宣言。（我打算把這份宣言明天寄給你看據我的意見，另外還須有一份對參謀部緊急的請願書，一份特別對德國人民的宣言；這是我

在今晚以前曾提議過的事體。請你在可能範圍內，趕快替我搜集一些關於勞薩兩州的英文材料，與對於起草這個宣言有用的軍事參考書籍。」「我今天已經詳細地答覆了巴黎支部，並準備着手一件麻煩的工作，要使巴黎同志對於事實的真況，有明確的了解」。 (*Briefwechsel Znsischen Engel una Max Ia, S, 330*) 近來有人罵我是馬克斯的叛徒。以馬克斯的革命情火，與熱烈的性情，若是他仍健存，也許同情鮑爾塞維克底策略。但在此處，我們可以看見馬克司在大革命的時代，是抱怎樣的態度。馬克司認定他的惟一任務，是在用冷靜的頭腦，觀察事實；使他的同志，對於事實的真況，有明確的了解。我們在此不可看見馬氏怎樣抑制自己暴躁的性情，對於當時計劃中的革命暴動，不惜錫以愚蠢行爲的惡名。

九月七號恩格斯用書面答覆馬克司的來信，內容如下：

「都榜 (Dupont) 已經走了。他在此曾經勾留一晚。他看了巴黎寄來的宣言之後；表示非常憤急。嗣後我告訴他說：徐賴理已由倫敦動身到巴黎去了；在他未動身以前，曾經同你討論過一切的事情，他始放心。都榜同志是一個眼光很敏銳的人，他以爲我們目前的工作，是要利用共和政體所付於民衆的自由，加緊黨的組織工作。實際行動的開始，須在組織嚴密機會成熟之後。他以爲法國的國際主義者此時應當忍耐以待和平之成功。」

關於此點，馬克司在九月十日答覆恩格斯說道：

「請你轉告都榜同志我完全贊同他的意見。」

從此看來，馬克司當時認為迫切的工作，是要嚴密黨的組織工作，而非實際的行動。在這個意義上，國際派在法國也很活動。但是他們從未想到準備立刻暴動起來。

有一件事實可以作為證明，二月二十二日國際同盟巴黎支部召集會議，會議席上忽有一個會員，提議於二月二十四日舉行一個紀念一八四八年革命運動的示威遊行；大多數列席的會員，考慮全般局勢之後，認為時機尚未成熟；所以對於這樣溫和的舉動，也不贊成。佛蘭克 (Frankel) 且作進一步的提案：要求他的同志，目前應將力量集中，努力做組織無產階級的工作，與急迫經濟問題的研究功夫；猶其應當研究在革命鬥爭期內如何解決房租問題與失業問題。出席國民會議的代表馬朗 (Malon) 與托萊 (Toulin) 兩個同志，應當把工人的意志，時時刻刻在那裏表演出來。

根據佛蘭克的提議，大會否決召集示威遊行的主張；但允許會員個人可以自由參加此種的集會。

這件事實足以證明武裝暴動，在當時並沒有深切的需要。然而武裝暴動的事實何以終於

發生，這並不是由於革命的煽動，完全係由反革命派武裝民衆的結果。因為當時戰事緊急，政府徵募巴黎無產階級的分子，編入軍隊，加以武裝的訓練。而這種情形，自然使梯爾（Thiers）左右的貴族官僚奸商，認爲一種莫大的危險。所以在媾和條約簽字以後，他們立即感覺有解除軍隊中無產階級的武裝的必要，於是開始準備繳除國民自衛軍的武裝。

巴黎國民自衛軍藏有大宗巨砲，自然使德國的當局爲之眼紅。布基（Bougin）有一次說得很對。他說：德軍的猛進，無異火上加油，促成這次暴動的勃發。（Georges Bougin, *Histoire de la Commune Paris 1917S*, 43）

戰勝者盡量地剝削戰敗者，乃爲戰爭制度的必然的結果。軍事家的任務：不止戰敗敵人，就算完結；而且要把被征服的敵人置之絕地，才算稱心快意。政治家的任務：就有些不同了。他應當眼光放大，注意到將來與今日的敵人共同生活的條件。

這兩種意見，在每一次的戰事中都要發生衝突。若是軍事家的意見能夠支配政治，就會引起不幸的結果。俾斯麥在一八六六年雖然能夠擺脫軍事思想的支配，卻也費了不少的力氣。偏偏不幸，一八六六年戰爭的結果又增加了普魯士軍很大的聲勢，而一八七〇年的勝利，普魯士軍國主義的氣燄，更是日高萬丈。俾斯麥處在這種環境之下，不但不能脫離軍國主義

的臭味，他的政治理解，反而被軍國主義的思想迷惑住了。

因此普法戰爭，法國恥受城下之辱。勞薩兩州土地的割讓，不但使戰爭延長了幾個月的時期；而且促成俄法的協調，造成這次世界大戰德國慘敗的主因。

人類的眼光，總是短視的居多。勞薩兩州土地的割讓，在經濟上在軍事上究竟是一件馬下看得見的利益。然而普魯士貪念無窮，並不以勞薩兩州之割讓，就算滿足了。普魯士還想給那反抗普魯士軍隊最有力的中心點——巴黎——一個重大的打擊；所以在二月二十六日普魯士竟壓迫法國允從三月一處起讓普國軍隊進佔巴黎 Champs Elysees 地方。當二月二十七日普魯士軍隊進城的消息傳遍巴黎的時候，巴黎的民氣，異常激昂。大家都準備軍器以武力抵抗強敵的侵入。所以國民自衛軍，一致宣言，願為祖國之自由，流其最後的一滴血。

此時惟有國際社會黨人，仍持鎮靜的態度。他們不但視武裝暴動，反抗內奸為危險的事；就是以武力抵當外敵，也會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他們忠告國民自衛軍的幹部，叫他們放棄武力反抗的計劃。否則七月大屠殺的慘劇，巴黎工人階級的大犧牲，將為不可避免的結果。積極方面，他們向國民自衛軍建議，築一道防禦線，包圍普魯士的軍隊；使普軍與巴黎居民隔絕，藉以避免直接的衝突。

國民自衛軍的幹部，在最後的剎那間，方才決定變更原來的計劃。在那個時候，以德人之驕傲，沒有釀成世界史上大屠殺的慘劇，我們不能不感謝國際社會黨人的鎮靜。不料幾星期以後，迫成巴黎無產階級大流血的慘劇，却不是普魯士的軍隊，而為法國本國的兵士。

正月十八日在巴黎簽字的普法和約，法國方面已允將城內軍隊所有的軍用品，移交與普魯士的軍隊。但是國民自衛軍的槍械，機關鎗與大砲，一概除外；因是這些槍械，非國家所有的武裝，是由人民集資購備的武器。

當普魯士的軍隊，快要進駐巴黎的時候，法國政府對於藏在佔領區域以內的大砲淡然處之；並未設法把這些大砲移存安全的地方。政府的態度，似乎願意將這些武器拱手讓諸敵人，藉以減少國內政敵的勢力。然而國民自衛軍則極力設法保護送四百尊大砲；事先早已佈置妥當，業於德軍未進城之先，將這些武器移到德軍不易覺察的地方，祕密保藏起來了。

停戰以後，政府開始密謀將這些武器收為國家所有，藉以解除巴黎國民自衛軍中無產階級份子的武器。

國會方面，亦以取消首都的地位，(Decapiter et decapitaliser) 威嚇巴黎。為達到這個目的起見，國會決議不在巴黎開會。後經梯爾氏的努力斡旋，才決定在巴黎的附近地方凡爾塞

召集會議，並預定三月二十日爲國開會幕的日期。國會爲求其安全不受巴黎的騷擾起見，預定於三月十八日沒收國民自衛軍的大砲。

梯爾氏以爲沒收這些武器最巧妙的方法；不必以武力公開奪取，最好暗中偷出。於是密遣軍隊在三月十八日早晨三點鐘，當巴黎全城居民正在酣睡的時辰，佔領 Montmartre 企圖運開那些放 Montmartre 無人護守的大砲。事不湊巧，他們忘記了攜幕拖載重砲的馬匹；還須派人回營徵調馬匹。於是被人發覺了，立即一傳十十傳百，哄動了全巴黎的人民，有如蜜蜂似的集合攏來，警告在場的兵士，不可與人民爲敵，替政府作鷹犬，搬運人民公有的武器。不料居然收了效果。

這些曾與巴黎人民在艱難困苦境遇之下共同生活共同奮鬥過的，和同受過無用的上級軍官侮辱的兵士，立即大受感動，願與人民和國民自衛軍攜手。他們不但拒絕了指揮官李康木 (General Leconte) 將軍向徒手羣衆開槍的命令；反而倒戈相向，將他捉住鎗斃了。

反對公社的人，往往好以鎗斃李康木將軍與同日早晨殺死湯姆士將軍 (General Thomas) 的事實，歸罪於公社。

其實反對公社的人，犯了一個錯誤而不自覺。他們忘記了發生這些事的時候，公社還沒

有成立。就是把這些事歸罪於巴黎人民，也是同樣無理由的；因為這些殺人的事情，都是兵士釀成的，絕非民衆的行動。就是宣布李康木與湯姆士應得死刑的軍事裁判所，亦係由兵士所構成。總而言之，無產階級的思想，絕不嗜殺；祇有軍國主義方以人命爲芻狗。最奇怪的：就是那些自命爲擁護人道主義的人物，憤恨兵士搶殺殘忍成性的將官；偏偏會把命令這些兵士向徒手婦孺開槍的事實忘記了。「他（指李康木將軍）的兵士，不肯鎗殺徒手的婦孺，反而把他自己鎗斃了。原來兵士好殺的習性，早已由工人的敵人所養成。我們自然不能希望積重難返的習性，在他們走入工人隊伍中的時間，就立即消失了。」

國民自衛軍爲避免流血慘劇的發生，不得不過問此事。在事實上，他們有時還敢不避自身的危險，阻止不幸事件的發生。所以那些爲兵士所逮捕的軍官，祇有兩名被害，其餘的都安然無事，死裏逃生。三月十九日國民自衛軍的幹部，發表一篇抗議書：聲明始終沒有參加任何流血的案件。以後又在三月二十日公社出版的公報上，發表一個嚴重的宣言。內說：

「有人想以卑污的流血案件，破壞我們的名譽。吾人於此，不得不加以嚴重的反駁，認爲是一件可憐的污名。現再鄭重聲明：吾人未曾置任何人於死地，國民自衛軍也從未犯過如此的犯罪行爲。」

這篇宣言，不但駁覆了那些原告人；而且把那些行爲歸罪於民軍的人們，也加以呵責了。

政府軍隊現已譁變與人民攜手。此時的政府當局，祇有兩條出路。一爲開誠佈公與憤怒的民衆談判妥協的方案；一爲拒絕人民的要求，設法逃亡。梯爾氏——不願提出談判的話，匆忙地逃出巴黎；並把那些未受煽動的軍隊，調出城外，放棄巴黎四圍的砲台要隘。

若巴黎人民在當時能阻止梯爾氏的出亡，或者可以佐政府當局俯首低頭於人民意志之前；卽是調開巴黎的軍隊，也許不敢抵抵。那些軍隊的軍官在事後是如此說的，事成過去，後悔不及，巴黎人民不得不組織一個新的政府了。根據當時的環境；這個政府自然不能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在新政府成立之後；本應立即解散舊國會召集新國會。藉以鞏固共和政體，實施地方自治，解散常備軍，代以民軍制度。而且這種政策，依當時法國的情形，皆有實現的可能。但是事實出乎吾人意料之外：新政府不但容忍梯爾氏仍舊擁有大部分的軍權；且假以機會，使其在凡爾塞整軍振武，有羽翼日豐之勢。

梯爾的逃亡，確出乎巴黎人意料以外。所以巴黎人民預先毫無組織，可以代替逃亡的政府當局，執行國務。一直到三月十九日早晨，全巴黎猶陷於無政府的狀態。事後迫於時機的

緊迫，國民自衛軍的中央幹部，方自動的出而維持秩序；於是以一個無具體政治方案與固定策略的團體，代替了政府職權。中央幹部為減輕其責任起見，將巴黎的政務信托魯烈（Lurier）一個人全權處理。魯烈是一個沈溺聲色的人物，在政治上絲毫沒有能力。而且大家不知道他是「一個患精神病的人物，還是一個謀叛的叛徒。他登台之後，在二十四小時以內，就做出許多不可補救的錯誤。……這樣不幸的選擇；我們祇能說是當時環境的反映。」

等到四月初三，巴黎才決定向凡爾賽進攻。不料時機稍縱即逝；若在三月十九日向凡爾賽進攻必獲勝利的結果，一到四月三日反變為失敗的原因了。原來進攻凡爾賽之先，大家都如此揣測；以為敵方的兵士，將如三月十八日，那天一樣，內部發生叛變，與巴黎人民攜手。不料事實完全相反，梯爾的軍隊，不但沒有譁變，巴黎國民軍反而遇到頑強的抵抗，且被其擊退了。從此以後，巴黎人對於凡爾塞祇能採取防禦的戰略。失敗的命運，即於此時決定了。巴黎的起義，從此時起，完全為無產階級所撐持了。大多數的資產階級搖惑不定袖手旁觀，竟讓無產階級獨當其難。依上所說，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聖彼得堡的武裝暴動為一八七一月十八日巴黎的武裝暴動，處境的難易，是如何的不同。聖彼得堡的武裝暴動，有一個以工人為士兵如後盾的革命團體，作事先的準備，組織一切反對政府的勢力；而且這個政

府的孱弱無力，也如一八七一年梯爾的政府一樣。

以迅速的手段，佔領首都的一切權力機關；自然不是使鮑爾塞維克成功的惟一要素。全國權力關係變動的有利形勢，才是鮑爾塞維克成功而一八七一年巴黎失敗的主因。

當克倫斯基(Kerenski)向加錫萊(Gakhnia)地方逃命的時候，狼狽的情形，亦如當時的梯爾向凡爾塞逃亡的情形一樣。全國的農民，與前綫回來的軍隊，都對佔領首都的革命黨，表示同情；攻擊克倫斯基，——政府。蘇維埃政府的命運，遂因此而鞏固了。可惜當日的巴黎革命政府，缺乏同樣的基礎。但在另一方面看：這種現象，使革命的隊伍中平空添加許多在經濟建設上反動的份子，爲巴黎公社當時所絕望的現象。所以巴黎無產階級的狄克推多，不是樹立在農民協會這個基礎上面的。

B 工人評議會與中央委員會

巴黎公社與蘇維埃共和國的出發點完全不同，二者之組織方式與策略，亦非一致。

巴黎公社祇有一種組織是與蘇維埃相似：此即所謂工人評議會與兵士代表會議。此外巴黎公社還有一點與蘇維埃相同，即在未奪取政權以先，二者同處於暴君政治之下；不但民衆的政治團體受嚴厲的壓迫，就是工人的集會結社，也被禁止。

所以德國的工人，在一八七一年九月四號以後，缺乏富於戰鬥能力的政治組織與職業團體，也與一九〇五年與一九一七年俄國的工人相同。馬克司主張工人階級起始的運動，必須利用民主政治憲法上的自由權利，嚴密本身的組織，養成相當的政治能力；萬不可過於躁急，耗費有用的精力，實行那種無益的，時機尙成熟的暴動。馬克司這個主張，即是以上面所說的歷史事實，作為立論的根據。

無產階級一旦出乎自己意料之外獲得政權以後，立即張皇失措，無所適從的原故；因為平日缺乏相當的政治組織與職業組合，此時不得不急於尋求補救的方策了。

俄國的工人，則以近代大規模的生產組織發達的原故，早已有了相當的組織。

近代實業已摧毀家長式的工頭底小工場生產制度，代之以工業資本的生產了。近代工廠的工人，亦由資本家用軍事的組織方式組織起來了。因近代工廠之勃興而形成的實業軍，亦如普通的軍隊相同，必須受下級官長與高級官長的監視與保護。

因工廠制度的勃興而形成的實業軍，祇需資本家委任的工廠管理員稍加淘汰，近代工廠的組織，即可形成工人階級的階級組織。俄國無產階級，即以此為基礎，建設工人蘇維埃。這種組織與產業發達之國家的政黨組織與職業組織比較起來，並非高度的組織形式；乃僅為

補救缺陷的產物，與一種救急的方法。

巴黎的工人，連這種救急的方法，都未曾得到。那時巴黎所有的工業，大部分是一些奢侈工業，絕少近代大工業的痕跡。即在第二公社的時代，家長式的工頭底小工場制度，猶佔生產界的優勢，近代資本主義化的大工廠，完全沒有；這是與一九一七號俄國的實業情形大不相同的地方。俄國雖然是個產業落後的國家，工業的人口比較農業的人口相差很大；但是已經存在的實業，差不多都是大規模的企業。

所以巴黎的工人不能同俄國的工人採用同樣的救急的方法，補救那因缺乏相當的政治經濟組織而發生的缺陷。國民自衛軍的組織，即因此應運而興。

一七八九年的革命最大的影響，即為全民自動武裝。這種民衆武裝，無產階級與資產各有不同的目的。就無產階級與貧困的小資產階級而言：他們自動武裝自動組織的動機，因為這次武裝暴動沒有完成他們的希望，滿足他們的需要；但在當時的環繞之下，這種希望，也無實現的可能；所以他們發生一種信念，想以武裝的力量，推動革命的進行。

就資產階級而言，又迥不相同了！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已給與那班資本家與頗有貲財的市民以及那些狠可度日的知識階級所需要的東西了；所以他們武裝與組織的意思，就是要保

持已經到手的利益。一方要防止想死灰復燃的封建勢力，一方抵制憤怒下層階級的反抗。他們底武裝勢力，即爲國民自衛軍。資產階級經過這次革命的爭鬥以後，變成了實際的勝利者；因此有產階級的武裝勢力，——國民自衛軍——對於政府能夠保持相當時期的獨立；並可自己任命軍官，就是這個道理。

國民自衛軍的鼎盛時代，約在一八三〇年到一八四八年之間；然而仍未挽救七月王朝的危局，且於一八四八年表示其無力。道拿破崙第三即位，旋又取消其獨立，並剝其推舉軍官的權利即在一八一五到一八三〇年波爾波恩（Bourbon）時代，國民自衛軍也無自己推舉軍官的權利，然而拿破崙第三更無勇氣，根本掃除國民自衛軍的武裝勢力。

一八七〇年普法不幸開釁，法國大受挫敗之辱；於是又喚起了一七九三年的精神之復活，使法國人民重行武裝起來，*Lève en Masse* 繼續那個時代反抗全歐的精神，抵抗強鄰侵入。

國會爲環境所迫，乃於八月十一日在巴黎通過華賴氏（Jules Favre）的提案，將國民自衛軍編爲國防軍隊。巴黎國民自衛軍，原有六十支隊，將校兵士多爲有產階級出身的份子。此外新成立二百個支隊，將校兵士，差不多全係貧困階級的份子；而且這二百個新成立的支

隊，取得自己推舉軍官的權利。

於是巴黎國民自衛軍中所有新編成的支隊，就變成了無產階級的真正組織。

國會通過擴大國民自衛軍組織的法律完全基於忽然恐懼強敵的心理；並非慎重考慮的結果。所以不久又千方百計，阻止國民自衛軍勢力的擴大。但是巴黎的無產階級即已武裝起來，羽翼已成，當然很難阻止了。當時巴黎的軍事機關全在托勞西氏 (Trotsky) 指揮之下，他對於國民自衛軍的訓練，漠不關心；以致不能使國民自衛軍，成爲捍衛國家的勁旅。法國統治階級懼怕巴黎工人階級的心理，猶勝於恐懼德皇威廉底軍隊。統治階級這種卑怯的心理，竟演成違反國家的利益而不自知的怪劇。當普魯士軍隊包圍巴黎的時候，域內尙駐有常備兵十萬人，護國遊擊隊十萬人，我們又假定三十萬國民自衛軍當中，能夠挑選出來二十萬有戰鬥力的兵士；依此推算，法國尙可調集四十萬大軍。若調度得法，以之抵擋當時包圍巴黎的德軍，必定綽有餘裕。

從八月起計算，那時本來還有充分的時間訓練國民自衛軍，使之成爲勁旅。

當時若能照此做法，防守巴黎的兵力，本可以超過普魯士的兵力。若是當時能夠集中兵力，截斷普軍的包抄線，普魯士的軍隊，就很少勝利的希望了。

實現上述諸事的前提，不用說是要趕快訓練國民自衛軍使之成爲勁旅。然而法國當局甯願戰事失敗，割地賠款，偏不願看見本國無產階級的武力日趨強大。

巴黎人民也知道當局的用心，所以反對政府的空氣，甚爲激昂。巴黎屈服於普軍之後，（正月二十七日）法國國會的選舉旋即告成。巴黎人民此時也已經知道國會與人民的衝突，好似箭在弦上有不得不發之勢；因爲國會仇視共和政體，對巴黎表示十分露骨的惡意。但巴黎此時惟一可靠之勢力，厥維國民自衛軍。

國民自衛軍當中，革命的部隊在戰事期內彼此向有極密切的聯絡。現在他們又重行結合，組織一個同盟，而國民自衛軍被人稱爲同盟軍者以此。

二月十五日革命的部隊召集代表會議，討論同盟的進行事宜。這次會議，設立了一個章程起草委員會；並決定二月二十五日召集第二次會議。但是那時德軍逼近首都的危險，使大家都心忙意亂，那裏還能以冷靜的腦頭討論一切哪？於是這個會議，不幸中途停頓，大家一致出發，參加在 Bastilleplatz 地方舉行的革命示威運動。

因爲德軍的進逼迫在眉睫，國民自衛軍爲避免臨時慌張起見，不久就發起組織一個臨時中央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經過三月初三召集的代表會議通過之後，就取得了合法的地位。並

規定委員會的人選由全城二十區 (Arrondissements) 各推代表三名組織而成；其中兩名由大隊評議會產生，其餘一名由大隊公推。每一大隊，等於一區的都隊。三月十五日合法的中央委員會正式成立，臨時中央委員會當然即於此時告終。

這個中央委員會，可以叫做兵士代表會議；因為所有的委員，都是由國民自衛軍推選出來的，也可說是由無產階級的或與無產階級接近的國民自衛軍推舉出來的。而那些與有產階級接近的都隊，完全沒有參加。根據中央委員會的報告：三月十八那一天，巴黎國民自衛軍二六〇個都隊當中，已有二一五個都隊，隸屬於中央委員會指揮之下。

巴黎分社雖然不是蘇維埃式的組織；但是這個中央委員會，似乎是一種工人評議會。我們可以把他當作一個聯絡工人評議會與兵士代表會議的中樞機關。

三月十八日賴蘇氏 (Lassaux) 政府推倒以後，一切政務陷於停頓，無人過問。於是巴黎的政權，自然落到這個中央委員會的手上；因為這個委員會，是當時巴黎唯一的組織，猶為人民所信用的機關，雖然那些委員，不是一班有聲望的人物。

三月十九日中央委員會召集會議開始討論，以後怎樣進行。他們在這裏所犯的錯誤，也和通常一樣：以為宇宙間一切的現象，「不如此必如彼」，忘記了，「如此也可以如彼」。所以

社會主義者，時常作不斷的爭論，以為改良與革命不能同時並存；其實改良運動與革命運動，不但不互相抵觸，而且可以相倚而成。

三月十九日在中央委員會中，議論紛紜，莫衷一是。有人主張立即向凡爾塞進兵，有人主張立即以投票的方法，訴諸國民的公意；有人主張須儘先實施革命的條例。似乎這些主張，沒有同時並進的可能；或者以為人實行了這一個主張，會使另一個主張的進行，發生阻礙似的。中央委員會祇採取一個認為最緊急步驟：他們極思表示巴黎的事變，不是少數人的事業，而為大多數選民所同情的舉動；藉此增加武裝暴動的道德力量。

中央委員會這樣的想法，完全是對的；可惜時機未得其當，反而為敵人所乘。在那個時候，想以投票的道德力量，制服以強大武力為後盾的敵人，終是書生的見解。

惟有公社選舉一事，卻是當時必要的。就是一反帝國時代的政策，允許巴黎人民以普通選舉法為根據，立即實行公社選舉。巴黎工人在一八七〇九月帝國推翻以後，曾極力向臨時政府要求，立刻實行公社的選舉。而當的臨時政府，懼於民衆的威力，業已表示允許。不料臨時政府食言而肥，引起民衆的不平；所以十月三十一日與下月二十二日的武裝暴動，就在「公社萬歲」這個口號之下湧現出來！

因此馬下實行公社選舉，是當時必要的事。

選舉的日期，原本規定爲三月二十二日，後改爲二十六日。而中央委員會對於選舉僅以普通選舉的監視人自居。三月二十日中央委員會在“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Sous la Commune*”報上通告巴黎市民說：「二三天以內你們將被召集行使天賦的自由權利，選舉巴黎的市區代表；將臨時政權，信用國民所公舉的人物。中央委員會認爲目前最緊迫的事，莫過於此！」

中央委員會這張預約券，不幸終成廢紙。公社成立以後，中央委員會即於三月二十八日將其政權移交公社；並且有意宣布自行解散，然而究未實行。於是中央委員會在公社指揮之下，構成軍事機關底一部；這並不是爲求辦事敏捷指揮統一的原故。但是中央委員會也從未違反一切權力屬於選民的原則，要求一切權力應當歸於工人評議會與兵士代表會。依當時之情勢而論，所謂工人評議會，與兵士代表會，卽爲國民自衛軍的中央委員會。

就這點講：巴黎公社與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恰恰是相反的。但是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三月十八日巴黎公社二十週年紀念大會席上曾經說過：「各位先生你們願意知道無產階級的狄克推多究竟是怎樣麼？那末，請你們看一看巴黎公社，那就是無產階級的狄克推多。」

從此看來，馬克司與恩格斯並不以取消普通選舉與反對德謨克拉西爲狄克推多的必然現象。

C 公社中的雅各賓派

三月二十六日的選舉，總共選舉出來九十位公社社員。其中有十五人是屬於政府黨的人物，六個資產階級化的急進黨人。這六位急進黨人，一方面是政府的反對黨人，同時又反對武裝暴動。在蘇維埃共和國裏，這樣反對政府的人物，不但沒有當爲公社社員的可能；就是做一個選舉候補人，也是一件不能容忍的事體。然而公社始終尊重德謨克拉西的原則，對於反對黨的參加選舉，絲毫未曾加以妨害。

至於公社的失敗如此之速，不能歸咎他人，全由本身組織太不健全的原故。公社社員中有許多不負責任的份子，而少數社員竟有在頭一天就走開了的，有幾位社員竟在公社未開會之前，就已辭職了；因此社員缺額甚多，不得不於四月十六日重行補選了。

大多數公社社員是同情武裝暴動的人物，但是公社中的革命份子，並非完全是社會主義的信徒。

公社中的大多數是純粹革命黨出身，已如前述，他們的思想行動，完全受一七九三年原

則上的支配，與雅各賓派的影響。一八四八年，已有許多人服膺雅各賓派的思想；還有許多人因為從事政治的爭鬪，拋棄原有的職業，變為職業革命家了。那些比較年老一點的人物，又完全生活於舊時代思想與習慣之中，對於新的理想，沒有若何的興趣。

「那班年輕的人，又大半是些輕躁而缺乏真實本領的活動份子；徒鶩虛名，不顧實際。他們現在把武裝暴動視為兒戲，也和幾月以前把戰事當作兒戲一樣。他們猶喜以誇大之言自滿，使革命的工作，僅有外表的張揚，毫無充實的內容。就是他們當中最好的人物，也祇限於有較好的氣質和性情這點上面。」

上面一段話就是那個有名的革命家都博義（Dubrenich）氏對於那個時代最恰當最沉痛的判語（*La Commune* S. 332）這些革命家，大多數是些不知道社會主義為何物的人物；有的對於社會主義，還取敵視的態度；其中猶以德賴斯格魯才（Deles-Cluze）反對社會主義為最厲害。我們若把這班人物，叫做資產階級的政治家，說他們代表有產階級的利益，那又大冤枉了。他們的行動，是完全站在下層階級的立場，也和一七九三年的山嶽黨一樣，是為無產階級的利益而奮鬥的革命黨。祇因他們同山嶽黨一樣，不能逃出小資產階級的財產觀念法律關係的圈套，歸根到底，仍然脫離不了小資產階級的臭味。以上所述，就是公社中大多數革命

家的情形。祇有少數人，才是真正代表無產階級的份子；並且有許多是由官吏，配藥師，發明家，律師，新聞記者出身的人物。

另外還有七個布朗葵派(Blanquistes)的社員，連布朗葵自己也在內。但是多半不肯出席公社會議。他們對於武裝暴動的預期，與雅各賓派不同，舉一件事實可就證明：布朗葵在三月十八日武裝暴動發動那天以前已經離開巴黎，到別處養病去了。

三月十七日布朗葵在費基 Figeac 地方 (Department Lot) 被捕。

布朗葵派的意見，有一點是與雅各賓派的意見相同的。他們都主張拿武裝暴動的手段，佔領巴黎，然後以巴黎為革命的策源地，厲行高壓政治，統治全法。而且布朗葵派較雅各賓派更進一步，以為僅是如此，若不能利用這個統治權，創造一個新的社會秩序，就無法可以解放被壓迫階級的痛苦。所以布朗葵派可以稱為社會主義者。然而他們仍時常重視政治的利益，輕視經濟的利益。他們未曾腳踏實地對於經濟生活經濟知識，做過一番有系統的研究功夫，他們時常拿流行的口頭禪，遮蓋自己的無識。他們並且譏笑死守陳義的辦法，他們倡言不顧胸有成見，作無謂之學理爭論，自陷於混沌。他們以為無產階級一旦政權在手，自然會知道怎樣做去，如何進行；所以無產階級的主要事業，就在奪取政權。至於奪取政權的方法

，則爲有計劃的武裝暴動。

他們準備的武裝暴動，不幸着着失敗；而沒有準備的事業，偏偏得着成功。

布朗葵主義注重學理的探討，而偏重實際的行動；所以對於一班實行家富有吸引的份量。然而同情布朗葵標義區智識階級與學生的人數，仍是較多於工人。至於構成布朗葵黨份子的成分若何，在那個時代，可以從下面一件事實當中，看得出來。一八六六年十一月七自布朗葵派在巴黎咖啡館有一次召集秘密會議，不幸爲當地警察所覺察。於是出席人員被捕者共四十一人，就被捕的人底職業來區分：當中有十四位手工業工人，四位店夥，十三位學生，六位著作家，一位律師，一位手工匠，一位靠利息維生的人，一個獨立的商人。若是當時不是在學校放假，正當多數學生離開巴黎的時候，學生的人數，必定更多。

這種會議的召集，不但表示布朗葵派召集會議的方式，而且顯露他們的目的。

一八六六年九月國際壯會黨召集在 Genl 地方開會，並邀請布朗葵派出席。而布朗葵則禁止黨員參加，但是仍有兩名布朗葵派的代表不服從其領袖的主張，居然親赴 Genl 出席：一位是布勞托律師，(Advocat Protot) 一位是公司辦事員胡慕保特(Humbert)。這兩位底自由行動，激起了全黨的憤怒；因爲照布朗葵派的習慣，所謂狄克推多，不祇是無產階級的狄

克推多；而且是黨之領袖的狄克推多。在事實上，這兩種狄克推多，也是有密切不可分離的關係。自從布朗麥黨成立以後，黨員敢於違反領袖的命令，這要算是頭一次了。今日以前，一般黨員都盲目地服從領袖的命令；就在那次以後，仍然是如此的。十一月七號那一天，布朗麥派召集會議，討論懲罰布勞托背叛黨紀的辦法。當會議還沒有得到具體結果，旋即被警察解散了。雖有幾個人得乘機逃走，而布勞托自己在也內；但是另外幾個人，皆已被捕。（參看 Ch. fa Costa, Les Blancunists, Paris 1912, S. 17-20）

我們不久在公社中又發現布朗麥派布勞托律師與兩位在十一月七號被捕的布朗麥派：一個即是律師德理場 (Tridon) 一個是大學生李高德。(Raoul Rigault) 而布朗麥自己，是一個醫生兼新聞記者；另外還有一個藥師阿衣沒氏，(Eudes) 與一個會計官費理。(Fevre) 在整個的布朗麥黨團之中，祇有一個是工人階級出身的人；這就是銅匠夏爾湯。(Charidon)

國際派當選為公社社員者，其中有二位與布朗麥派有相當的聯絡：一個是翻砂工人杜華氏(Duval)一位是大學學生法朗特氏。(Vaillant) 綜觀上言諸點，即可知智識階級，在當時佔何等重要的地位。

在公社中，種各資派與布朗蔡派，犯了同樣的錯誤；對於經濟問題，缺少具體的解決方案。他們認為迫切的問題，祇限于反抗宗教，凡爾塞戰爭，與巴黎警察幾個政治上的問題。所以他們以最大的決心，嚴厲的手段，進行向凡爾塞進攻的軍事奮鬥與鎮壓凡爾塞同盟此的活動。

d 公社中的國際派

構成公社的第三部分，就是十七個國際同盟的會員。而這十七位同盟會員差不多都是蒲魯東的信徒。(Dulnenich, *La Commune*, 5, 308) 蒲魯東的思想和行動，是與雅各資派與布朗蔡派處於極端衝突的地位。一七九三年的恐怖政治，在蒲魯東派的心目中，不但沒有可以效法的價值，而且是可怕的覆轍。他們觀檢恐怖統治弱點，與其失敗的不可倖免，至為清晰。他們認定無產階級的生活改善，與剝削的解除，不能專靠奪取政變，變更政治的制度；祇有經濟制度的革命，才能完成此項目的。所以他們對於布朗蔡派武裝暴動的策略，恐怖為手段，反對德謨克拉西的態度，深抱懷疑。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巴黎的無產階級曾經一度獲得政權，然而無產階級到頭得着了什麼好處哪！

蒲魯東主義，對於無產階級的政治爭鬪，與參加政治活動，深抱懷疑，既如前述。但是

同一思想，今日又復呈現於吾人之前；且以社會主義思想的最新成果與經驗的結晶自許；認為是馬克司所不了解與不能了解的經驗，在事實上，這種思想，不過是半世紀以前的思想的一種新趨勢而已。馬克司已對於這種思想曾加以抨擊，幸而不久便歸於沈寂了。

現在這種思想，會然稍為有點修正；但是沒有根本變更原來的性質。蒲魯東以為政治革命，不能解放無產階級，祇有經濟革命，才可改善無產階級的生活。這種見解恰與今日之政論家之見解相同，似乎無產階級解放的事業，在資本主義之下，德謨克拉西是無用的東西。經濟的解放，必須在政治解放以前。依邏輯來推斷：就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存在一天，無產階級的政治活動，不論採取任何方式，都是徒勞而無功的事體。

布朗葵派單純地着眼於政治爭鬪，反對現存的政府，已經犯了偏頗的毛病。不幸蒲魯東派也同樣單純地以經濟手段，否認國家勢力的援助，力謀無產階級的解放。因此布朗葵派痛罵蒲魯東派欺騙工人，延長第二帝國的壽命。馬克司階亦以同樣的口吻攻擊過蒲魯東：

「蒲魯東竟不惜犧牲工人階級的利益，獻媚於拿破崙之前。」（In seinem Nachruf vom
Janua 1866, *Abgedruckt in der denckenchen Ansg. des Elenel d, Phil, 2 Aufe. 6, XXXVII*）

因為蒲魯東派的注重點，首在經濟問題。所以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互相衝突的階級意識

與夫無產階級解放，全賴本身力量的認識；在蒲魯東派當中較之布朗麥派特別發達，格外徹底。所以法蘭西第二帝國時代，祇有蒲魯東派，才是真正工人的政黨；布朗麥派，不過是一個發達的學生政黨而已。

當十七世紀下半年，法國的勞動運動從死的沈悶裏覺醒以後，旋爲一八四八年的反動勢力所打擊又歸消沈了。當工人國際成立的時候，法國方面，蒲魯東派全體參加；至於布朗麥派禁止他的黨員參加這個工人國際團體，自然有他的相當理由。

在這個工人國際團體以內，蒲魯東派的工人，獲得了一種新的經驗。認識了一個新的理論。加之工人國際成立的時代，他們的領袖蒲魯東又不幸於一八六五正月十九日去世。於是蒲魯東派的工人，漸漸放棄了原來的信仰，使法國工人階級爭鬪的條件，又轉入一個新的時代了。

蒲魯東祇願看見一個純粹經濟的勞動運動；不主張勞動運動帶有政治的色彩。若是我們也堅持此種見解，勞動階級祇有放棄與國家政權衝突的一切鬪爭，採用和平手段，以創立合作社，交換良行與各種互助社，爲解放工人的惟一方法。

這種理想，在當時的巴黎，本有實現的可能；因爲巴黎當時所有的產業，尙少大規模的

產業形式，資本案與商家剝削工人手段，純恃重利盤剝，與近代企業家的剝削工人的手段，完全不同。

在國際大會中，法國的蒲魯東派認識了英國實業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並且知道適應這種實業資本主義的勞動運動的經濟鬭爭，完全以工會與罷工為鬭爭的武器。但是蒲魯東對於工會與罷工兩種經濟鬭爭的武器，竟根本加以反對。

根據這種經驗，於是產生了一種新的理論，以支配近代社會生活的因果法則，為理論的立場。這個理論雖僅為少數工人國際同盟會員所了解，或為人所誤解；但是這個理論的創造者，始終能夠利其超越的能力，使工人國際同盟的活動受他底精神的支配，與思想的領導。

馬克司的理論，不但排除了蒲魯東主義的狹隘性，又消滅了布朗葵主義的偏頗性。他一方面與蒲魯東主義同調，認為經濟關係，是一切社會關係的基礎，經濟關係一日不變更，任何政治的改革，不能解放無產階級的痛苦。一方又與布朗葵主義同情，認為要想衝斷資本家的統治，實施以解放無產階級為目標的經濟改革；祇有無產階級本身獲得政權，方為可能。馬克司與蒲魯東對於經濟動力的基本意義，各有不同的解釋；馬克司以為經濟鬭爭不但不與政治鬭爭，背道而馳；且以政治鬭爭的內容結果，與其反應，反隨經濟鬭爭之變化而各有不

同。至於經濟關係本身，馬氏則爲是一種不斷地變動的生產過程，可以使昨天認爲不可能的政治改革，今日變爲可能，一到明天也許變爲必要的改革。對於政治與經濟的關係，馬氏會有一個獨到的見解；以爲吾人應當虛心研究經濟關係與其趨勢，使政治上的目的與手段，適應這個關係和趨勢，方算恰當。而布朗葵派與蒲魯東派則完全漠視此種歷史的見解：他們——祇知道發明一種手段，以爲可以在任何環境與任何經濟的歷史的條件之下，獲得他們所想像的結果，並不思對於經濟的條件，加以周詳的考慮；來判斷在一定情形之下，什麼是屬於可能的範圍，什麼是必要的進行。他們以爲社會主義者祇要發明。適當的手段，就可如其所願，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好在這種見解，對於一個真正馬克司主義者，早成強弩之末。但在今日這種理想又有捲土重來之勢，即是自命爲馬克司信徒的莫斯科當局，也不知道那種政策，在當時當地的經濟條件之下，是屬可能而且必要。他們完全由一個錯誤的見解出發，以爲社會主義的建設，是無產階級日夜所期望着迅速實現的事業。社會主義者的任務：須在取得政權以後，不顧客觀的條件如何，立即實施社會主義的政策。似乎社會主義的中心問題，不是考察什麼事是可能與不可能的限度；而在發現一種萬靈聖藥，在任何環境之下，可以樹立社會主義的社會。當法蘭西第二帝國的時代，布朗葵派就以暴動爲樹立社會主義的萬靈聖藥

；蒲魯東派則以兌換銀行爲廢除私有財產制度的手段。時至今日，又有人相信建立蘇維埃式的無產階級獨裁制，是解放無產階級的萬靈聖丹了。

馬克可主義祇有極少數人才可以完全了解；因爲此處需要一種偉大的思想工作，犧牲個人底主觀與願望，服從真理的大決心。但就一而言，馬克司與恩格斯所指示吾人的手段，途徑，目的，一定可以貫徹；因爲事實的邏輯與馬克司主義的理論，完全一致。

所以既在法國國際派中，馬克司主義對於蒲魯東主義，也有漸取而代代之勢了。

法國的勞動運動一旦復活之後，於是工會的組織與罷工的活動的現象，卽如雨後春筍，到處發生，無可避免。帝國政府本想轉移勞動運動的目標，使之移就法律的範圍；且於一八六四年允許工人有組織工會宣布罷工之自由。工人國際同盟亦於此時宣告成立，她的會員蒲魯東派，不祇爲時勢所迫須積極參加復活的勞動運動，且以環境的關係，他們成功了勞動組織與活動的中心與領導人物。因此蒲魯東派與政府間的衝突，就成爲不可避免的事實；他們不能不採用政治爭鬪的策略，反抗當時的政府了。

在這種情勢之下，以蒲魯東主義爲出發點的法國國際派，自然會漸漸地侵潤馬克司主義的色彩。但在公社暴動發動的時候，還沒有人可以配稱爲馬克司主義者。他們對於蒲魯東主

義的信仰，雖已搖動，然而對於新的信仰，仍無確定的立場。因此他們底思想，呈露十分混沌的現象。然而在公社的社員當中，他們猶不失為對於經濟生活有深刻之研究，與經濟需要
有確切之見解的人物。

所以他們是公社中真正的工人代表。里沙克那 Lisagay 論及此點曾經說道：

「有人把公社當作一個工人政府，真是一個大大的錯誤。工人階級祇在爭鬪中……擴大
了這個運動的勢力；但是他們很少擔任政府的職務。……三月廿六日的選舉，七十位革命家
中同有二十五個工人當選。」

(Geschicht der Kommune 2 auf, S. 145) 這廿五個人當中，多數——十三個——是屬於國際派
的。在公社中，國際派共佔十七個席次，祇有四人不是工人出身。而且此四人中，還有一個
學生 Vaillant 是傾向布朗麥派的。這十三個由工人階級出身的公社社員，例如裝訂工人凡
爾林，Varin 彫刻工人太士，Theiss 染色工人麥朗，Malon 珠寶匠佛蘭克，Frankel 差
不多都是公社中最偉大的思想家。

這班人根據蒲魯東主義的立場，將戰事，警察……的責任，完全推在雅各賓派與布朗麥
派身上。他們專心和平的事業，努力做改良地方自治，改善經濟組織的工作。蒲魯東派人物

當中祇有一個翻沙匠杜發爾 Duvall 與樊蘭特 Viallan 一樣傾向布朗麥派主義，並且富於好戰的本能。四月初三那一次激戰，杜發爾被任為司令官之一，旋不幸兵敗被擒，且以 Vivoy 將軍的命令而被鎗斃，為公社殉難之第一人。但是他的同志反以經濟事業，為活動的領域，且獲有很好的成績。例如太士 Theiss 管理郵政，凡爾林 Varlin 主持軍需處，當時因為高級官吏，逃散一空，缺乏幹練的工人，擔負指導的任務，他們仍能排除萬難，辦理完善。此外國際巴黎支部的社員，也同樣劣力於經濟的建設，得有相等的成績。四月間銅器工人卡梅理那特 Carmentat 被命主管造幣事業，也不到幾個禮拜，就發生了狠好的影響。這個事業即在公社失敗以後猶被保留。不久又有兩個工人：一個叫做巴士特哩 Bastiea 辦理特種稅收，一個叫做康保兒特 Cambinat 總辦間接稅的徵收，都得到許多人的讚賞。公社不以行政的事務付托一個總長，而委之於一個委員會，可以說是一種創舉。代表公社底社會主義色彩的勞働交易委員會，由國際派麥朗 (Mallon)，佛蘭克 (Frankel)，太士 (Theiss)，杜康特 (Dukant) (製籃匠) 阿樂依 (Avrial) (校師) Gevarin 與一個雅各賓派杜格 (Dugel) 組織而成。至於杜格 (Dugel) 的職業，則無從考查。

財政委員會由五個委員組織而成，當中有三個是屬於國際派的：即顏料商克萊曼 (Vic-

for Clement.) 凡爾林 (Varlin) 與一個國際派中接近資產階級的慈善家巴士萊 Boslay, 此外有一位雅各賓派俞基 Regave 與一位掌櫃先生約爾得 Courde, 約爾得沒有特殊的黨派色彩, 乃財政委員會的真正主幹。因而成千成萬的巨款都由他一人經手。然而他的夫人還是治家勤儉, 躬自洗衣操作。他自己任職期內, 也從未吃過一頓比一佛朗六十生丁更貴的飯。

勞働, 財政兩個委員會的工作方式, 與軍事警察兩個委員會完全不同。此處最將拿麥得 Menselsohn 的話來做證明: (Nachtrag zu Lissagayns geschicht der Kommune 2Auf.) 「公社的軍事機關, 萎靡無力, 缺乏振作的精神。我們在此可以發現責任心的缺乏, 辦事遲緩種種病弊, 社會運動的無組織狀態, 一一反映於吾人眼簾之前。我們祇要從 Vendôme 地方走到警察公署, 就可獲得這種事實的反映現象。」

「我們休息一下, 離開煩擾的警察公署與裝模作樣的 Neu, Hehlisteri 走到勞働與交換部。專就這個名稱來講, 已經表示這個機關深受蒲魯東主義的影響。坐在這裏面的人物, 都是忠實而樸素的國際主義者。他們拋棄虛渺玄想, 努力實際工作。他們自視為工人羣衆的代表。不以頭銜徽章一類的東西, 為其權威的象徵。他們召集職工團體與工人聯合會的代表, 組織一個設計委員會, 所以我們可以說這個勞働部工作, 全視環境之需要而決定, 不陷於空

想。」

於是這個勞働部成了社會主義者集中之所，並且狠接近馬克司。她在公社的任務，原是革命的工作；然而處事慎重小心，真可令人驚佩。

財政部也很慎重小心。他們如此小心翼翼之理由，我們在約爾得 Jourde 論及典當舖的辯論中，可以得一個說明。原來有人提議：將所有典當舖的什物，衣服，家具，工器，凡價值在廿法朗以下者，一律退還原主。至典當舖因此而受的損失，概由國家擔負賠償的責任。亞理亞爾氏 Aviaë 且更進一步要求封閉一切當舖，代以組織較好的公立機關。約爾得 Jourde 對於此事答辯如下：

「創設公立機關！空口說白話，自然很容易。但在未創設之先，我們要有準備的時間，做一番研究的工夫。假使我們對亞理亞爾 Aviaë 說：『請你製造一輛砲車或一尊大砲，他必定會要求相當時間。準備的時間，這也是我們現在所要求的。』(Sitzung Vom6 Mai, Journvna official Vom 7 Mai 5,493)

公社沒有充分的時間，建設偉大的社會事業。公社中大膽的思想家，對於一切事業，在未徹底研究之前，也不敢有所全爲。而公社所頒佈的許多社會條例，譬如禁止麵包工人的夜

工，取消工場罰金制度，在今日視之亦微細不足重了。即是大膽的決議事項，也不外交付審查。大革命紛擾期內，巴黎有許多工廠，因廠主悉行逃亡無形封閉了。依亞理亞爾氏 *Hidal* 的提案，應立將這種不利於工人的情形，交付審查。公社對於此事決議如下：

「許多業主，把自己所有的工廠宣佈停工，藉以逃免公民的義務；置工人的利益於不顧。……

因為業主怯懦，悉行逃亡，使公社最重要的工作，幾陷於停頓，工人的利益，遭受重大的危險。公社考慮這種情形之後，用特決議如下：

工人階級底職業組合，應立即召集開會，成立一個研究委員會；完成下列各項任務：

- 1、制訂停工的工廠的統計表；詳細載明財產的狀況，與工作器具的數目。
- 2、編製報告書，報告應採何種實際的步驟；俾不必再經業主之手而假手於工人的合作社，使這些停工的工廠，可以立即開工。

3、起草合作社的章程。

4、組織評價所，確定這些工廠在逃亡的業主回家以後正式讓渡與合作社的手續；並確定合作社應當賠償業主的數目。

這個研究委員會編製報告書之後，應呈交公社的勞働交換部。勞働部應於最短時間內，起草一個適合公社與工人利益的去規，提付公社討論。」

這個議決案的公佈日期為四月十六日。研究委員會即於五月十日到十八日集會。不久公社就瓦解了；所以那個社會化的委員會，尙無實際的建議。然而她的成立，仍有重大的意義。使我們認識這一點：若是無產階級的統治能夠維持較久的時期，公社中的社會主義者，可以採取那種途徑，實現他們的理想。

整個地消滅私人企業，沒收一切產業完全歸社會公有，自然是此時談不到的事體。並且與此相反；以業主離開工廠，停止工人的工作；是一種卑怯的行爲。

恰恰與此相反的咀罵，自然亦可同時發生。那個在暴動期內所組織的中央委員會 *Zentralkomitee des zwanzig Arrondissement* (注意：非國民自衛軍的中央委員會) 則又痛罵業主不應把工人留住工廠，使工人不能充分履行國民自衛軍的義務。

照公社的計劃，祇認爲業主所放棄的工廠，應首先歸社會公有。然而還須經過充分的準備工作。

產業社會化的另一步驟，公社計劃從軍需方面着手。軍裝與武器的供給，應在可能範圍

內，雙方訂定合同，由軍需處會同工會與勞動部起草。公社並收到一件由修補軍器廠的工人擬定的工廠規約草案，規定每日工作時間為十小時。

這個包括廿二條的章程；於五月廿一號在公社公報上面，公佈一次。表示公社的社會主義派工人對於產業社會化的良好趨勢。在這個章程公佈以後；工人開始選舉工廠代表工廠管理員與技師。另由每一個工作棹子 (Banc) 推舉一個工人合工廠管理工廠代表技師組織工廠評議會。公社方面亦組織一個監察評議會，盡視各工廠的營業狀況情形，與考核會計的真偽。

照第十五條的規定：工人的時間並非一八六六年 *Charte* 國際會議議決的八小時制而為十小時制。但是工人擁護公社的利益，還是十分熱心；而且在緊急情形之下，得工廠評議會的同意，即可增加工作時間至十小時以上，無須另外增加工資。因此工人的收入非常微細，總經理的月薪，亦不過二五〇法朗，經理月薪，二一〇法朗，工頭的工資以鐘點計算，每小時七〇生丁，(一個法朗=一〇〇生丁) 普通工人的工資，祇有最高標準沒有最低標準的規定，規定每小時不得超過六十生丁。

最特別的，莫如第十六條的規定，限制工人晚間外出。一旦軍事危急，有趕造武器的必

要的時候，任何工人皆有輪流守夜的義務。落尾還說：

「在目前環境之下，公社迫於必要，不得不極力節省：使一分一文亦不能輕於浪費。所以輪流守夜，公社不給以任何報酬。」(Journ. Nat. officiee 5,639)

從此看來，工人並不想利用無產階級獨裁的時代，增加個人工資；他們為全體的人類謀幸福的觀念，勝於為個人謀利益的觀念。

E 公社中的社會主義

馬克司雖有火山一般的熱情，然而對於這樣謹慎的策略，並無不滿的表示。他在「法國的內亂」一書內說道：

「偉大的社會改革，是公社生存的要素。公社的特殊條例，不過表示一個由國民所組織的國民政府進行的趨勢而已。」

馬克司描寫無產階級的獨裁政體，認為是國民公意所構成的國民政府。換句話說，是一個德謨克拉西的政府。並且稱讚公社的財政處理，穩健而周詳。

在此不久以先，馬克司曾在同書內，說明由資本主義引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的原則

「工人階級要求於公社的，不是奇妙的事蹟。他們沒有固定的成熟的烏託邦，與由人民的決議可以馬下實現的理想。他們知道工人階級本身的解放，與生活的改善，需要一個長期間的奮鬥，與許多次歷史過程的經過。祇有如此，人類與其環境方可完全變更。工人階級沒有要實現的理想；他們的使命。惟有將那快要崩潰的資產階級社會胚胎中發展出來而為構成新社會的原素，促其自由發展。」

有人誤解馬克司工人階級沒有要實現的理想這句話，以為他不願社會運動有一定的目的和綱領。但是這種誤解，祇要舉出一兩件事實，即可反駁無餘。馬克司從一八四七年起草的共產黨宣言起到馬氏會同 Jysde, Lafargue 二人起草的法國工黨綱領止，自己曾經起草過數次社會黨的綱領；而且馬克司在此處引用的文字已經明白表示社會運動的目的。工人階級的解放，與生活程度的提高，祇有靠階級鬥爭不斷的勝利，與近代工業為基礎的工人統治才能實現。

或者有人又要反問馬克司，社會運動目的，即是工人階級的理想，我們怎能說工人階級沒有要實現的理想咧？

然而馬克司，所謂不能實現的理想，明明白白是指形而上的理想，超時代超空間的理想

，如普通所謂的永久正義永久公道一類的理想。至於工人運動的目的，本隨經濟發展之條件不同，而時有變更。實現這個目的的特殊形式，當然也隨着變遷，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所以社會主義不是一種固定的烏託邦；而是一種歷史進行的過程。推動這個歷史行程進展的前提，自然是社會經濟關係長期的發展，與工人階級不斷的鬥爭。但是工人階級政治鬥爭的勝利，還不能說歷史進程，已達到最後的階段；祇能說構成社會的原素，獲得發展的自由，可以推動歷史不斷的向前進罷了。

廿年以前，馬克司即已把工人階級的長期訓練，與社會關係的認識，作為社會革命的先決條件。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失敗以後，馬克司因為研究經濟關係的結果，認為革命暫時無成功的希望。因此引起許多同志的反對，以馬氏這種論調，為背叛革命的利益。他們以為羣衆對於革命的需要存在一天，革命即斷無中止之理。一八五〇馬克司駁覆反對方面說：

「少數派（指共產主義同盟中少數派）欲以教條觀念代替批評觀念，以唯理主義代替唯物主義，以人的意志代替社會的實際關係，作為革命的推動機，真是笑話。當我們對工人說：你們已經遭受一五，二〇，五年的內亂與戰爭，不祇是要改變社會制度；並且要改變你們自

己的氣質，養成政治上的能力。少數派的意見又與此相反：以爲工人應當馬下奪取政權；否則，甯可高拱無爲。當我們特別向德國工人指示德國無產階級的幼稚狀態，少數派又無禮的譏笑我們囿於德國手工工人的民族感覺與階級成見。少數派把無產階級幾個字當作口頭禪，亦如民治派把國民兩個字當作神聖看待一樣。

少數派也和民主派一樣，使革命的發展，陷入空洞的革命詞令裏。」(Marx, Enshehullung über den Kommunistenkongress zu Köln, neuaufg druckt, 1865o. 5, 21)

馬克司雖然不相信僅憑人類的意志，可以推動革命的進行；卻非否認人類的意志，與革命的進行底關係。人類沒有願望，就沒有有意識的行爲。假使根本否認人類意志，不祇革命無從發生，即人類一切歷史亦將歸於烏有。一切社會運動的先決條件，全賴社會上一部分人有堅強的意志，與迫切的需要。

但是僅僅依賴人類的意志，是無濟於事的。一個成功的運動，除了意志與需要以外；還須有別的條件存在。譬如人類都願長生不死；但是這個意志，終是無法防止人類的自然死亡。所以一個成功的運動意志 (Willen)，必須與客觀的條件互相適合，需要 (Bedürfnis) 必須擁有此項需要的手段。懷抱這種意志的人，必須有相當的力量，排除當前的阻礙，貫徹自己

的願望。一個富於判斷能力人的任務：就在探討社會的實際關係，分別事情的可能與不可能；並洞曉雙方的力量關係，將人類的能力，引到可能範圍以內的活動途徑。於是人類不致再浪費有用的精力，而現存能力的利用，亦將達到最高效率了。但是對於社會一切事物，求一個明白的判斷，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體，因為社會經濟基礎，時時刻刻在發展與變動之中，所以社會的需要，與滿足此需要的手段，以及適合實施此項目的的力量，亦因之而時常變動。何況社會的關係日趨複雜範圍日漸擴大咧？幸而人類智慧日增，認識的方法也日漸進步；但是人類的精神，仍不能時常認識社會的實際關係。一旦實際的環境，不能使人類需要滿足的時候，人類的精神就容易發生下面一種傾勢：祇就這些關係裏面，尋求與其欲望相適應的光明方面。人類皆願長生不死，然而實際關係的體認會告訴我們：人類必有死亡的一天。但是人類有聰敏的想像力，知道發明吾人死後靈魂永存的觀念，安慰自己的精神。羅馬的無產階級，雖生活於極齷齪的貧困之下；但是對於愉快閒逸的生活，仍有極強烈的需要。然而實際的環境，卻不允許他們可以如此生活。畢竟他們的精神方面，允許一種如如此的生活，以天國可以實現，並假定他們可以昇入天國。奉神的觀念，本是一種手段，能使弱者相信自己是個強者，不可能的事變為可能。萬能的神，應當使弱小的猶太民族，變為全世界的統治者

；更應當使宗教改革時代的農民，與激怒的無武裝的無產階級，戰勝武裝齊備的貴族軍隊。

十九世紀的無產階級，已不復信仰這樣萬能之神了；故轉而崇拜法國大革命時代的悲壯事蹟。而巴黎無產階級在那個時代反抗全歐的勇氣，引起後人對於他們發生一種驚奇的崇拜心：相信革命富有不可思議的能力。革命的無產階級，是聖神不可侵犯的，祇要他們願意什麼，即可獲得什麼；假使得不着什麼，也祇為他們不願意有什麼的原故。

與這種唯理觀念遙遙相對的有馬克司底唯物觀念；他要求我們時常注意到社會上實際的關係；而且這種關係已使無產階級的解放，與生活的改善，形成近代社會不能抵抗的潮流，與近代社會運動不可違反的目標。但是這種目標不是固定的馬下可以實現的烏托邦，也非任何時代適用的理想；僅可促進一種社會運動與社會進展的新趨勢而已。工人階級不是在任何環境之下已經達到成熟的狀態，可以奪取政權。工人階級必須經過一個相當時期的發展，養成運用政治的能力。但是工人階級不能全憑自己的意志，選擇一個走上政治舞臺的時辰，若一旦出乎本身意料之外，獲得政權；切不可把現存的生產程序，遽然全部推翻，應當斟酌情形，使之依無產階級的意識，向前發展。所以「使構成新社會的原素自由發展」這句話；在各

樣不同的社會關係之下，自有互相不同的意義。工人階級對於實際環境認識愈清，而發見某一個時代適當的手段，自然也更容易。

拿破崙推翻以後，有人以為巴黎無產階級的革命，有立即爆發的可能，馬克司則深抱疑慮，不敢貿然贊同這種主張。然而巴黎無產階級，確是當代最有知識的工人；不愧為全世界中心都會的工人，文藝復興與革命之祖國的產兒。但是帝國時代，巴黎工人很少受教育的機會；即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種種權利，也曾經過長期的剝奪。所以馬克司當時主張利用共和政體的集會結社自由權與言論自由權為工人羣衆取得組織與訓練的機會；並認定以全力擁護共和政體，為當時最好的策略。法國全國一大部分當時猶在農業社會的狀態中，即巴黎自身也是充滿了小資產階級的色彩；即足為反對工人階級立即奪取政權的理由。

世界歷史的變化，不能僅憑人類的意志；革命的爆發，更非僅憑意志可以拖延，可以推遲。巴黎工人的起事與三月十八日的勝利，已為不可避免的事實。當時最要緊的工作：首須明白認識實際的環境，可以允許勝利的無產階級實施其計劃到若何態度；以便集中全副精力，按步就班，藉求貫徹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所以馬克司認為巴黎公社的重要任務，並不在立即取消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他於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寫信給辜格滿 Duglmann 討論

這個問題說道：

「若是你翻閱我的 *Achtzehnt Brunniv* 這本書末章；你即可了解我的主張。我以為法國革命的初步計劃，不應當和以前一樣，將這個官僚政治軍國主義的工具——政府——由左手移交右手，應當趕快把牠擊個粉碎。這是實現歐洲大陸諸國真正民衆革命的先決條件；也是我們勇敢的巴黎同志應當馬下就做的事體。」(Abdunek *Neue Zeit* XXI, 5, 709) 在這封信內，馬克司從未提起社會主義幾個字。他以為公社的任務，首須毀破這個官僚政治軍國主義的權力機關。

無產階級要想奪取政權；自然要於變更政治組織之外，企圖變更生產的組織，改善本身的生活。若以政治勢力的運用為達到此項目的的方法，即可稱為社會主義；那末在公社之下也有社會主義了；但與吾人今日所了解的社會主義，不啻有天淵之別了。這種現象，不用說，一部分要歸咎於時代的錯誤。這次起事，前後不過幾個星期，而且範圍狹小，又祇限於小企業極多的巴黎。就當時經濟的基礎而言，公社所能為力的，也祇限於零碎的改革；將單一工場改為工人的生產合作社。若想將整個的實業部門組合在統一的生產秩序之下，則為環境所不許。就全國而論，公社或者可以將全國鐵路與煤鑛鋼廠收歸國有。然而這些步驟，仍究

不能從根本上消滅資本主義。而且鄰邦德意志已經實行過這種計劃的一部分或者正是準備要實行的計劃。但是這些改革步驟，若在一個無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的政體之下，工人階級的社會狀況，也許可以因此獲得很大的進步。

社會主義的實現，遇到極大阻難原因，除了時間短促與經濟落後兩個理由以外；即為公社的人物，對於社會主義的理論，缺乏明確的認識。而雅各賓派與布朗葵派對於經濟問題，簡直不願過問。國際派雖然注意經濟問題，可惜恰恰在公社時代，對於理論方面也無充分的把握。他們雖漸有放棄蒲魯東主義的趨勢，然而對於馬克司主義究竟沒有明確的認識。

然而馬克司仍不以公社為怯懦，反而同情公社的策略。他以為公社對於經濟事件在未着手改革以前，必須詳加研究，是很合理的辦法。並認定躁急的處置，必使革命歸於失敗，增加許多無謂的紛擾。公社這樣的膽怯，並非根據理論判斷的結果，而為對於理論缺乏確定把握的現象；但與馬克司唯物史觀的結論，隱相符合。以為專靠人類意志，不能推動革命的事業，必須對於實際關係，有深切的認識，方有成功的希望。

杜博義氏 Dulewicz 在其所著“Commune” (5, 419) 一書內，描寫此點，可稱最為恰當

。他說：

「有計劃有步驟的充公政策，根據下面一個極重要的理由，（其他階級的反抗姑不具論，）已經不可能了。工銀勞働者習於相傳的社會秩序，簡直不知社會的運行，可以立於另一個基點之上。而且合作社與工會的組織，當時尙未發達，若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一旦破壞以後，即無法保障生產與交易的照常進行。一個社會主義的政府，不能專靠臨時頒佈的法令，藉濟其窮。法令這件東西，應當保障現在的社會關係。若公社不顧客觀環境，採用超時代的策略；也許會引起內部的糾紛，招致自己隊伍中一部分有力的份子之反對。而勞働家方面，亦不致發生若何的進步，與較大的犧牲。所以公社不可再越雷池一步，祇能在德謨克拉西庇護之下，漸求社會改革的實現。在事實上公社也確是如此做法。」

公社的策略與馬克司的社會政策極為接近即在今日吾人亦須以馬氏之策略爲法。

這自然不是說；今日的德國應和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一樣，採用同一的謹慎策略。半世紀以來，資本主義已有驚人的進步。而當時法國的革命祇有巴黎一處發動，且非純粹無產階級的運動；缺乏農村的後援，終失敗於官僚金融財政與農民——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五十三——聯合陣綫之下。但是一九一八年的德國革命運動，全國各處同時爆發，且全係無產階級領導的運動，德國農民亦不過佔全國人口數四分之一，（一九〇七年100）實業已經發展到托辣斯

(Trusts) 加得爾 Kartell 的組織形式，與法國革命時代的情形迥不相同。一八七一年巴黎無產階級，方才脫離拿破崙的羈絆，在此以前，他們絕少宣傳與組織的機會。但是德國的無產階級，在革命以前，已有半世紀的政治與職業訓練；他們的政治團體與經濟組織，都有幾百萬的會員。再者一八七一年的巴黎社會主義者，有意放棄一個原有的經濟的理論，建設一個較高的新理論；同時又感能力不足，以致理論方面搖惑不定。而德國社會主義者，在今日擁有豐富的歷史經濟知識，與簡明的方法，幾為全世界社會主義者所公認。且以思想的卓越，不但戰勝了反馬克司主義的經濟思想；且於無形中使資本社會的經濟思想得着意外的成熟。

在這種條件之下，德國社會主義的實現，頂可比一八七一的巴黎公社採取較迅速而大膽的手段。施行此種手段的前提；自然是需要實現這種策略的政權。

F 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

我們雖屢次提及公社的經濟策略；但就字面的真正意義來下解釋，公社並無確定的經濟策略；當然更談不到一個有計劃有步驟的策略。公社內部意見的衝突，已為這個問題的致命傷。所以公社的行動方針，大抵是內部互相衝突的結果；並非遵循一個固定的理論。就是構

成公社中少數派的社會主義者，對於理論方面，也無明確的認識。話雖如此說法，巴黎的經濟狀況，還是受少數派思想力的支配。因為公社中的多數派，對於經濟的問題，漠不關心。多數派在這個理論的領域以內，比較少數派更無把握。

公社的政治問題與經濟問題，完全不同。政治方面意見的衝突，較之經濟方面的衝突，猶其激烈，幾使公社時召瓦解之禍；並且滅殺公社的工作能力。不但就一般趨勢而言：公社的政治行動，也因為環境的壓迫，漸與經濟行動一致，日趨溫和了。

吾人早已知道公社中多數派係由雅各賓派與布朗麥派所構成。多數派所以同情於巴黎公社的意思，蓋以公社係模放一七九三年公社的榜樣，可以統治法國全境，強迫全國服從牠的意志。他們是一班急進共和黨人與自由思想者；嘗傾其全力破壞帝制的權威機關，官僚政治與其常備軍隊。因為他們想極力維持巴黎的統治地位，所以主張中央集權制的國家，在巴黎設立中央政府，以強大武力為後盾。可惜他們忘記了一七九三年巴黎公社的中央集權制度，曾為拿破崙帝國創關了一條先路這件歷史上的教訓呵！他們以為一個擁獨裁權力的保安委員會，(Volksausschuss)即為一劑萬靈的聖藥；全未想到狄克推多的政制，若非由有紀律的軍隊與幹練的行政組織所支持，僅僅是一個外強中乾的狄克推多。蒲魯東派是與主張中央集

權制的雅各賓派，處於極端衝突的地位。他們對於一七九三年的遺傳，毫不客氣，加以極嚴厲的批評；有時且抱厭惡的態度。他們以爲那種煽動無產階級發狂，產生流血的暴行的恐怖政治，祇是一種無益的空想，毫無補於無產階級的解放。即一般所謂民主政治，蒲魯東派亦認爲是一種政治上幻想而已。一八四八年普通選舉的結果，不過產生一個反動的國會，反而維護了帝國的生存。就實際情形而言，在當時法國經濟組織之下，不論施行任何一種政策，獨裁政治也好，民主政治也好，決無希望可以成爲解放無產階級的手段。但是那時社會主義者，仍是追求這種手段；他們還不了解社會進化這個觀念，與民主政治可以養成無產階級的政治判斷力與組織的能力這個重大的意義。無產階級的迅速解放，在當時環境之下，獨裁政治與民主政治，二者均不適宜；蒲魯東派知之最熟。但是蒲魯東派由此所引伸的結論，却不甚好。他們完全否認政治，畢竟是錯誤的思想。近代實業發達的國家之社會政策，賜與無產階級的希望，較之農業國家的國家政策，究竟不同。地方德謨克拉西與國家德謨克拉西對於無產階級，至少要處於同樣重要的地位。就是反對議會制度最刻薄的批評家，對於地方德謨克拉西，也不能有所非難。地方自治乃爲蒲魯東派的中心理想。這種思想的背景，即爲當時小資產階級的實業狀態。蒲魯東派亦未主張取消商品交易；然而此時已有許多生產部門的經

濟意味，超越了地方的色彩。爲調劑各地方的生產關係起見；他們主張各地方應當自行聯合。蒲魯東派以爲如此做法，即可在農業的法國，立刻解放實業的無產階級。可惜他們祇忘記了下面這一點事，現存的政治權力的崩潰，乃實現國家制度完成社會自治的前提，偏偏遺這一點，恰恰是蒲魯東派要迴避的一點。

所以公社的理想，在蒲魯東派心目中與在雅各賓派心目中，恰恰是相反的。雅各賓派認定巴黎公社爲奪取法國政權的手段；而蒲魯東派則以每個公社的薩發凌(Souverainist)爲消滅國家權力機關的手段。

亞爾膜氏(Arthur Arnould)在他的“Histoire populaire et paysannaise de la Commune de Paris”書內，記載「革命的雅各賓派」與「社會主義分治派(Socialistispen Fodralisten)互相衝突的情形，極爲詳盡。他說：

「同一個名詞，在同一個會議的許多會員當中，發生兩樣不同的解釋。巴黎公社這個名詞：在這一派人心目中，認爲是應用反對政府這個原則的化身，是同主張中央集權的專制國家的舊觀念挑戰。公社的誕生，依他們看來，是分治主義的原則上的勝利；社會各個集團自由結合的開始；實現直接民權的先聲；而且是一次偉大的澈底的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的頭段

階級。這般人的眼光，以為牠——指公社——是狄克推多理想的澈底反對者，牠是民衆直接奪取政權的先驅；因此牠絲毫不妥協地反對一切立於民衆之上或站在民衆以外的權力。以後凡抱有這種思想的人物，就被人稱爲社會主義者，或叫做少數派。

在另一派人心目當中：恰與少數派的意見相反，以為巴黎公社不過是繼承一七九三年公社的事業。代表一種大權集中於少數人之手而以人民的名義行使的狄克推多。他們破壞舊式組織的方法，可謂換湯不換藥，僅以政權之移轉或掉換幾個新的行政首領，或以戰爭武器反抗國民的公敵，即已盡其能事。

這班人的思想，仍然脫不掉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這個觀念的窠臼。他們雖然採納分治合作的原則，寫在自己的旗幟上面，都非出乎本心；全爲巴黎人民意志所左右。……他們緊守由長期奮鬥生活中所獲得的思想習慣和經驗。一旦達到需要實際行動的時候，他們仍能回過頭去，遵循舊有的途徑；應用陳舊的手段，企圖實現新鮮的理想。他們毫不了解。在這些情形之下，表面的形式，時常勝過實際的內容。那些想以狄克推多的方法獲得自由的人，結果適得其反，到把自己所欲拯救的東西，業已置之於死地了。抱這種見解的人，即所謂公社的多數派。多數派的份子，極爲複雜，由社會上各種不同的份子集合而成，他們自稱爲革命的

雅各賓派。

杜博義 Dubrenil 引證這段詳細的言論加以註解，說她僅與這兩種趨勢的極端方面完全符合。倘若我們想辨別一種趨勢，也可同樣如此說法。我們可以在每種趨勢中，發現他的陰影；倘若我們要想獲得對於這種趨勢明確的認識，就必須援用爲牠最合宜的名辭。從四月三日起，公社迫於環境的需要，不得不退到防守地位，放棄佔有全法統治全法的念頭；回此實現雅各賓理想的基礎完全動搖了。當此千鈞一髮之際，若是當時能阻止巴黎已經獲得的自由，不爲反動的法國所壓倒，已經是令人快意的事；誰還敢作統治全法的美夢！

在這種危急的情形之下更無人敢於保證蒲魯東派毀滅法國政府實行分治合作的夢想，可以實現。

主張中央集權的雅各賓派，與提倡分治合作的蒲魯東派，也許由於當時局勢的壓迫，可以趨於共同的目標；而且這個目標，祇要當時局勢的推移較爲有利於公社方面，一定可以實現；且爲當時全法的迫切需要。即資產階級的政治家，亦表同情於這種目標：——就國家德謨克拉西的可能範圍以內，極力實施地方自治，縮小中央政府的權限；取消常備軍，實行徵募民兵制度。

這種目標亦易爲蒲魯東派所接受；因爲他們在帝國的末年，已經捲入政治爭鬥的漩渦，並已開始將嚴格的蒲魯東主義，與馬克司的理想攙雜一堆，溼潤不分。

最後的結果；一定可以產生一種爲馬克司所極端贊同的政策。假使馬氏當時也在巴黎，或許不偏袒任何方面，保持中立的態度。賴當時實際環境的需要，與公社中有力人物的真知灼見，或可產生一種強有力的政策，維持革命的大業於不墜，挽狂瀾於既倒。不意麥得爽

Mendelson 對於公社政治方面所下的判斷，較之經濟方面尤見確當。他說：(in seinem Nachwort zu Lissagarag, S. 525)

「公社的創造人，似乎自己也不知道應當做些什麼事體。」

公社政治方面的新創造，全係兩種趨勢的內部衝突的產生。公社最大的痛苦，卽是組織缺乏；這是才從帝國重重壓迫之下援救出來的與新興的巴黎無產階級缺乏組織的習慣和能力的自然結果。

公社自始就在與凡爾塞宣戰狀態中。民衆的組織與訓練，較之戰爭更爲需要；但是公社全未注意到這點的重要。公社的軍隊，係由兵士自己所選舉的長官指揮；因此軍隊的長官，不受最高幹部的指揮，而爲他們的選舉人所左右。拿這種方式組織軍隊，無論如何決不能形

成有力的軍隊；祇有已經潰散的車隊才可適用這種方式。俄國的鮑爾塞維克也看到了此點，所以他們需要強有力的軍隊的時候，立即取消兵士代表會議與兵士選舉長官的權力，代之以國家任命的軍事長官。國民自衛軍是否服從最高幹部的命令，完全由他們的意思而決定。所以真正為公社而奮鬥的武士數目極少，毫不足奇。當時領餉銀的兵士，雖有一六二〇〇人，長官六五〇〇人；但是在危急的四月三日那天以後，實際參加前線兵士的數目，約在二〇一三〇〇〇人之間。這些勇敢的志士，擔負了全部戰事的重大責任，抵抗一種訓練有素器械犀利的軍隊，並且這個軍隊在五月的下半月，已經達到十二萬人的數目。

下層的無組織狀態，更因為上層缺乏組織，愈加不可收拾了。公社與國民自衛軍的中央委員會同時並立；中央委員會雖已將一切權力移交公社，但是一切與國民自衛軍有關的處置，中央委員會仍須不斷的參預和過問。

馬克司事後寫信給辜克滿，Rugelmann 論及一六七一年四月十二日的公社事件；認為中央委員會老早把權力移交公社（*Neue Zeit* XX 5, 790）是一個不可挽救的錯誤。可惜他沒有舉出理由，為什麼這是一個錯誤。我們或者可以假定：因為作戰計劃不統一的關係。馬克司並且聲明這個錯誤，是巴黎公社的第二個錯誤。公社在三月十八以後，沒有立即向凡爾塞

進攻，才是第一個不可挽救的錯誤；種下了公社失敗的因子。所有這些自始就使公社的軍事狀況不幸陷入絕望的錯誤，在公社沒有集合以前，就已經犯着了。有人以為戰事若在中央委員會的最高領導之下比較在公社指導之下或者可以獲得相當的成功。其實中央委員會的態度，較之公社更為搖惑不定。然而軍事方面原非無產階級的優點！最危險的事，莫如在這兩個最高權力機關互相牽制以外，另外又產生一個第三個權力機關，即所謂砲兵委員會，也可以參預作戰的計劃。

「三月十八日成立的砲兵委員會，因為大砲問題與陸軍部發生齟齬。後者擁有 *Mausfeld* 地方的大砲，而砲兵委員會則佔有 *Montmauthe* 地方的大砲。」*Lissagaray, Geschichte der Kommune, 5,205*)

公社為挽救普遍無組織的危急狀態起見，就想擴大政府的權力；乃於四月二十日成立一個由九名委員構成的執行委員會；由九部各推代表一名，執行前面所說的各部 (*Exekutivkommissionen*) 的職權。但是因為積弊太深，公社雖如此的變更其組織，亦無法挽救了。於是引起雅各賓派對於一七九三年事件的回憶，要求設立一個有無限權力的保安委員會。當凡爾塞軍隊進逼巴黎公社無法阻止的危急關頭——公社社員綽號為美髯公的美阿特 *Miot (Lissagaray,*

5, 263) 乃於四月二十八日提議，設立一個保安委員會。這個新的委員會應有指揮公社各部的權限。公社內部對於設立此項委員會的意見，全體一致，認為有設立的必要。但是對於這個委員的名稱，各執一見，爭論不休。革命的雅各賓派以為把這個委員會，叫做保安委員會，可以喚醒人們對一七九三年共和的回憶，足以號召民衆。在事實上，偏偏這種恐怖政治的回憶，增大了蒲魯東派的反對氣燄。

五月一號那天，設立保安委員會的提案，竟以三四票對二八票通過。選舉的時候，少數派中大部分（二三票）拒絕投票。他們所持的理由如下：

「我們沒有提出候補委員的名單的理由：因為我們不願意選舉任何人加入一個在我們認為有損無益的機關。我們以為保安委員會的設立，是違反三月十八日公社革命所產生的社會改良的原則。」

設立保安委員會的本意，原想藉此終止無組織的狀態，增大公社的能力。不料反而擴大了紛擾的狀態，引起公社內部自行分裂的現象。這樣一來，保安委員會已經喪失了道德上的威權。而那班不辭辛苦熱心公社工作的國際派，竟宣佈脫離公社。於是公社全體社員都是垂頭喪氣再無法振作了。

五月九號，公社就已經着手取消這個無用的委員會，想選舉一個新的委員會了。

這次的選舉，少數派雖也出席參加；然而少數派與多數派的衝突，終究無法避免。一旦他們發現在這個可怕的名稱之下，即是一種真正的狄克推多之後，他們乃拒絕選出己派的人物加入這個委員會，犯下在當時不可思議的錯誤。

改組以後的保安委員會也乃第一保安委員一樣的無力；並且更進一步，積極地反對少數派，罷免許多少數派的職位，使公社陷於人材貧乏的地位。

這樣一來於是引起了多數派與少數派公開的決裂。五月十六日，少數派在報紙上發表一篇宣言，抗議他們的免職，反對不負責任的狄克推多；並且聲明從此時起，不再參加公社的工作，祇努力下層分區的活動，與國民自衛軍的工作。在這篇宣言的末尾他們還說：他們希望因此可以避免公社內部的衝突，因為多數派與少數派總是抱同一目標的，他們極願避免這種衝突。宣言的語氣，雖是如此客氣，但是這個宣言的影響，仍不能阻止多數派與少數派的決裂。

少數派雖然對於經濟問題與組織工作，較之多數派有較好的經驗與能力；但是他們的政策也無一貫的主張。例如他們在五月一號以拒絕投票反對第一保安委員會的狄克推多，同月

九號他們又承認這個狄克推多並提出第二委員會的候補名單，同月十五日，他們又決議放棄在公社的工作，公開抗議這同一的狄克推多。同月十六日正是抗議書公佈的那一天，他們又忽然軟化了，接收國際巴黎支部「大敵當前不可分裂」的警告。因此簽名於這個抗議書的二十二人當中，有十七人竟於次日又出席會議。然而多數派並不因此而和緩了反對少數派的意見。多數派中有思想的人物，雖極力調停，Vallant 卽爲費力調之一人，使雙方重歸和好；但是這種提議仍被拒絕，而且通過了美阿特 Miot 的提案。其內容如下：

「祇要那些簽名於這個宣言的少數派，自行撤回這個宣言，公社可以不究既往；但是公社仍須責備這個宣言的內容。」

杜博義 Dubreuilh 對於此事，甚爲感慨。他說：(S, 440)

「所以雅各賓派與蒲魯東派的對立，好像兩個宿怨難消的同胞兄弟，至死方休。」

二十一日凡爾塞的軍隊進佔巴黎，公社在二十二日舉行最後一次的會議。

公社的政治，有如一幕令人注目的戲劇。在公社中所代表的兩種趨勢：每種趨勢都有一個政治綱領。這種綱領，若嚴格方面來說，均無實現之可能；而且使信服這個綱領的人，行動方面往往誤入歧途。若能在當時環境壓迫之下，從這兩個綱領中，捨短取長，產生一個新

的綱領；不祇是完全適合當時法國的需要，即在今日仍有不可磨滅的價值。例如公社提出的「地方自治」與「取消常備軍制」這兩個基本要求，即在今日，對於法國前途的重要，並不減於第二巴黎公社的時代。

G 公社中的恐怖思想

我們不能專討論保安委員會；忘記了想到一七九三年的恐怖政治。因為保安委員會的狄克推多這個問題而發生的衝突，自然會繼續存在於恐怖主義這個問題當中。雅各賓派自始就以恐怖主義為惟一的鬥爭的手段，而國際派則自始就反對恐怖手段。

公社開幕的頭一天，這種衝突，已經無可隱諱。當會議中有一個社員提議廢止死刑，立即有人反對；並且大呼：「呵！他要援救 Vinoy's（凡爾塞軍隊的統帥）的性命！」

四月二十九日佛蘭克 Frankel 在國際巴黎支部會議席上，曾以下面的詞句，宣佈國際的政策。「我們要建立工人的權力，祇有利用道德的力量，與勸導的方法，方為可能。」

在另一方面我們知道戲劇家 Feihu Pyat 會計官 Throphit Fene 與大學學生 Raoul Rigault 這一班人，簡直是一些殺人不眨眼的動物。

在原則上，所有雅各賓派都應當同情恐怖的手段。但在他們在實際行動上，卻不盡然。

有一大部分雅各賓派的人物，仍然離不了人道主義的思想。此外第二巴黎公社與第一巴黎公社處境不同，沒有發生恐怖主義的需要；並且從未作此念頭，想在小資產的經濟基礎上面，樹立一個完全滿足無產階級利益的社會這個難題放在自己的肩上。同時第二巴黎公社應用權力的範圍，也祇限於巴黎一隅；而巴黎的大多數居民又一致擁護公社；所以公社沒有使用恐怖手段鎮壓政敵的必要。至於那班真有危險性的政敵，原在公社的勢力範圍以外，又無施行恐怖手段的可能。

所以第二巴黎公社，完全缺乏實行恐怖政治的動機。至於Baarl Rigault與Fome在保安委員會所做的事，箝制輿論，捕殺政敵，不過是染了帝國時代的餘毒，並非做行恐怖政治；因為他們執行的手段，與工作的方式，完全與恐怖政治的不同。布朗葵派Rigault是一個大學生，以常與警察奮鬥，知名於世。他對於警察的陰謀詭計，無不洞悉，所以在三月九日武裝暴動猶未爆發以前Lauer就已經說到這個人。他說：

「那班認識他（指Rigault）的人，時常告訴我一些稀奇的事實；說他怎樣巧妙地尾行於警察之後，紊亂警察的視線，避開警察的追索。且有時獨自將巴黎警察廳玩之於股掌之上」
(Unter der Pariser Fommuue, Bin Tagbuch, Leipzig, 1878, 5, 18,)

三月十八那天，他已經獲得了一個玩弄巴黎警察廳的機會。十八十九兩天晚上，他的首要工作，即為留守警察廳。

他在警察廳的行動，馬下惹起了各方面的反對；猶以國際派為最激烈。這種行為，雖然表面上與一七九三年公社的歷史有關；但與一七九三年的原則，毫無因緣。

另一方面係我們已經知道的，我們不能以鎗斃 Thomas 與 Clement 兩個軍事長官的責任，歸咎於公社；因為這件事發生的時候，公社在那時尚沒有成立。

祇有一種手段可以說是公社的恐怖手段，即所謂逮捕保人 *Obligé* 為質的辦法。逮捕保人 Geisel 是一種無意義的處置，不但不能阻止殘暴的行為；而且經驗告訴我們，證明這種方法，徒然增加許多因衝突而引起的殘暴行為。

若是公社不願完全忍受各方的抵抗，要使公社採用別種處置辦法，也是很難。凡爾塞方面鎗斃俘虜的事實，自從四月三日以後，就不斷的發生了。

[Thoal (一個國民自衛軍的指揮官在四月三號為凡爾塞軍隊所擒)的被處死刑與 Pverna Chailan 兩人被拘，激起了巴黎人不可抑遏的憤怒心。公社中有許多社員，要求立即鎗斃一些反動派，並嚴懲收師教士出身的反動派。少數雅各賓派與 *Jules* 對於這種過激的舉動

，大為吃驚。主張頒佈一種保人 (Geisel) 的法律，藉以緩和凡爾塞的暴行。而且這種法律，在一種相互的默認之下，儘可不必執行。」(Fiam Histoirie de la Guerre Civile de 1871 Paris 1879 S, 246)

這種法律的產生，不是以草菅人命為動機的，而是以拯救人命為目的。蓋欲一方藉以阻止凡爾塞槍斃政敵的暴行，一方藉以制止巴黎人立刻的報復。

四月五日，公社發表一篇宣言。內說：

「民衆雖在憤怒之中，然無時不以仁慈正直之心，反對一切野蠻的流血行為，與殘暴的內亂。但是對於敵人的野蠻殘殺，採取相當的自衛手段，乃為革命民衆的義務。這雖然使民衆感着莫大的困難，民衆當保守 (Auge) 以眼報眼以齒報齒 Augen Aug Zahn un Zahn 的原則。」(Journal Officiel, 6, Mai, S, 169)

在事實上，公社表現十分豁達的度量，與正直的心腸；並沒有遵守這個「以眼報眼以齒報齒」的信條！

公社所頒佈的保人 (Geiseln) 條例規定，凡表同情於凡爾塞的嫌疑犯，應立即提起控告，捕交特別法庭。法庭應於廿四小時以內提訊，四十八小時以內，宣告判決。但是被判決的

政治犯，不可處以死刑，儘可將其作爲質證，(Geiseln) 加以永久的拘留。即是戰場的俘虜，也須提交這個特別法庭；由法庭決定應當釋放，或者作爲質人，永久拘留。最後規定：若凡爾塞鎗斃一個公社的信徒，或一個被俘的公社戰士，公社則鎗斃三個保人 (Geiseln) 作爲報復之手段。

最後這條規定猶爲表面文章；公社從未照此實行。而凡爾塞方面竟不顧他們在巴黎被捕的朋友底生命之危險，稍經停頓，又繼續把捕獲的俘虜，處以鎗斃的犯刑。梯爾 (Thiers) 雖自認不諱，要藉此激動公社實行流血的手段；因爲他狠明白，這是於凡爾塞有利的事體。若是公社鎗斃一個保人，一定會引起全世界尙爲中產階級的感覺思想所濡染的輿論之反對；但是對於凡爾塞鎗斃無辜俘虜的慘劇，則漠不關心。反之，巴黎方面僅僅逮捕幾個保人，卽已惹起各方極劇烈的反對。

梯爾氏人格的卑鄙，思想的可憐，吾人可於兩方交換俘虜與保人那個機會當中明明白白的看出來。

原來四月十五日的法律公佈以後，立卽發生幾個教士一個良行家 Teckn 與檢察院院長 Bonjean 在巴黎被捕的事實。於是公社向凡爾塞建議：兩方交換俘虜與保人。公社方面自願

釋放主教 Danboy 氏，神父 Degueny 氏，副牧師 Lagarde 氏與院長 Bonjean 若凡爾塞政
府允許恢復布朗麥(Blangou)自由。

公社方面確懷一片好意，允許副牧師 Lagande 攜帶 Danboy 氏給梯爾氏(Thiers)的信到
凡爾塞去。Lagande 並且宣誓：若一旦交涉不幸失敗他仍是回到巴黎。

在此以先，四月八日，Zanboy 已經寫了一封信忠告梯爾氏，勸他不要再作鎗斃俘虜的
事；而梯爾氏置之不理。四月十三日巴黎報紙“L'affranchi”發表這封信以後，梯爾不得不
答覆了。但是他依然作欺人自欺之談，居然說鎗斃俘虜的消息，是一種捏造的謠言。

四月底，Danboy 才接到由 Lagande 遞呈梯爾的第二封信的回信。然而這個副牧師竟
違反誓言，不敢回到巴黎了。在這封回信內，梯爾氏拒絕釋放布朗麥的請求；並且用一種巧
妙的文字，安慰在囚的主教，担保他們的生命，決不致發生危險。羅馬教室 Nwintins 與美
國駐法公使 Walburne 雖屢次沒法調停交換俘虜的事，終於沒有結果。所以被巴黎公社逮
捕的人物，除 Lagande 之外，一直到公社瓦解的時候，仍然拘留於 Mazas 監獄之中。致於
公社無力保護他們的生命這個責任，應歸梯爾氏担負呢。凡爾塞軍隊突然用一種詭計，竟於
五月廿一號(禮拜日)逼進巴黎。那個時候，巴黎人民正在 Tuilerien 地方舉行民衆音樂會。

閉幕的時候，一個高級軍官猶持着狠鎮靜的態度，恭請聽衆下個禮拜日再來。他並且說：「梯爾氏雖宣言昨天進佔巴黎，不過是一句誇大之言。他沒有這種能力進逼巴黎。」

恰恰在這個當中，凡爾塞軍隊遂進佔了巴黎。巴黎人民惶恐異常，公社的軍隊，也沒有若何的準備。若是凡爾塞的軍隊當時迅速進行，馬下佔據巴黎全城，或許遇不到什麼有力的抵抗。但是他們進兵偏偏緩慢，遂使公社的戰士，有相當的時間重行集合起來，與逼進巴黎的敵人，作猛烈的巷戰。這次的巷戰，竟延長至一個星期之久。當凡爾塞軍隊毫不留情，鎗斃武裝的俘虜，仇殺一切有嫌疑的民衆的時候，民衆憤怒的感情，燃燒到了白熱的程度，有許多研究公社問題的歷史家，認爲凡爾塞軍隊的緩進，是固意要擴大反抗，增加犧牲者的數目，使公社遭受一個極大的失敗，必非妄言。

「若是凡爾塞的軍隊當時從 *Guais* 河的左岸前進，他們或者祇在 *Montmartre* 上面的海軍部碰到些微的抵抗；即可於廿四小時以內，佔領巴黎全城。而他們計不及出，竟緩攻巴黎，使公社的戰士，獲得集合的時間。結果使俘虜的數目，十倍於戰線上兵士的人數，擊斃的民衆，反比站在戰壕後面的人數爲多。至於正式軍隊死傷的損失，死者共祇六〇〇人傷者共七〇〇〇人。」(G. Bourgin *L'histoire de la Commune Paris 1904*, S, 168)

公社被殺的人數，竟超過二〇〇〇〇人。據中產階級急進黨人 Pallejan 的推測，約有三〇〇〇〇人之譜。若依軍法處長亞倍將軍 (General Appet) 的計算止有一七〇〇〇人。此外還有許多被難的人，因官所無從調查，故其數目雖難確定，但不至超過三〇〇〇人。至於被捕的人數，共三八五六八個人，內有一〇五八個婦女六五一個兒童。其中因為待遇不良，犯於獄中的，總數為一一七九人，鎗斃二七〇人，判決放逐與徒刑的共一〇一五七人，內有六十二個兒童。

巷戰期內，許多公社的戰士，激於憤怒，橫施報復的手段，自非驚奇的事實。他們的失敗，愈在眼前，報復的手段，就更加野蠻。公社的生存一旦中斷，鎗斃保人的事實，就從此開始了。廿一日凡爾塞軍隊逼進巴黎，廿二日巷戰開始，廿四日就發生鎗斃一個保人的事實了。

鎗斃保人的事實，雖然是盲的報復，與絕望的憤怒的結果，並非事前有意的舉動；然而此處仍然表現稱各賓派與國際派的衝突。鎗斃保人，本是由那個狂熱的布朗麥派 Pauri Rigault 開始執行的。他於廿三到廿四日兩天晚上，鎗斃那個在三月十八日和許多人一起逮捕的憲兵，與四月中入獄的報館主筆 Clawdy。因為這位主筆曾於正月廿二日向民衆開鎗，

不幸 Rigault 的朋友 Sapia 也在他的身邊遇害。

廿四日 Rigault 被捕，旋即爲人所殺。這個時候，那位年老的布朗葵派 Gentan 要求立將六個保人處以死刑。內有我們已經知道的三人：一卽主教 Jarbov 一卽院民 Banjean 一卽神父 Jegweny。布朗葵派 Ferre 卽給他以全權處置此事。

「執行這些犯刑的劊子手，盡是一些年輕的人，與尙未成年的青年；他們受了大都會所種下的罪惡的刺激；毫無責任心的感覺。他們的慾情的發達，爲要早過他們的鬍鬚之生長」。(Piaux, Guerre Civile, S, 528)

同樣不幸的事實，我們最近在德國也可在那班執行軍法的人之身上觀察出來。那位布朗葵派 Feare 又於廿六日四十八個曾於三月十八日射殺民衆的保人其中大部分是教師，偵探，警察，憲兵，移交軍官 Gais 看管。Gais 也是一個布朗葵的信徒。他將這些犯人帶在身邊，後面跟着一羣毫無牽掛的武裝兵士。這些兵士明明知道敵人不能赦其一死；乃於絕望之餘，發揮狂暴的習氣，衝到這些犯人身傍，把這些犯人，一個又一個，通通殺死了。曾經國際派凡爾林 Varlin 與 Serriller 極力設法營救，終歸無效。他們兩位自己也幾乎受了憤怒羣衆的懲罰，因爲他們罵當時狂暴的民衆爲凡爾塞人。

五月廿八日，不幸那位爲營救保人而不惜犧牲自己生命的凡爾林 Varlin，被一個在街上遇見他的教師告發：爲凡爾塞人所捕殺了。資產階級的份子，動厥辱罵公社的恐怖手段但是對於凡爾塞的殘暴，酷遇俘虜，殺戮志士的慘劇，則默不言。反之，對於這五打被殺的保人，則爲之嗷嗷不休。他們裝聾作啞，似乎不願意知道這幾個被殺的保人，僅爲小社崩潰以後，少數爲凡爾塞所威嚇的暴民底報復手段的犧牲品。

這些事實，恰恰足以證明公社是如何不願施行恐怖的手段。我敢說：在歷史上，沒有一次內亂能夠不顧敵方的殘暴，仍然堅守人道主義的信條並且爲此的嚴格的奉行有時並且不惜反對自己的同志底暴行，有如一八七一年法國的內亂一樣。

所以第二巴黎公社的失敗情形，與實施恐怖政治的第一巴黎公社的失敗情形，完全不同。●第一巴黎公社的失敗，巴黎的工人，不但沒有挺身出來爲之抵抗敵人，而且還有許多人覺得牠的失敗，減輕了許多無謂的壓迫甚至禱祝其失敗。所以一七九四年 Thermidor 九日，兩方軍隊正式開火的時候，羅伯士比的信徒，聞槍聲一響，即各自逃命，潰不成軍了。

但是第二巴黎公社的失敗，巴黎的無產階級，則以令人欽仰的毅力，竭盡最後的力量，維護公社的生存。頑強的凡爾塞軍隊，亦須巷戰七日，始告平熄。而殉難的死傷人數與逃亡

人數，幾達十萬餘人可謂忙矣！」（一八七一年七月有人估計爲九萬人 Bourgin I, Comnne, 5,183）

第二巴黎公社終以內部發生劇烈的衝突，不幸歸於失敗。我們在前面已經知道公社內部的兩種趨勢，是站在怎樣敵對的地位，一直到公社最後一一的鬪爭爲止。但自始至終，沒有一派想以強暴的手段壓倒其他一派。所以多數派與少數派仍可不顧一切，共同奮鬥，一直到公社瓦解之時爲止。

所以社會主義各派，都以公社是代表整個的鬪爭的無產階級的組織。在這個旗幟之下，不論馬克司派，巴枯甯派，拉薩爾派，(Lasalle)與愛錚拿哈派，(Eisnacher)都是團結一致的。無產階級第一次組織政府的壯史，已經深深地藏在渴望人類解放的人們的心坎裏了！這個「無產階級的狄克推多，對於全世界無產階級的解放鬥爭所發生的鉅大影響，裨益於深入十九世紀工人階級底靈魂裏的精神，真正不少呢！

7. 習俗的溫和

A 野蠻與人道

吾人已知法國大革命時代的流血悲劇，並沒有爲後人所做效，從一八三〇年到一八七一

年各國的革命志士，雖然是受了恐怖政治遺傳的影響；但在實際行動方面，極力維持人道主義的色彩。然而革命的敵人則不惜前後發揮其野蠻的獸性，竟於一八四八年六月與一八七一年五月大演其流血的慘劇了。

十九世紀中，我們可以看見工人階級不斷的趨向人道主義。

但是廿世紀初期在俄國德國匈牙利爆發的革命發生之流血的暴動，使我們回憶到十八世紀的法國大革命時代。這種變遷現象將作如何解釋呢？據一般的觀察，以為人道主義是文化的結晶。並以為人類是自然界一種反社會的性惡的生物，具有猛獸的本能，好殺善鬥。教育的進步，科學的發展，與文化的向上；才能使人類發生社會的感覺，互助的要求，厭惡殘暴與流血的行為。這個觀察，即在吾人日常用語中也表示出來。譬如我們描寫溫和慈祥的行為，叫做人道，殘酷野蠻的行為，叫做獸性。許多人類學者亦把此種見解。Lomloros 學派更由此點出發，認定人類殘暴的犯罪行為，是一種 *Atavismus* 即所謂人類原始祖先底感覺生活之反映。

然而好殺的猛獸，照例是不殘殺同類的。我們有什麼理由可以假定人類的天性，是一種有嗜殺善鬥的本能的猛獸？我們雖不確切認識人類的原始祖先，但是我們必須假定在今日生

存的動物之中，人類猿是人類最近的祖先。人類底原始祖先維持生活的方法，也與人類猿一樣；大都採食植物類的生活資料。雖然有時也捕小虫小鳥一類的動物，但是他們絕不捕殺大的哺乳動物，作為自己的營養物。

殘殺同類的行為，他們自始不做；在他們當中，缺乏這種行為必需的生理構造。某種動物也許為了分贓不均，或掠奪女性互相爭鬥。但是這類性質的爭鬥，不致發生生命的危險。

人類因為科學的進步，發明了各色各樣的工具和武器，補充生理構造方面自然的缺陷；因此獲得猛獸的機能，發展猛獸本能的機會更多了。於是人類現在可以捕殺高等動物作為食料了，植物性的食料，對於人類的意義，退處不重要的地位。因此打獵與殺戮，就變為人類日常的工作了。從此時起，個人間的衝突，便可以引起殺害的行為，發生生命上的危險。但是大規模的殺害，譬如戰爭這類的現象，還不能專靠武器的發明來下解釋。

戰爭的發生，必須有更進步的文化發展為其前提。換言之：戰爭的發生，必在人類集合組成社團之後。從前很少人注意到這點就是我自己從前也沒有特別留心，所以我對於這點不願離題太遠，想藉此機會多說幾句：

人類的起源，毫無疑義是起源於有社會性的動物。但是人類與動物不同的地方：即是人

類有組織本領，能夠構造一個有秩序的不能分離的社會。而普通好羣的動物，照例營羣集的生活，相互的關係，甚為疏散。因生活條件的變遷，食物的多寡，敵人的強弱，……有時集為大羣，有時又散為小隊。個體可以時常依環境之變化，從這一個集團分開加入另一個集團，毫不感覺困難。

人類社會就完全不同了。若是我們要詳細討論這種變化，應作如何的解釋，未免離題太遠，姑且留待將來。此處祇加以極簡短的說明。

自然聲音為動物界彼此間傳達意思的惟一工具，也和人類用面語表示感覺一樣，發於自然，不學而能。所以同類的份子，都可以同樣的態度表示意思；且為全體份子所了解。

人類能為萬物之靈者，除了知道利用工具這一點以外，即賴有發音清晰的語言。人類底語言，並不是隨有生以俱來的東西；乃為其周圍的同類，積長期的經驗之產物，且為必須學習的一種東西；亦如人類有一種機能，並非天賦必須自己從周圍的同類學習之後方可產生的一樣。這種互達意思的工具，並非一成不變，可為全人類所了解的東西。其實因地而異。人類因為有了這種語言，社會的關係，自然益加堅固。因為語言，可以使人類彼此間的了解與合作，增加許多的便利。但是在另一方面，人類又因為語言的不同，可使人類這個集合體，

永久隔閡，各不相關。每一個人都爲環境所迫，生活於那個語言素習的集團以內。另外一種語言，不但不能了解，而且使他感覺孤寡與不舒適的痛苦。

捨此以外，還有一種原因，語言這個東西，可以表示個人的特性與地位，也可以維持記憶，使語言成爲保藏人類經驗的要素。已經長成的動物既使不識兩親，然而人類對於這種關係，仍可終身不忘。人類還可藉語言的表示，認識父母的父母，兒子的兒子，姊妹的子孫……

有人以家庭是一件自然的產物，血統觀念卽緣是而生。在實際上，語言方爲創造家庭的要素。沒有形容親族關係的語言，卽不會使家庭成爲永久的社會組織。血統觀念，在動物界裏，一到新生的動物自己可以營獨立生活的時候，立卽消滅。最可笑的，莫如現在有人拿血統觀念解釋家庭的構成，而且以血統觀念，解釋一個民族的形成，譬如以德奧兩國合併的要求認爲係血統的關係。在事實上，與國人的血統並非純粹德意志的血裔；而混有捷克種的成分。

因爲家庭經濟的形成，與私產制度的發展，遂使家庭間的關係，更趨密切私產所有着的一切財產，在其死後，自然要遺與那些與其曾經在一個團體共同生活的人。於是這個團體藉

此而得永遠存在。

至於種族的密切關係，建築在另一種私有財產制度之上；即所謂土地共有制。

就是動物也知愛護其生長的地方；因為他們在此處對於一切食物的泉源，藏匿的場所，危險的地點，完全清楚。但是這種地方的範圍，並非有固定的界限。假若他們在此處得不着夠用的食品，或者容易碰着極大的危險；即可無條件地擴張這個地方的範圍，遷到一個較好的地點，加入一個別的集團，營其同的生活。人類的集團生活，就有些不同了。原始時代，人類爲求人口的數目適應食物的資源起見，並非由過剩人口的地帶，遷居人口稀薄的地帶。這種解決生活問題的方法，祇可在人類的文化，發展到較高的階段以後，才可發現，既使發現，也祇能部分的實現。原始時代的人羣，聚居一處，以犧牲鄰居爲擴大自己生息區域的階段。一旦人類製造武器的技藝，發達到了相當的程度，於是大規模的戰爭與屠殺，就因此而開始了。

產物。

綜結前言，我們可以知道所謂野蠻，並非人類底獸性祖先之特色；乃爲人類文化發展的

所以一切倫理的感覺，連帶責任的觀念，都隨文化的發展，時時變更其性質。在動物方

面，這種感覺和觀念，伸張到同類的個體身上。在人類方面，則縮小其範圍，僅限於自己生息於斯的社會。人類對於不屬於這個社會以內的人，則待之漠然，缺乏相當的同情心；且有時且加之以敵視的態度。

因為交通的發達，人類社會的範圍，比較各個人所感覺的社會，日趨擴大。吾人今日已去人類發展的出發點不遠。我們的社會意識與倫理感覺，已漸漸的伸張到同類的一切個體身上去了，伸張到全人類身上去了。從一般來觀察，上面所說的，還不過是吾人必須漸漸接近的一種理想。

社會分立的結果，促成了經濟的進步。生產的發展，使社會關係，愈趨複雜；社會各個份子，集合起來，形成一個國家；有時又分裂成爲各種不同的團體。這個團體，也隨環境之同，各有其特殊的性質。例如基爾特家庭，宗教團體，職業組合，各種團體同時又發展她的特殊倫理觀念，而反爲構成這種團體的份子所特有。同一團體內面的份子，也可發生相互的衝突。在自己狹隘的範圍以內，他們可以發展極大的責任心，無限的同情心，與同胞的觀念。對於他人（指自己範圍以外的人）毫無憐惜的感情。每一個人，可於同時隸屬幾個利益互相關突倫理觀念各別的社會團體，在一個社會以內，這種衝突愈激烈，個人間的矛盾，就更

厲害。一個斯拉夫男爵的太太對待同類，是非常慈祥懂惻慷慨的人物；卻是對於她的奴婢，則毫無憐惜的感情。同一個人在家內可以做一個有仁慈心腸的人，一到應付職務關係的時候，竟可以心硬如鐵；剝削無告的勞働家。

人類文化的發展！絕不是直綫的；但是反面的假定，把人類的原始狀態，當做黃金時代，也犯了同樣的錯誤。在這一點人類歷史的關係上面，我們儘將其分為兩種互相衝突的趨勢；因環境之不同，時而這種趨勢，佔着上風，時而別種趨勢，較有勢力。

B 兩種趨勢

人類社會有一種趨勢，已為吾人所認識。人類因為文化進步，以致殘殺的武器，發生不斷的改良，人類的衝突亦繼續增加。於是繼種族間爭鬥，擴大與過剩人口地帶與人口稀薄地帶爭鬥之後，又發生貧富的爭鬥；實業發達的國家，與經濟落後的國家的爭鬥，富者龔斷自然界的財富，而貧者則被驅入荒涼瘦瘠的區域。終而在同一種族內，也發生各種的人剝削人的現象，引此彼此間的仇恨與殘殺。農業經濟發生以後，方產生一種相反的趨勢。在以往的生產業態中，打獵與飼養野獸，幾為人類在原始文化狀態之下生活上必需的手段。且為獵取野獸與防衛猛獸的侵害起見，人類不得不練習使用武器，一到農業經濟時代，武器的使用，

即無必要了。農人且時以猛獸爲其良友，因爲猛獸對於損傷農人底苗種的野獸，加以攻擊，所以農人反仇恨獵人，捕獵猛獸。

武器這種東西，在生產過程中，不但對於農人是一種贅疣，對於手工業者與以後在都會中勃興的智識階級，更爲贅疣，以製造武器爲無益的浪費光陰與材料。且以練習武器的使用，是不經濟的行爲，應當在可能範圍以內，設法減少。關於這一點，他們的見解，恰與獵人與動物飼養者相反。

所以農人手工業工人與智識階級的天性，是愛好和平的，尤以智識階級爲最顯著。農人與手工業工人的職業，需要筋肉勞動，因此他們的光榮，不祇是被人喚作單調的工作。

智識階級則不需要筋肉勞動。人家發展筋肉勞動的光陰，他們就利用這種光陰，增加自己的智識。若是有人以物質的武器，代替精神武器，調解文字上的爭論。他們自始卽以此種行爲，是一種無價值的行爲。

上古世紀的教師階級，與基督教的教士牧師，若他們尙沒有變爲統治階級與剝削階級以前，對於流血的暴行，也表示強烈的普遍的反抗。卽十八世紀的智識階級，亦復如是。

智識階級一旦達到剝削者的地位的時候，他們並不見得時常是愛好和平的。當智識階級

沒有變成剝削階級的時候，他們則表同情於工農無產階級的理想。在他們心目中，人類並非一種達到異樣目的手段，人類的生存，原有自身底目的，(Selbstzweck)或為一種達到全體目的手段；但非為達到另一個人的目的的手段。康德(Kant)在倫理上的立場，完全與此吻合。所不同的：康德並沒有把這種倫理，當作一定的階級與一定的時間之倫理觀念，為超越現象世界的一種倫理規律。即是萬能的上帝，亦不能離此規律而存在。而且上帝亦不許以人類的手段呢。(參觀 Kant 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2. Hauptstück V. Das Dasein Gottes als ein Postulat der reinen Praktischen Vernunft)

不拘吾人用何種理由，證明這條倫理的規定。但由此所引出的結論，當然是個人人格的尊重與人類生命的神聖，人類幸福，不可侵犯的倫理觀念。

但是不幸，這種愛好和平的趨勢，已在農業經濟的初期，與城市制度肇端的時候，發生了流弊。凡是愛好和平的階級與民族，都是缺乏自衛能力的階級與民族，容易為強暴的階級與民族行欺凌所剝削。這些強暴的集團，形成一種勇敢好戰的貴族，凌駕愛好和平的人民之上。他們比較以前專以狩獵與戰爭為職業的遊獵民族，還要強硬，幾以流血的殘酷手段與猛獸的本能，為對待同類惟一的方法。所以殘暴與人道形成了近代文明社會的兩大柱石。

因時代之變遷，與環境之流動，殘暴與人道互為起伏，交相隆替。

古代羅馬的城市居民，一致厲行侵略政策。羅馬以軍事的優勢，征服了一切沿地中海立國的國家。所以羅馬城市的居民之生活，即賴剝削被征服的領土。他們不但醉心戰爭，同情戰爭的極端方式，因為戰爭的勝利，使羅馬人擁有無數的賤微的奴隸供其鞭策，終以驅使奴隸在圓形之劇場上 Amphitheatern 互相格鬥，為取樂的方法。

以人類互相殘殺為高等遊民與下等遊民消磨光陰的方法，可以說是一種無恥的殘酷行為，達於極點了。但是這種行為，並非明示古代羅馬處於野蠻的狀態；偏偏發生於羅馬文化極盛的時代。迨羅馬文化被其國境四圍的野蠻民族加以侵害，漸漸衰落以後，這種比武的遊戲 Gladiatorenspiel 才告停止。

隨社會經濟之發展，資產階級乃繼武士貴族而勃興了。這個剝削的階級，含有兩個互相衝突的趨勢，也以剝削他人為維持生存的方法。他們不以人類有原在的目的，(Selbstzweck) 而以人類為達到他們目的的手段。這樣一來，已經潛伏反人道的與殘暴的根源；且隨環境之不同，變更其發展的程度。

殖民政策的發生，使人類流血的戰爭更形擴大。另一方面，在商務獨佔的時代，又形成

了商業資本與實業資本的劇烈的衝突。商業資本在這個時代以內，表現極端掠奪與好戰的色彩。牠不但掠奪了全印度的居民，經營黑奴貿易，而且強迫自己的政府，舉行流血的掠奪的殖民地戰爭。

實業資本不但擔負戰爭的犧牲，支付巨額的軍費；而且在戰事期內，實業資本時有停滯的危險。所以實業資本反對戰爭厭惡戰爭，與商業資本煽動爭奪殖民地的戰爭資本恰恰相反，實業資本對於西印度黑奴的同情心，極爲強烈；卻是英格蘭的實業資本，對於白種婦人與兒童，則使其做過度的工作，給以不夠溫飽的工資呢。

無產階級在這個時代以內，也無統一的趨勢。據吾人所知：無產階級爲生活條件所壓迫，不得不以人類生命是神聖的東西。輕視人命，不祇是被剝削的社會階級受害，剝削階級也要吃虧。戰爭的結果，除了少數例外徒然增加被剝削階級的痛苦和負擔。而戰爭的勝利物與掠奪品則爲統治階級所獨享獨佔。所以無產階級仇恨一切的戰爭與殘酷的暴行。

然而無產階級並非忽然之間跳上實業無產階級的歷史舞台上去的。在近代實業猶未發展以前，因爲封建制度的崩潰，農民所擔負的賦稅特別加重。於是農村的破產，與生產力的衰退，成爲普遍的現象；終至使農村的勞働力發生過剩的危險，壓迫農民流離四方。而留存農

村的農民，工作的負擔，日趨增加；而那個時代的實業，又無力容納農村過剩的勞働力。因為實業自身受當時的工作 *Zunft* 的限制，無發展的可能。於是無數的失業游民，滿佈國內，不能獲得生產的工作，維持其生活。遂流為乞丐，小偷，強盜，掠奪他人的剩餘勞働力，維持其齷齪的生活；為同類屏除於社會生活之外，受社會的凌辱輕視。所以他們對於現存的社會，抱極端的仇恨心理。因為統治階級沒有解除他們痛苦的能力和決心，與統治階級的恐怖手段，遂使這種仇視社會的心理，愈加強烈。統治階級想以恐怖手段，強制為飢寒所迫的無產階級，放棄討乞偷竊強搶的行爲，用嚴厲的刑罰，懲辦這些不幸的人們，真所謂民不畏犯，奈何以死畏之。馬克司在資本論中，屢次把這種法律叫做「懲辦流氓的虐刑」，「*Bestrafung gegen Vagabondage*」真是一點不錯。（*Volkswirtschaft* S. 664ff.）

統治階級沒有能力將產生社會罪惡的根本原因消滅，而以恐怖政治企圖制止社會罪惡的發生，結果一定是失敗的。我們雖然把犯罪者大批的送進牢獄，犯罪者的數目，決不會因之而減少。他們除了繼續討乞與搶奪的生活以外，沒有別的生路可走。結果徒然引起他們與警察不斷的爭鬥。而惟一可能的結果，不外增加無產階級的仇恨心與無產階級的野蠻化罷了。

這自然祇限於無產階級的墮落份子。但是以當時的人數之衆多，又以親戚朋友鄰居各項

社會關係，自然會使他們與工資勞動者，農民，下層小資產階級發生密切的結合，共同站在襁褓無產階級的立場，接受他們的感情和思想。

所以在法國大革命爆發的時候，人道的感覺，祇限於一班智識階級，與那班受智識階級的影響的資本家，以及小康的小資產階級。至於無產階級和與其接近的階級，一到壓迫他們的國家權勢瓦解的當中，立即發揮其平日由那種虐刑 *Platzesetzung* 所養成的野蠻與粗暴性情。

流血與恐怖統治

貧困民衆受了統治階級底政治的不良影響，一旦行動可以自由的時候，革命的份子，採用野蠻的殘暴的方式，使法國的大革命，變為一大流血的革命，乃是毫不足奇的現象。

但是我們不能把一切革命的流血行為，一律看待。我們必須明確區別這個界限：那種粗暴的民衆，由於爭鬥的絕望，或者由於無意識的恐怖感情所釀成的行為。那種是經過考慮的恐怖制度，由統治者以法律的方式，有計劃的推行，在他們一切認為危險的份子。由民衆自己所釀成的流血慘劇在大革命的初期我們已經發現了。但是恐怖政治的開始，約在一七九三年的夏天，以捕殺 Girondien 初試其端。

民衆的流血暴動，在攻襲巴士的獄的日子，已經有了充分的表現。佔領巴士的獄以後待遇被捕的俘虜，太覺殘酷。不但一部分俘虜被人處以死刑，且爲民衆梟下首級，沿街示衆。這種舉動，在革命期內還是時常的發生。

當全歐君主同盟，向革命宣戰的時候，民衆的感情，有如揚湯止沸，愈發不可收拾了。流血與殘暴的事實，更形增加了。普魯士軍隊進逼巴黎，與普軍統帥布朗希瓦克公爵 Herzog Von Braunschweig 宣言要燒毀巴黎全城，以及國內反動派援助敵人的消息，更使巴黎人民的憤怒感情，達於極點。一七九二年九月二日，竟把囚在監獄的政治犯盡行提出殺死，至三千人之多。這件流血的慘劇，可以說是大革命時代最悲慘的一幕。

蘭姆巴萊公主 (Die Prinzessin von Lamballe) 的惟一罪狀：說他不應該是皇后的女友。她不但無辜被殺，且遭剖屍挖心的慘劇。依麥西 Mercier 的報告：(Le Nourverain Paris an VXS, III) 還有一個極無聊賴的人，竟把她底生殖器上的陰毛剪下，做成一口鬚鬚，粘上自己嘴唇。蘭姆巴萊的首級，亦被人梟下懸之竹竿上，攜至監獄窗前，傳觀身囚囹圄的皇后。皇后一見之後，立即昏倒地下許久不省人事。就是平日號稱溫和的人，到了此時，也不避殘暴的手段了。桑姆布女士的生活經驗，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桑女士在十一月大屠殺的時候，她正在監獄裏陪伴她底被捕的老父。一位與他父親靠近的先生 *Elr Herron Saint Mart* 兩股被人折斷。因為他親眼看見他的父親，也須受同樣的慘刑，乃蔽之以身，經過許多時候的掙扎，待身受三傷之後，她底父親方才倖免於難。

「誰敢惹動這班人，他們當中有個人拿一個玻璃杯，將 *Saint Mart* 這位先生底首級流下的鮮血傾注杯中，然後攪以醱酒與粉末，對她說道：假使她能夠為民族前途吃下這杯血酒，她才可以救出他父親的生命。她毅然地一口吃盡，始為這人送出獄門。」（這個報告見於

Briefe aus der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 II, 176 發行的叢書。）

這部叢書是在德國革命以前不久出版的：序言的日期，是一九一八年六月。序言的落尾說：

「革命的精神，與一幕悲劇的認識，在今日這個嚴重的時代，或可以給吾人不少有益的教訓與援助。目光短視的人們，竟令預料不到，在目前這樣嚴重的局勢之下，革命的悲劇行將重視於吾人眼簾之前。」憤怒的民衆底殘暴行為，是非常可怕的悲劇，絲毫不容疑義；但不能以此歸咎於革命。恐怖與殘暴，乃是統治階級底愚民政策的產物。茲姑舉一例以證吾說

一七五七年有一個名字叫做但妮士的 Daniens 人，拿一把削筆的小刀，想暗殺法王路易斐十五世。Ludwig XV 法王受傷獲輕。絕無生命的危險。但是路得斐的報復之淒慘，竟令人不忍卒聞。他把但妮士 Daniens 的右手用刀砍下之後，然後將砍下的右手，當他自己的面前焚為灰燼。弄得手足胸膊到處是傷，然後以煎熬的油與鎔化的鉛傾入創口；使其痛極難當。繼之又將其五官四肢，縛於馬脚之上，鞭馬奔向不同的方向，使其屍首異處，四肢粉碎。演成分屍的慘劇。

這種暗無天日的刑罰，居然在衆目睽睽之下執行，蓋欲藉以儆一戒百。但是影響如何，我們現在當已看得明白了。這樣慘無人道的行為，在大革命的前夕，猶未終止，一直到革命暴發以後，才告結局。一七八九年八月十三號 Gauthier V, Bianzat 猶從巴黎作一報告說：

「最後這個禮拜星期二的中午，凡爾賽的民衆，阻止了一件慘刑。這個犯人因為謀殺父親的案件，被人判決，應處以絞刑，並須火焚其屍。」(Landauer Briefe usw, IS, 315)

上層階級的暴行，不幸變為下層階級的模範了！然而革命的領袖，對於民衆的暴行，始終沒有表示過有意的好感，有時且加以極端的非難。即對於九月的大屠殺，亦復如此。有人以為九月的屠殺，是由於革命領袖的授意，完全是無稽的謔言。即使我們要責備革命領袖，

祇能說他們沒有盡力抑制民衆的憤怒。但是民衆底憤怒情緒，一日達到於斯興奮的程度，又有誰敢稍撓其鋒，自取其危咧？就是 Girondien 也不敢多贊一詞。然而公社委員仍願不避本身生命的危險，營救皇后左右的婦女。除了上述的蘭姐巴萊公主遭難以外，一概被救出險（Krupoikin, *Französische Revolution* II, 5）總算是難能可貴了。

羅伯士比 Robespierre 對於九月的大屠殺案件，是一個極端反對的人。他曾經發出狠沈痛的呼聲，大呼：「流血！不斷的流血！呵！不幸的人們雖然因此而喪了生命，但是革命也淹死於此血河之中了！」（Louis Blanc, *Revolution Française* S, 207）

馬刺特 (Marat) 也同樣的反對九月的大屠殺。

「這真是奇怪的事情。據我所知：到如今還沒有一個歷史家表彰馬刺特自己對於九月大屠殺案件，是一個極端反對的人；至小也是狠惋惜的。却是馬刺特曾於八月初九。主張厲行屠殺，九月二日且進一步，主張把屠殺的行爲，擴展到法蘭西的全境。」（Han Gautreaux, *La Convention* IS, 75）

馬刺特反對九月的大屠殺，與其說是出於人道的動機，不如說是由於政治上的顧慮。反羅伯士比是一個智識階級出身的人物，對於一切的流血行爲，根本就是反對的。他已經在

一七九三年五月卅日憲法會議席上討論起草新刑法的時候，加以證明了。羅伯士比堅決地反對這個刑法。他以為這種法律，不但不能抑制犯罪的行為，徒然增加民衆底野蠻與殘暴習性。但是他的努力終歸無效。死刑仍然存在，不過取銷了最殘酷的方式罷了。惟有斬首割級的刑罰仍被保留。

這個決議案遂爲馬刺特造成一個向憲法會議買好意獻殷勤的絕妙機會。兩年以後，羅伯士比竟爲環境所迫，也不得不放棄取消死刑的思想，與馬刺特一致了。於是死刑這件東西，居然成了羅伯士比底政治的鬥爭手段了；對付自己底政治上的友人。我們早已說過：一種有計劃的經過思慮的恐怖政治，不能與過分興奮的民衆底放肆行爲，混爲一談。這種放肆行爲，完全出於一部分暴佈的無識的民衆底情緒。而恐怖政治，則爲富有思想的充滿人道精神的人物所推行。恐怖政治的發生，較之民衆的暴行，另有一種背景。民衆暴行是由於前朝懲辦貧窮人民的酷刑嚴法所激成；而雅各賓派的恐怖政治的釀成，則由於飢餓民衆的過度困乏。在當時困苦的環境之上，本沒有解決這個難題的方法：一方面要鞏固私有財產制度與資產階級的社會制度，一方面又要消滅大多數人底貧乏境遇。於是這個難題的矛盾性，使他們走入絕望的歧途。他們除了采用恐怖手段，作最後的掙扎外，沒有別的方法可想。他們自己雖然

反對這種手段，且明知這種手段的無用，但是環境的力量，終歸勝過思想的力量。不意一般人的貧乏，昨天造成了舊政府的嚴法酷刑，今日又產生了新政府的恐怖政治。惟一的區別：舊的政府想以砍頭的嚴刑酷待弱者，鎮壓飢餓的民衆；而新政府則以殺戮——從未酷待——有產階級與其維護者，爲解除民衆底貧困狀態的方法。

然而二者多不能達到他們底目的。但是這裏又另有一種區別：舊政府的生存，與其恐怖政治能否消滅無產階級的勢力毫無關係。恐怖政治的失敗，雖然可以使舊政府感覺麻煩，但是對於這個舊的國家的本身，並無多大危險。因爲無產階級在當時絕不能靠本身的力量，達到統治者的地位，而且在經濟上亦無重大的影響。

反之，這個新政府的恐怖政治一遭失敗，馬下就要解體。因爲新政府所欲顛覆的階級——資產階級——在當時環境之下，是最適宜於統治的階級。這個階級，即在經濟上也是不可缺少的階級。酷待這個階級，結果一定令使社會的進步與生產力的發展，完全歸於停頓，增加社會的貧困。然而受害最深的人，恰恰是新政府欲以恐怖政治所援救的人。

另外還有一個區別，存在舊政府與新政府兩者之間。舊政府的恐怖政治，與運用這個政府的人物底倫理觀念，完全吻合。他們可以不受內心的譴責，實行這種政治手段。在他們心

目中，這是完全自然的現象。

新政府的恐怖政治，恰與支持這個政治階級底倫理觀念，處於衝突的地位。•以那班執行恐怖手段的人物，自始就受自己良心上的譴責。他們雖然以巧妙的言辭，慰藉自己不安的良心；然而他們底道德操守，終被埋沒。結果增加了內心的不安，日趨腐化了。世界上雖然沒有絕對的道德觀念。每一個時代每個國家，每個階級，各有其相當的道德觀念。然而倫理這件東西，仍不失為團結社會的鍊鎖與一切社會問題社會生活衝突的堅強支持點。世界上沒有比行為與思想衝突這件事，更危險的了，一個人的行為竟背叛自己的良心，而反對平日所信奉的道德信條。恐怖政治一旦遇到有力的反抗，如此迅速地崩潰，不能不說是受這件事的影響。那些健存的恐怖政治家，以後是如何迅速改變自己原有的觀念，祇要看拿破崙畏懼宗社黨甚於畏懼那班共和黨人的心理，即可證明共和黨人的道德力量，在當日恐怖政治之下，遭受了何種的損傷。

D 十九世紀習俗的溫和

法國的大革命是世界史上大流血的時代。有許多根據這種歷史的事實斷定流血是真正革命過程中必不可避免的現象，並以爲如果不把革命宣佈殺刑，流血在所難免。在實際上，一

七八九的革命，反把產生那個時代的恐怖與殘暴的重要原因消滅了，爲以後的革命準備了溫和的方式。致此之由，一方因爲封建勢力之崩潰，與實業資本的勃興，使襁褓無產階級，變爲工艱勞働者。一方因爲一個社會運動的爆發，到處或遲或早，促成德謨克拉西的勝利。最後還因爲研究革命史實與資本主義發展法則的結果，創立了一個理論，使無產階級的政黨樹立了一致的目標，與一個有實現性的行動綱領，不致覆轍重蹈誤於歧途，以恐怖手段爲實現革命的策略。

革命的結果，確使農民得着解放，一躍而爲地主了。因此農村經濟發達的程度，到了較高的階段，收獲了較大的利益。所以農村中勞働力過剩的危險，亦因此而減少了。

就另一方面來觀察流入都會的農村人口，也容易找到職業與工作的機會。公會「Znutf」的限制，也取消了。手工業者獲得自由發展的機會以後，雖爲勃興的實業繼續擠倒，但是這個迅速生長的實業資本，需要勞働力的供給更多。

這樣形成的實業無產階級，從現在起就變成了富有特殊階級意識的階級，漸與襁褓無產階級愈離愈遠了。資本主義把這個實業無產階級的生活狀況，較之獨立的手工人，與手工經濟極盛時代的手工夥計底生活境况，弄得更壞了。但是較之襁褓的無產階級的生活境况，

毫無疑義，是要好得許多了。襤褸無產階級，因為客觀條件的缺乏沒有貫徹階級爭鬥的能力。但是實業無產階級，因為有堅強的組織，與階級爭鬥的訓練，與勝利，智識與道德倒因之增加不少。

實業無產階級不祇是起始受資本主義的經濟壓迫，卽道德方面也受資本主義不良的影響。他們住室設備的簡陋，生活的困乏與不安定，較之襤褸無產階級不但沒有若何的改善，反而因為生活的單調，與不許有任何自由的工廠管理條例之壓迫以及女工童工的剝削使他們增加了許多的痛苦，喪失了襤褸無產階級較有生氣之份子底勇氣，增加了精神上的遲鈍病態，然而他們底粗暴性情並未因而減少。

在那個時代，這個實業無產階級，或者沒有自行解放的能力。全賴不斷的階級鬥爭，慢慢的由失望的生活境況，相繼抬起頭來，這種過程愈向前進展，無產階級的人道精神愈益發揚。又因革命的影響反應，遂使處罰無產階級的刑法也漸漸他改換原來殘酷的性質，促成這種人道精神的發揚，變為溫和了。此卽我們已經指出的那種現象的根本原因。但是十九世紀的革命無產階級底運動，却充滿了人道主義的色彩，放棄了法國大革命時代流血的暴行。

發生恐怖政治的根本原因，亦於同時消滅。所以在恐怖政治失敗不久以後，無產階級的

理論家，已沒有了深刻的認識。他們澈底認識私產制度存在一日，無產階級永無解放的機會。要想達到這個神聖的目的，祇有根本取消私有財產的經濟制度，與實行生產手段的社會公有。然而他們又找不着相當的物質條件，與相當精神基礎。他們也沒有看到經濟發展與階級爭鬥，正在創造這些必需的條件。如拿一種固定的計劃與呆板的方式，就可以解決社會問題，且政權在手，不論任何環境，皆可立即實現。

若是革命的無產階級，信仰這種理想，而那種政權，又不是一個什麼博愛的百萬巨富，僅爲一種做照第一巴黎公社底規模的政治獨裁，而同情這種政治獨裁的人，又僅爲國民當中的少數，結果一定會重蹈第一巴黎公社的覆轍，歸於失敗。這種較有理性的趨勢並不是趨避私產制度的必然結果，藉以維持這種社會制度。不過我們以爲要避免這個必然的結果，必須消滅她藉以生存的基礎。假使消滅她生存之基礎的先決條件尙未完備的時候，就是要實現這個理想也是徒勞無功。此無異以少數人的意志壓迫多數人接受那不能實現的與自己利益的計劃。結果惟有利用殘暴的手段與恐怖政治，才能達到以少數人壓迫多數人的目的。

至於沒有如此的原故，因爲工人羣衆不易接受社會主義的思想。吾人姑捨此層不論，而無產階級幾十年以來，從沒有獲得統治的地位，像巴黎無產階級聯合小資本產階級在一七八

九年以後一直到一七九四年獲得政權一樣，也是一個重大的原因。

第二巴黎公社的無產階級，雖然奪取了支配巴黎的統治權；然而不是全法蘭西的政權。即在當時的巴黎公社以內，信仰社會主義的份子亦非多數。所以他們缺乏堅固的理論基礎，遇事發生審慎遲疑的毛病。

公社失敗以後，無產階級獲得堅固的理論基礎是在馬克司主義開始向羣衆傳播的時代。此即所謂唯物史觀，係馬克司與思格斯積二十年的研究之結果。重在說明歷史的發展與經濟的發展，有相互的因果關係。依馬思二氏之意：歷史的發展，最後是由經濟關係來決定其途徑。由這個觀點出發，他們以爲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必產生許多事實，使社會主義的生產制度，不但變爲必要，而且有實現的可能。他們又根據同一觀點，以爲時機過早的革命，不待社會實現條件的成熟，硬想以社會主義的生產制度代替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結果是一定不能成功的。

馬克司與思格斯以爲社會主義者的任務，不在平空發明一種社會化的計劃與方式，以便在任何環境之下，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他們以爲社會主義者的主要任務，重在研究經濟的境况，明白認識什麼是社會目前的迫切需要；然後根據這個認識，作不斷的奮鬥。

所以社會主義的任務，不祇是在那些尙無實現社會主義可能的地方，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社會主義者應當了解資本主義的經濟關係，設法促進社會經濟關係的發展，適合無產階級的需要。

可惜這種思想，不易爲社會主義者所了解。

就是工人國際同盟以內的社會主義者，在幾年以後仍是漠視自由貿易與罷工的經濟現象；以爲這種現象與工錢制度，毫無關係。到了馬克司與恩格斯創造唯物史觀的理論以後，才使勞動羣衆認識經濟問題的意義，與資本主義的內部衝突，對於無產階級底解放爭鬥所發生的影響。

社會主義隨處可以實現的幻想，已不復爲受過馬克司主義薰陶的無產階級所信仰了。就是他們一旦奪取了政權，也祇能在現實條件容許之下，履行社會主義的理想之一部，求其適應當時當地的環境，所以社會主義不是空中樓閣，一手一足之勞；乃爲一種長期的歷史進展的產物。社會主義者應當隨時隨地留心自己的任務，什麼是在當時的物質條件與力量關係之下可以解決的問題。然後以事實爲根據，按部就班做去，才不致使事業失敗，走入絕望的歧路。不惜背叛無產階級的利益與新社會主義的精神，釀成大流血的恐怖現象。

在事實上，自從馬克司主義支配近代社會運動以後，一直到歐洲大戰的時候爲止，一切有意識的民衆運動，還沒有遭受大的失敗。至於利用恐怖手段以求達到社會革命之目的這種思想，在他們當中簡直完全消滅了。同時當馬克司主義成功了社會主義正宗的時候，德謨克拉西在西歐各國已經根深蒂固，形成了政治生活的堅固基礎；亦爲促成恐怖思想消滅的原因。德謨克拉西的精神，不祇是爲無產階級的組織與訓練，減少了許多困難，而且增加了無產階級對於自己階級的經濟條件與力量的認識；使他們放棄一切不能實現的幻想，與以內亂爲階級爭鬥的策略之信念。

一九〇二年我曾經在我所著的社會革命 *die Soziale Revolution* “[6 Kapitel]” *die Demokratie*] 一書，內面，發表我的意見如下：

「德謨克拉西在這一點上，已經有了不可磨滅的價值。德謨克拉西造成了一種政治的環境，使革命的爭鬥，有採用較高方式的可能。這樣的革命鬥爭不致於像一七八九年或者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鬥爭一樣，毫無組織與政治訓練，缺乏一致的鬥爭目標，與解決各種問題的方法，到處表現倉忙慌張凌亂無序的紛擾現象。但在德謨克拉西的政治環境之下，革命的爭鬥可以形成一個有組織的有覺悟的民衆鬥爭。這種民衆鬥爭常持有堅固的毅力，與周到的考慮，

自動的而非被動的精神，不以一時的感情衝動而憤事，也不以一次的失敗而灰心。」

從另一方面來觀察：選舉的競爭，可以測知自己與敵人的力量之強弱，認識各階級與各政黨的社會力量；並可藉此防止過早的發動，避免不必要的失敗。有時且可使敵人發覺本身的錯處，自願放棄一部分與他們沒有生死關頭的特殊權力。因此可以使革命的鬥爭，犧牲較少，不受盲目的意外事件之限制。

近代實業無產階級的形成，與其生活標準的問上，社會主義理論的發展，與德謨克拉西的穩定，遂使人類對於革命的悲慘之畏懼心理，日漸減少。二八四五年恩克斯猶懷有此種畏懼的心理，他在「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書內說道：

「假使英國的資產階級，仍無悔悟的誠意——從各方看起來他們一定沒有悔悟的誠意——不久必定發生一次空前的大革命。那些為飢寒所迫，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民衆，行將縱火焚燒富人的居室。民衆報復的慘酷，恐非一七九三年的情形所可比擬。而窮人與害人的鬥爭，將為亘古未聞的大流血戰爭。」[2Arbe S. 298]

恩格斯懷這種畏懼心理，當然祇是限於革命馬下就爆發的話。在一八四〇年左右，恩格斯說這種話，雖然是因為英國的實業界，從愛爾蘭流入不少的程度甚低與襁褓無產階級接近

的份子也算是有點過火的地方。但是恩格斯自己希望革命若不馬下爆發。無產階級正可利用這個時期發展自己的能力，充滿社會主義的精神。而革命的方式，亦不致如此激烈了。

「無產階級中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成份愈多，革命時期流血報復的現象，將以同一的比例而減少。」

恩格斯革命的預言，竟於一八四八年實現了；然而革命爆發的地方，卻不是恩氏所指的英國。這次革命失敗以後，全歐各國轉入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新時代，工人階級亦隨之而獲得許多政治上經濟與道德上的力量，歐洲最進步的國家，情形爲之一變。一八七二年即公社失敗後之第一年，馬克司即已宣言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在美英荷蘭幾個最進步的國家以內，可以採用和平的方式。

從此以後，無產階級的程度更加進步了。凡是細心觀察的人，對於此點，自然用不着懷疑。譬如像德國奧國俄國那樣頑強的軍國主義的王朝，要想推翻他們，當然祇有採用暴力之一途。總同盟罷工的手段，漸漸爲人所不注意；卻是我們須牢牢記着：德國與俄國王朝那班人物，一旦感覺政權搖動的時候，將會大施流血的手腕，鎮壓他們心目中的反叛。但是我們不能預期無產階級的大部分一朝政權在手，仍將如十八世紀末年的無產階級流於流血報復：

的騷亂；因為歷史的發展，已不允許同樣的事實發生了。

關於此點，拉的克 Radek 的意見恰恰與恩格斯的意見相反。恩格斯在其大著「社會主義從烏托拜到科學的發展」[Die Entwicklung des Sozialismus von Utopie zur Wissenschaft]一書內面，認為無產階級革命將漸漸減少野蠻粗暴的方式。而拉的克爲布哈林 Bucharin 的著作「共產黨的領綱」[Das Programm der Kommunisten] [Zürich 1918]做了一篇序言。題目叫做「社會主義從科學到實際行動的發展」[die Entwicklung des Sozialismus von der Wissenschaft zur Tat] 他與恩格斯抱相反的見解。他說：

「資本主義愈發達的國度，資本主義的護衛鬥爭將愈激烈，無產階級的革命將流血愈多。而勝利的無產階級，鎮壓資產階級的手段，將更無忌憚。」[SXXIX]

拉的克所說的話，恰恰與馬克司恩格斯所預期的相反。以鮑爾塞維克在俄國革命中所得的一年半之經驗，作爲社會發展的一般定律，已經犯了不少的錯誤。以資本家毫無忌憚的粗暴的防衛戰，視爲實施這種經驗的動機，也是錯誤的。吾人就事論事，革命以前的莫斯科與聖彼得堡的資本家，在一九一七年的十一月大革命中，決無如此的殘暴。而普得別斯特 Bredest 的資本家在一九一九年的匈牙利大革命中，更非如此橫蠻。不用說，反動派的殘酷與

好殺，遠勝於共產黨。但是奪取政權在先的共產黨，不能拿這些以後的事實，作為辯護他們的恐怖手段的理由。

無產階級的革命，又流於殘殺的暴動，乃為無庸疑義的事實。發生這種事實的原因，依我底「老年人」的頑固見解「或者」老年人的遲鈍見解「拉的克罵考次基的話」看起來，另有原因。必非拉的克所說一樣，是由於資本家的橫暴。因為在世界大戰中失敗的國家裏面，資本家的橫暴，並非從前比較新近革命的時代更減輕些。

E 戰爭的影響

社會進化，由人道主義，一變而形成今日殘忍好殺的趨勢之重要原因。吾人須於此次世界大戰中追求之即在大戰以前也已發生一種逆轉的趨勢阻礙了人道精神的發展。

這些趨勢當中最重要的一種，可以說是由於法國大革命所讓成。此即革命政府所需要的普通義務兵役制度，蓋欲藉此編練多量的軍隊，與不斷地補充，應付全歐君主同盟底招募軍隊。

法蘭西在革命後廢止普通義務兵役制度了。祇有一個君主國家採用這種制度，且加以不斷的改良，這就是歐洲列強中最小最弱的國家普魯士。普魯士國境周圍環繞着大的強隣。雷

要一個依人口的比例，比較別國強大的軍隊，維持國境的安全。因此普魯士這個國家，為其自然環境所限，自始就是列強中最貧的國家，須受列強的監視與保護。假使普魯士要想在列強虎視眈眈之下，保持自己國家的生存，不得不力求軍備的完備，犧牲其他的目的。因此普魯士自從勃興那一天起，在歐洲列強中可以說是一個頂好的軍國主義的模範。

美國駐德大使聖納 GERAND 在其自著 *My four years in Germany* (London 1917, S. 44) 一正內，對於普魯士的軍國主義用很激烈的語調說道：

「一二五年以前，有名的演說家美納波 Minabeau 在革命的初期曾經說過：『戰爭是普魯士民族的實業。』拿破崙以後也有說過這麼一句話，說：『普魯士是一顆大炮子彈造成的。』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爆發以前的不久，法國駐德使館的侍從武官，報告法國政府，說：『別的家佔有軍隊，但是普魯士軍隊則支配國家。』」

普魯士在一八六六年與一八七〇年兩次戰爭中，獲得勝利，不能不歸功于普遍義務兵役「或譯為徵兵制度」的實施，與軍國精神的養成，於是歐洲各國亦相率效尤，一致實行，全國皆兵制度。約在同一時期，鐵路已經變為戰爭成敗的要素。所有奉行軍國主義的國家，盡力求其發達，於是擴張軍隊，互競武備，更有必要了。結果是男子除因重病殘廢之外，都被強

迫盡當兵的義務。

當兵的意義，雖非使人習於殺人流血的暴行，却能消滅人的人性，養成人類的殘忍。十八世紀職業式的軍隊，以其人數甚少，對於民衆的道德尙未發生重大的影響，至十九世紀全期中，因為全國皆兵制普遍的實行，於是民衆時常感受許多軍事上的殘忍習俗，尤以普魯士爲最。

十九世紀人道主義的趨勢，並不因此而中途停頓，不過這種趨勢的發展，中途發生更多的障礙罷了。

智識階級底人道傾向，曰趨顯著。許久以來，智識階級已被解除兵役的義務，即在強迫徵兵制度的國家裏面資產階級，與智識階級，也受格外的優待；農人工長勞動家與手工工人無論如何有履行當兵義務的必要，無可倖免了。但在一個實行普遍義務兵役的國家之內，智識階級就不能受例外的待遇了；因為這種制度需要他們做後備軍的指揮官幹部長官。智識階級前後一樣，總是受特殊的待遇，不過此處的特殊待遇，不是解除他們的當兵的義務，而爲允許他們在軍隊中做一年志願兵與後備軍官的特權。因此智識階級的思想與感覺，深深地染了軍國主義的色彩，並且比較社會上其餘的階級，還要厲害。因為他們在軍隊中有特殊的地

位，容易使他們對於軍隊發生趣味，另外因為以軍事為職業的軍官的媒介，亦須接受相當的影響。這班職業式的軍官，把兵役當作他們一生的使命，不是一時的過渡的現象。每次戰事，他們都表示超乎常人的魄力與果決，並且發展一種高度的軍國主義的精神，凌駕一般祇受過幾年的軍事訓練；而且被人強迫出來的將士之上。所以智識階級受軍國主義的影響多於其他的民衆。因此他們底職業活動容易使每種觀念在這點意義上，發展到急進的方面，——與極反動的思想妥協！有如實行家日常經驗中認識極小的障礙之後，就喪失了改進的勇氣。

那些已經做了後備將校，或者想做後備將校並以職業軍官為模範的智識階級，接近軍國主義的頑固思想，比較職業式的軍官，更要容易。所以智識階級中染了軍國主義色彩的份子，正是野蠻與暴行的倡導人。因為普遍義務兵役的實行，民衆也染上了他們野蠻與殘忍的習慣。就這一點關係來說。普魯士也勝過其餘各國，因為普魯士首先實行一年志願兵役與後備將校制度，而且對於後備將校，比較任何一個國家，不惜給以特殊的地位和榮譽。

無產階級的階級狀況，雖仍不顧普遍義務兵役的實施，人道主義的傾向，勝過軍國主義底反人道主義的色彩，然而在智識階級中殘暴的習慣，反壓倒了人道主義的精神。社會上各階級黨的衝突，愈趨激烈，良非偶然！

此處關於智識階級的話，現在方可應用到資本家身上去。他們底人道本能，在其階級狀況中，發現了相反的趨勢。

世界大戰勃發，歷時四年之久，歐洲各國一切健康的男子，都被徵調當兵。於是軍國主義殘暴的趨勢，達於野蠻的絕頂。就是無產階級也不能自居倒外，染上了殘忍的習慣，與着野蠻的變性回到家鄉。這班從戰綫上回到家鄉的人，對於自己的同胞，也喜歡用暴行與殘殺，貫徹自己的要求，滿足本身的利益。此即釀成內亂的原因而且輾轉趨民衆於野蠻之境。幸而還有許多成年人，一旦戰爭的影響消滅以後馬上，就可恢復和平時代的思路與感覺。最可憐的是那班青年，既無師長的指導，又無朋友的規勸，對於四年世界大戰的不良影響，他們毫無抵抗的能力；而且深深印着一種不良的印象，終其一生，竟無法使之完全消滅。

不但此也，無產階級中間，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大戰的結果一班小資產階級完全破產，受了極大的打擊，變爲無產階級了。這種份子以前是絕對不過問無產階級的階級爭鬥的，而且他們對於在社會黨領導之下的無產階級應有的訓練組織的能力與理論的認識，亦從來發生過什麼關係。

在以前的無產階級當中，發生了很大的變遷。智識界方面也如各種工人一樣，因爲戰爭

的死亡病傷之人數遠過於平時；同時又沒有注意到補充的方法，又以時間與力量的不足，不能養成一班富有學識的人材當時也沒有這種需要，從事這種基本的工作。大戰期內，單調的兵工製造，代替了複雜的和平實業。而這種兵工製造，僅需少數的模型。每個工人祇需學習幾個簡單的手術，即可應付裕如；就是技術生疏的新工人，也可敷衍下去。於是促成德國實業繁盛的技術純熟之工人的數目，在大戰期內驟形減少。而技術生疏的工人之數目反形激增了。

這些技術純熟的工人，是一班長於組織饒於訓練富於思想的工人；而技術生疏的工人，恰與之相反，則有缺乏組織頭腦簡單，品質不齊，遇事漠不關心的毛病但是這種遇事漠不關心的毛病。却在大戰期內迅速地消失了。這樣巨大的事變，與其可怕的结果，不但激發了一切人的感情，無法自遏同時因為技術純熟的與受過社會主義訓練的工人之數目，較之技術生疏而無訓練的工人之數目，與無產階級化的小資產階級之數目頓形減少，漸使那班富於學識的，以前領導無產階級運動的少數人，漸漸失却了原有的領導權，且以盲目的憤怒感情，代替理性的領導了。

因為大戰的結果，搖動了經濟的基礎，於是失業的現象，到處皆是。而物價的騰貴，與

必需品的缺乏，更容促進民衆憤怒的心理，要求激進的迅速的改革。然而改革的目標，並非創造一個較高的社會制度；不過要求立即解除他們難堪的痛苦。因爲民衆對於較高的社會制度，還未曾加以若何的考慮呢。

改革的結果，能否解除他們的痛苦，對於無產階級自然是一個迫切的需要與實際的問題。馬克司主義的思想，在工人羣衆中不容易獲得很深的基礎，除了需要豐富的經濟知識與歷史知識爲了解馬克司底主義的先決條件以外，這也是一個主要的原因。因爲羣衆的心理，是缺乏忍耐性的；往往歡迎一種方式與計劃，以爲個種方式計劃的實現，可以在任何環境之下，立即解除其痛苦；不大高興一種指示發展途經的教訓理論。若使無產階級信仰一種合理的教訓，認定工人階級的真正解放，須在這個正在辛苦發展途中的物質條件成熟之後，自然不是要工人守株待兔，一事不做，當然是要鼓舞工人作不斷的勇猛的階級爭鬥。然而對於無產階級的境況，雖然如此困難；但是在大戰以前的最後十年內，無產階級的生活狀況，已達到這樣的程度，社會的急劇改革，已非他們生死問題的焦點，至少可以說不是構成階級爭鬥與社會運動基本隊五熟練工人的生死關頭。

自從大戰以來，技術純熟的工人在政治上與經濟上的鬥爭漩渦裏，反比技能疏弱的工人

處處落後。因爲後者底困苦增遇非常急迫，使他們不能再行忍耐了。而且因爲大戰的結果，可以使他們奪取政權易如反掌。他們爲什麼還要忍耐期待咧？大戰的結果，不祇是驅使工人階級中落後的份子，加入了階級爭鬥的前綫，而且因爲軍隊的瓦解，於是在歐洲經濟落後的國家內，更使無產階級變成了城市的統治階級。而且另外還有一班目不識丁的農民羣衆，因爲本身不能形成一個獨立的政治勢力；故極力與城市的無產階級接近，俄國的情形，即是如此。天下沒有一個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後，願意自動的放棄已經到手的政權。除非是發瘋的人，才敢於要求俄羅斯匈牙利無產階級，爲了這兩個國家經濟落後文化幼稚的情形，放棄已經到手的政權。但是一個信仰馬克司主義的社會黨，應當把當時勝利的無產階級底任務體認清楚，務必求其與當時當地的物貨條件，與社會心理，適合一致；不應該毫不考慮在一個資本主義猶未發達像俄羅斯這樣的國家，立即採用生產手段完全社會化的策略。

這樣一個政黨，是否能夠永久維持民衆的信仰，自然還是一個問題。然而對於實際政治家目前統治權的維持，較之不惜冒一時失敗希望改正以前的錯處，當然是更加重要的。而且實際政治家往往不喜歡使用一種力量，因爲她明白表現超乎可能限度的政策，與其不可倖免的失敗，使他當時失却輿論的同情，與民衆的信仰。她甯願拖延失敗的局面，保全自己的理

想。

實際政治與科學政治，拉薩爾與馬克司，這個老衝突，自一九一七年革命之後，又在俄國呈現於吾人之前了。

一八六五年二月廿三日馬克司寫信給 Fugelmann，說：德國工人的發展因為一八四八年——五九年的反動，遭受許多的打擊，為的是要使他們「問這樣一個救世主——像拉薩爾——歡呼：因為他以爲工人階級祇要採用一個詭計即可升入天堂。」

這個救世主爲這種詭計，絕非馬克司的主張。在拉薩爾時代與俄國第二次大革命時代，環境對於馬克司思想的不利，原因雖各有不同，而情形則一。俄國工人階級中真正馬克司主義的信徒，不幸完全消沈了至於消沈的原因：或者爲新生的落後的羣衆所排擠壓倒，或者在思想上受了他們的麻醉。因此馬克司以前的思想，像布朗葵，槐脫靈 *Wei ling* 巴枯甯幾派的思想，現在工佔了上風。而盲目的羣衆竟反歡呼投世生之誕生了；以爲祇要使用一種詭計即可使他們得着解放所不同的一點：就是這個救世主不是拿拉薩爾與槐脫靈的名義，爲號召民衆的工具，而以馬克司主義爲其招牌。

以上所言，即係俄國革命與隣邦革命的客觀條件。這種革命，引起原始思想的復活，與

政治經濟鬥爭之粗暴方式有死恢復燃之勢又何足怪。所以我敢於武斷說一句：這種不幸的現象，將因無產階級知識的進步，與其道德的向上，遲早必有消滅之一日呢！

8. 共產黨的工作

A 充公與組織

世界大戰的結果，使工人階級的道德與智識退步，不祇是因爲戰爭使社會各階級的份子，流於殘忍，無產階級中的落伍份子，形成無產階級解放運動的急先鋒；而且增加了無產階級境况的困苦。於是社會上充滿了絕望的心理，緊張的空氣。同時因爲軍事思想的發達，在無產階級中間，更容易發生幼稚的思想；而且這種思想，又容易爲膚淺的人們所誤解；似乎世界上惟有有形的權力，乃爲決定世界歷史的基本動力。祇要我們有相當的勢力，便可爲所欲爲，實現自己的計劃。

馬克司與恩格斯時常反對這種見解。馬氏在他的名著 *Heryn Engen durings Nmmwalzu ng der Wissenschaft* 中，曾經不憚麻煩，反覆討論這個「權力問題。」「*Gwalt heorie*」所以這個理論，絕對不是馬克司的理論。就是恩格斯也曾毫不客氣反對這個理論。而恩格斯不爲今日流行的見解所囿，他敢將一個偉大的民衆運動的錯誤，明白表示出來，尤爲難能可貴。

即使這個運動，是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恩格斯也不隱諱其錯誤，或以爲如此將會減少革命的威信。

這是自然的道德，我們不能對於革命時代的各種錯誤，與不合理的舉動，加以嚴格的責備。因爲革命的時代，是歷史上最艱難困苦時代，革命的環境，是一個千變萬化不易捉摸的環境。假使批評家自己遠遠站在安全的地位，不知道革命者處境的艱苦危險，責備求全，謾罵革命者的過失；決不是一個忠實的批評家。

但是有一種過失，必須加以責備。若是這種過失，非由於大意與粗心，乃爲一個錯誤的原則的必然結果；而且這種過失，祇有從根本上消滅這個原則，才能避免。那末，假使我們對於這種過失，也不加以批評，反爲之辯護，結果一定會危及將來的革命運動，背叛革命的利益。

馬克司與恩格斯雖然具有「火山般的革命情緒」，然而並不因此放棄這樣必要的批評。一八七三年秋季，恩格斯在萊布錫「民報」，〔“Volkstaat” in Leipzig〕發表一篇論文。批評那次西班牙的暴動，即足證明。這次暴動的結果，宣佈西班牙爲共和政體，爆發於一八七三年七月十五日，雖不到十天，即告失敗。然而這次暴動的餘燄，一直到一八七四正月方才

熄絕。

從此看來，恩格斯在這次暴動尤未完全撲滅以前，已經發表了一篇很嚴厲的批評文章，認為這次的暴動，是「一件很可恥的武裝暴動，……不啻給吾人一個嚴重的警告。」

這幾句話載在「巴枯寧派的運動」叢書裏頭。一八九四年，由恩格斯在“Internationales aus den Volkstaat”這本書內從新翻印，柏林前進報——社會民主黨機關報——發行。這部叢書，對於願意研究鮑爾塞維克主義的人，有很大的價值；所以我不憚麻煩，特別介紹於讀者之前。鮑爾塞維克主義的錯誤，已有幾點在這裏爲先人所道破。因爲當日西班牙革命的情形，竟有許多地方與今日俄國的共產黨革命，完全相同。

恩格斯於此處指明西班牙國際同盟派的大多數係隸屬於巴枯寧色彩的同盟“Alianz”之後，接着說道：

「當一八七三年正月，共和政體宣佈以後，西班牙同盟派 *Alianzisten* 遇到一個極困難的情形。西班牙是一個實業落後的國家，工人階級迅速的完全的解放，根本尚無從說起。要想從促進西班牙實業的發達，心須經過幾個不同的發展過程，排除許多的困難。爲縮短這個過程，與迅速排除這些困難起見，共和政體雖然貢獻一個機會；然而惟有西班牙工人階級掌

握實際的政權之後，才能利用這個機會。」

恩格斯的意思，就是要工人階級，參加國會的選舉，與議會的活動。但是巴枯寧的主張，要求無產階級立即完全獲得解放。他們雖以議會式的德謨克拉西主義，對於無產階級的發展與成熟，是一件不可少的東西卻在西班牙當時的環境下面，又是解放無產階級的手段。所以巴枯寧派對於任何選舉，抱着深惡痛絕的態度。

但是他們又拿什麼東西代替選舉的競爭咧？以蘇維埃的組織，工人評議會為解放工人階級的手段，既為當時所不知道，於是巴枯寧派宣佈總同盟罷工，將西班牙分為無數的小地方自治團體。「Komune」因此把一個整個的革命運動，分裂成為許多的地方運動，不惜將革命之意義付諸東流。

這次暴動的送終之歌，不祇是革命運動整個的失敗，與西班牙國際同盟派全體瓦解。而且為環境所迫，旋即一個隨着一個，放棄了巴枯寧派信仰的原則。

難道今日的俄國不是如此麼？

不用說，這次革命的爆發，流行於俄國工人羣衆中的，是馬克司主義，不是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的信仰。在世界上任何國家以內，馬克司主義的信仰，沒有像在俄國那樣的普遍。

幾十年以來，俄國的社會主義者，將俄國落後的農業狀況，認為一種有利的狀況。他們的意見，以為俄國農村土地共產主義的存在，可以使社會主義的建設，易於成功。

這是俄國在阿克羅維特 Axelrad 與布列夏諾夫 Plechanoff 兩個人領導之下的馬克司主義者，不可磨滅的功績。他們由辛苦的長期奮鬥，認識了俄國社會與無產階級的幼稚狀態；指示出來在這次不可避免的革命潮流當中，無產階級雖然佔着重要的位置，但是歸根到底，仍是一次資產階級的革命。

這種與多數派相反的意見，當俄國無產階級沒有奪取政權以先，社會主義由智識階級與程度較高的工人羣衆信奉以前，尤在俄國的社會運動中，保持了應有的勝利。

但是革命的急潮，將全俄的民衆，捲入了運動的漩渦以後，因為這次運動僅僅認識了民衆的需要與意志，沒有人想到民衆所要求的事，在現實的社會環境之下，是否有實現的可能，對於社會，是否有利這個問題，遂使嚴正的馬克司主義者，逢到非常的難關。

多數派在這種情形之下，並不嚴守馬克司的教義；他們完全受羣衆心理的支配與驅使。因此他們成功了俄羅斯的統治者，本非奇事。至於將來的結果如何，當然是另一問題。

多數派僅以民衆的意志，視為革命的推動機，可以說是將馬克司主義的理論置諸腦後了

。他們以為利用馬克司學問的淵博，與其震世的大名，斷章取義，提出「無產階級的獨裁」這個口號，即可遮蓋自己背叛馬克司主義的罪惡。

革命的爆發，是戰爭的結果。因為前綫的兵士，已經疲敝不堪，不願再戰，多數派就迎合這種心理，堅決反對繼續戰爭；用盡各種手段，使軍隊解體。他們不願是否因此可以促成德意志軍閥主義的成功。若是他們這種策略，能夠使德意志軍閥主義失敗，引起德國內部的革命，方可告無罪於天下。

因為軍隊的瓦解，下層階級的民衆，忽然得着完全的自由。可是農民立即奮起，要求分配大地主的田地，作為自己的私產的事實，乃為當時不可避免的現象。可惜採用這種方式，不能充分利用大規模經營的長處。然而此處需要長久的時期，農民也實在不願意再耐忍了。多數派為求迎合農民的需要，竟不惜引起農村的無政府狀態，允許自治團體，自由將土地以原始的方式，與幼稚的技術，分配農民。所以農民也放任多數派在城市中自由活動。他們不顧客觀的環境，務求迎合工人的意志，藉以取得工人羣衆的信仰與同情。

饑餓的無產階級，感着極端的壓迫與剝削，所以迫切地要求從資本主義的枷鎖之下，立即解放出來。處這樣迫急的情形之下，自然沒有研究與考慮的時間。所以俄羅斯的資本主義

，經了幾次的猛烈的打擊之後，就已體無完膚了。

消滅資本主義的生產，代以社會主義的生產，包含兩個動力：「一」即財產所有問題，「二」即組織問題。而且必須取消一切生產手段的私有制度，以國有或地方所有或合作社所有的方式，過渡到手產手段的完全社會化；同時也須以社會化的生產組織，代替資本化的生產組織。對於整個的經濟生活，猶須以社會化的運用，代替資本化的運用。

這兩種改革當中，以財產制度的改革為最簡單。天下最容易的事，莫過於沒收資本家的財產；因為這是一個露骨的力量問題，不受任何社會條件的束縛。即實業資本未發達以前，在商業資本與利貸資本的時代；我們已可發見封建諸侯與民衆沒收商人，錢商，銀行家底財產之事實。中古時代，不祇是猶大人的財產，時被沒收；就是教堂公會的財產，也常被充公。法國腓力著六世，Philip IV 在十六世紀的初期，沒收一個富庶無比的廟堂產業，可資佐證。當近代社會主義的觀念，猶未形成以前，我們已經知道有所謂俠義的強盜，專以救世濟貧為職志；掠奪富人的財富，散與貧窮的細民。實行這種強盜時式「社會主義」，「當然是天下最簡單的事、恰與俄國無產階級的「幼稚狀態」，「適相符合。一八六九年恰恰在普法開釁與公社成立之前，巴枯寧曾發表一篇告俄國青年的書，他指示俄國青年一條出路，適與二百年前

那個俄國綠林首領拉克 Stenka Rasin 所走的路一樣。拉先曾於一三二七年，組織一種強盜團體，橫行南俄一帶二四年之久，後卒為政府所剿滅，拉先亦遇害焉。

但是組織問題，却不如充公問題這樣簡單！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是一個巧妙的有機件，惟有資本家與其代理人底頭腦，才合運用。假使我們要取消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必須創造一個相當的組織；而且運用這個組織，雖然沒有資本家的頭腦，必須比較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作為代替的組織。更加靈活；至少亦須有同樣的敏捷。這自然不像斐力普六世與拉先的行為那樣容易；此處需要許多的物質條件，與精神條件，一種發達的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一種有條理的推銷商局輸入原料的經濟組織，而且更需要一個社會意識與同胞觀念發達的無產階級，經過長期的奮鬥，與組織的訓練，得了自由的習慣，與自治的才能；最後還需這個無產階級，已有相當的知識，能夠辨別可能與不可能的界限，與區分，誰是受過科學訓練的，性質良好的，領導者；誰是無良心的無學識的煽動家。

這些先決條件，一天不存在，社會主義即無法永久有效地消滅資本主義生產制度。即在這些先決條件，已經完備的地方，與實業區域，社會主義的組織，也須經過詳細的研究，有計劃的準備；務求其與實際的環境，表裏和應。因為新組織的方式，不是可以適用於任何國

家，任何時代，任何實業區域的；尤非一個「因定的呆板的烏托邦」，或者一個「歷百世不變的理想」。可以因環境的不同，隨時變更其方式，求其以適合當時的實際需要。求其易於成功。

充公與組織爲社會化的兩個原動力，必須相輔而行，方不致在破壞舊的生產秩序以後，發生經濟的紛擾，與生產停頓的現象。斐力普六世與拉克的動機，限於沒收他人的財產；絕無意思創造一個新的經濟組織。拿這種方式，想從資本主義的生產秩序，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絕無成功的希望。

但是民衆沒有忍耐的決心；他們也不願意再忍耐了。多數派爲滿足民衆的要求起見，乃於爭取政權之後，不惜將社會主義的原動力，裂爲兩片。他們雖然明明知道這兩個原動力，必須相輔而行；但是他們仍然倒行逆施，首先做照拉克的榜樣，沒收資本家的財產，歸諸己有之後；然後才設法補救組織上的缺陷；於是本應密切結合的東西，無須各自分離了。列於一九一八四月間在他的“Die Nächsten Aufgaben der Sowjetmacht”〔蘇維埃的緊急問題〕一篇文章裏，已經很明白的指出了。他說：

「今日以前將資本家的財產掃數直接充公的工作，佔了首要的地位。從今日以後，吾人

「惟一的計劃，厥在將那些已經充公的與其餘的生產部門，創造完善的，管理與組織」。(S, 14)

「我們領導無產階級從事管理生產分配生產品的組織工作，較之沒收剝削者的財產的工作，未免相形見絀。：在這一部分，社會主義的改革大落後了！（而且是重要的部分，）我們落後的原因，因為管理與監督缺乏充分的組織。」(S, 23)

多數派冒昧地將一切工廠與實業部門加以沒收，毫不研究社會主義的組織。在這些工廠與實業部門中，是否有實施的可能。即在已經有了實施社會主義組織可能性，的生產部門，也以爲祇要將其沒收，即可毫無準備，實施社會主義的組織；又何况工人不願等待了咧。

於是結果立即表現出來了，俄國的經濟生活，立告衰退；實業界失業的工人底數目，較之農村勞動者的失業數目，頓時增加。但是這些實業大多數是最新式的大規模企業，與一八七一年巴黎所有的實業程度，迥不相同。若是談到巴黎的產業社會化的話，至多亦不過採用生產合作社的方式；然而俄國的工廠，差不多都是大規模的企業。所以在資本家消滅之後，當然立即想到產業國有的方式。

在生產合作社的經濟組織以內，工人之收入，完全受各人勞働力與其同社社員的勞働力

之限制；而收入之標準，係由運銷市場的生產品之多寡來決定。至於銷路的調劑，與原料的購買，完全由工人自己負責。在國有工廠之中，工人仍是像從前一樣領取工資，所不同的一點，從前是向資本家那裏領取；現在是由國家發給。銷路的調劑，與原料的購買，完全由國家機關處理；工人收入的標準，不依各人的生產能力決定其高低，全視工人掌握國家機關的權力，加諸國家機關的壓迫達到了若何的程度。

這裏需要一個受過訓練與知識程度甚高的工人階級，能夠明白認識社會的盛衰，個人的發達，與他們的生產能力，發生如何的因果關係，方能維持生產的秩序，照常進行。也祇有這樣的一個工人階級，才能提高生產的効率，製訂一切必需的組織條例；使工人階級消費者，與國家權力機關，在各個企業與整個生產部門之中，發生有效的影響，創造一個有效的勞働理想，代替資本主義的自私動機。

今日俄國工人階級，不祇是缺乏組織，也缺少相當的知識與訓練。因為戰爭的結果，使無產階級當中幼稚的愚昧的份子，發生一種殘忍的習慣，更把各種不利的情形，弄得大嚴重了。

俄國的工人雖然由於農村共產主義的遺傳，富有連帶責任的觀念；但是僅限於農村團體

，與自己朋友的狹小範圍。他們對於整個的社會，是十分的冷淡。在這種環境之下所造成的不幸現象，就是鮑爾塞維克自己也不滿意。杜勞斯基 Trolzki 在他的“Arbeit, Disziplin Ordnung der sozialistische Sowje republiky”【S17】一本書內說道：

『革命喚醒了社會上最受壓迫的人類之人格自覺，而且自然地給與人類覺醒的初期；一種虛浮的外表，與無政府的性質。這種人格自覺的基本本能之覺醒，有時容易流於露骨的自私心。若用一個哲學名詞來說明，就是流於“Egozen nischen”的性質。：他是傾向於佔領一切可以到手的東西，很少顧及整個階級的立場。於是個人主義的傾向，無政府的浪漫色彩，強盜式的臭味，在解體的軍隊工人羣衆，與落後的農村羣衆當中，到處可以發現。』

所以俄國的革命的份子，與巴黎公社的份子，完全不同，後者甯願限制自己的工資，以求社會主義的實現。

在這種情形之下，那些充公的工廠之生產能力，會到如何的境况，當然是很明白的了。大家儘可能的範圍，一面提高工價，一面宣佈最低限度的工作時間；且爲實行便利起見，取消了包工制度。於是引起了實業生產不可思議的現象；譬如聖彼得堡，有一個普舍洛去工廠，曾於某時期內由政府領取津貼費九千六百萬盧布，而出產品的價值總共不過一千五百萬盧

布。

於是經濟生活的破產，已爲必然之事實。祇有濫發紙幣，才能苟延殘喘若干時日。

工廠以內，工人作工的時間，卽已減少到最低的限度；於是爲保持城市清潔的必需的污穢工作，就沒有工人願意擔負了。

在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內，這種工作一天還有必要的時候，怎樣可以得到相當的保障；乃社會主義者，許久以來，焦思苦慮的問題。福祿爾 Fourier 相信這個問題的解決，可以令天性不好潔淨的人，擔任污穢的工作。他說有許多小孩好在灰塵堆裏打滾，就是社會上有一班天性不愛乾淨的人的證明。

這種滑稽的解決，當然是不適用的方法。祇有利用科學的進步，漸漸減少這些辛苦的有害健康的工作，才是合於社會主義原則的惟一方法。這個目的，一天沒有達到以前，祇有對於擔負那種工作的工人，給以特殊的利益和報酬，或者支付最高的工資，或者規定最低的工作時間。

多數派發明了一個新的解決方法。這個方法雖然不合於社會主義的原則；却是迎合工人羣衆的「羣衆心理」。他們把這種工作看作一種強迫工作，但是以前的工錢勞働者，則不受此

次規定的束縛。此外還有一種工人，在新的環境之下因為原料的缺乏，運輸的困難；或者因為燃料的缺乏，以致工廠相繼停工，失業人口數為之驟增。然而失業的工人，也無擔負這種工作的義務。

多數派則以『資產階級』是不勞而食的階級為理由，把這種強迫工作，完全放在『資產階級』的肩上。

蘇維埃共和國取消了普遍的『形式』的德謨克拉西，代以無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他們認為祇有從事生產的人，才有政治上的權利，受國家的保護，與充足的營養。而懶惰的個人，應無受法律的保障之權利。

這種思想從表面上加以觀察，完全適合社會主義的原則；可惜祇犯了一個小小的錯誤。蘇維埃共和國已經成立了七年，憲法上雖然規定了祇有工人，方有選舉及被選舉的權利；但是誰是一個工人，到如今還是一個不可捉摸的燈謎。即在共產黨內部，也有各種不同的解釋。

就其出發點來說：蘇維埃不外是大工廠以內，的工資勞動者之代表機關。這樣構成的蘇維埃，確是一種固定的界限分明的組織；對於俄國的革命，有極重大的關係。這個『蘇維埃

思想』的實際表現，就要以蘇維埃的中央機關，代替普通選舉的國會。可惜這個中央機關的基礎，太過狹隘，祇限於規模較大之工廠的工人蘇維埃。若是一旦超越這個範圍，同時又要剝奪資產階級的選舉權，必將漫然標準，無所適從。而資產階級與工人的區分標準，又毫無明確的規定；可以任意加以解釋。此即蘇維埃制度適於做獨裁政體的基礎之點。但是要創設一個確定的有系統的國家組織，就不能如此籠統含渾了。

特別是知識階級一流的人物，他們是否屬於資產階級，有無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以及是否須擔負這種強迫工作的義務，完全操之於蘇維埃機關之手，由他們任意決定。

蘇維埃共和國，不祇是無條件地奪取了資產階級的生產財消費財，不祇剝削了他們一切政治上的權利，而且強迫他們——祇有他們——擔負工作的義務。

於是資產階級形成了俄國唯一有作工義務的階級；然而一方面又以他們不作工為理由，剝削他們一切政治上法律上的權利。在蘇維埃共和國內，工人與資產階級的區別，不以現在的職務為標準，而以革命前的職務為準繩；好像資產階級是一個特殊的人種，他們的標記，是永遠不可磨滅的，有如黑奴永遠是一個黑奴，蒙古人永遠是一個蒙古人一樣。無論他們怎樣表現，怎樣服飾，即或他們已經變成了乞丐，或者完全靠作工以維持生活，資產階級永久

是一個資產階級。

資產階級有工作的義務，他們却無選擇自己所了解的性情相近的工作之自由；而被強迫做極污穢的工作。而且所得的營養品，僅等於兵士與工廠工人應得營養品四分之一，欲求一飽，而不可得。譬如兵士與工人可以得一磅麵包，他們祇得四分之一磅麵包；兵士與工人可以得十六磅馬鈴薯，他們僅可得四磅馬鈴薯。

從這些舉動看起來，我們已看不見為無產階級提高文化程度創造新的生活形式這個傾向的痕跡了。此處所見的，祇是無產階級一些幼稚的報復手段，以任意踐踏蹂躪從前起居飲食較好與受過較好教育的人們，認為自己的幸福。

B 無產階級的成熟

這是自然的，就是多數派，也不能眼巴巴地放任這種方式的『羣衆心理』的流行。他們把資產階級的財產充公，與無產階級幾個字成為神聖的名詞以後，即思設法促進無產階級的成熟，方是構成社會主義的先決條件。杜勞斯基說道：[Arbeit Disziplin S.16]

『我們早知道：我們缺乏應有的組織，必需的訓練，與相當的歷史經驗。我們一切都知道：但是絕不能阻止我們公開奪取政權的企圖，我們堅決地自信，我們行將學習一切，可以

整理一切」。

話雖如此說法，試問杜勞斯基敢於搭上一個火車頭，於開機昇火之後，確信能「學習一切整理一切」麼？吾人於此，不用懷疑，他總一天可以學到這種開火車頭的本領，然而在車開火昇之後，他還有充分學習時間麼？這個火車不會出軌或炸裂麼？我們必須於未執行開機職務之前，已有了相當的工程知識和開車本領。所以無產階級亦須於自己沒有領導生產事業以前，要指揮生產的進行，也須在能力上有相當的準備；何況生產事業，不容許有片刻停頓咧！尤其感困難的，莫如戰後的環境。因為戰爭消耗了一切儲蓄品，我們的生活，完全靠努力生產的工作，假使生產一告停頓，全民卽有凍餒之虞。

列甯自己在一九一八年三月間，已認爲有制止沒收私產的手段之必要了。

『假使我們還用從前的速度，沒收資本；我們必定會遭逢失敗的命運。任何有思想的人，當然會明白知道：我們對於無產階級的組織工作，比較直接沒收私人資本的工作，非常落後，相形見绌了。』[Die Nächsten Aufgaben der Sowjetmacht, Ausgabe Bern 1918, S. 14]

列甯並不因此而失望。他迷信蘇維埃制度可以征服資本主義的勢力，並且對於俄國無產階級的發展成熟，抱無限的樂觀。他說：

『文化的增進，教育的普及，乃是提高勞働生產率的前提；這種進步，現正以極快的速度，向前發展。幸賴蘇維埃這個組織，推行這個光明的進步，已經深入民衆的隊伍裏去了。

』[P.33]

民衆教育程度的提高，可以有兩種不同的樣式：一爲採取有系統的計劃，廣設學校。俄國對於這方面，尙有許多期待加倍努力的地方；因爲設立足以容納全國未受教育的人口之學校，需要一宗浩大的款項，與發達的生產事業。但是俄國的生產事業，今日疲敝不堪，使教育事業，蒙受極大的損害。多數派雖然努力於藝術科學的創造與推廣，亦因爲經濟能力的薄弱，受了極大的限制。從這方面看，俄國目前沒有豫期教育普及的可能；足以促進生產的發達。但事實上恰恰相反，因爲生產的發達，是普及教育的先決條件。

然而大多數成年的人，已無須再進國立學校與地方設立的學校了。生活的經驗，就是他們獲得知識的母校。德謨克拉西的社會組織，是他們最好的學校。因爲在民主的社會以內，一切事實，可以自由討論，公開報告；使民衆於無形中獲得許多有利益的知識。而且在這裏每個政黨與每種政治主義，都努力宣傳他們自己的主張，要求國民的同情和贊助；於是民衆不得不考驗各方的是非，養成一種獨力批評的能力。德謨克拉西最後還賦與階級鬥爭一種最

高的方式，因為每個政黨皆須向全體國民說話，雖然代表一定的階級利益，但為事實所迫，亦不得不承認這種利益與全體利益互相調和之點。所以近代國家的德謨克拉西，克服了村落中教堂政策的狹隘，與公會職業政策短視的毛病。而民衆的視線，亦因為參加政治的活動有了無限的擴展。

像蘇維埃這樣的做法，消滅德謨克拉西的精神，代以工人蘇維埃的獨裁，剝奪一切資產階級的政治權利，取消一切言論自由的保障，反而搖動了教育普及的基礎；使工資勞動者的特殊利益，與社會的公共利益，日趨分離了。同時工人階級，也因此在此階級爭鬥與政治爭鬥場合裏面，失却了獨立批評的能力。因為政府已經替他們考慮一切，不許工人有接近他種思想，與報告的自由。若是這種思想，與報告有稍可引起人們對於神聖的蘇維埃制度發生懷疑念頭之點，政府便不許工人接近了。

這自然又是多數派為維護真理，不得不採取的策略；藉以防止這些可憐的盲目羣衆，受資產階級新聞紙的欺騙與蒙蔽。但是在今日的俄國，我們又從何處發現強有力的輿論機關，居然會使資產階級的報紙超過鮑爾塞維克報紙的力量咧！而且多數派封鎖新聞的手段之嚴厲，不祇是封禁資產階級的報紙；就是社會主義的報紙，假使不是完全站在現存政府制度的立

場，也會被人禁止發行。

這個制度的根據，完全是由一個幼稚的觀點出發，以為世界上有一個絕對的真理；而且僅為共產黨所有。另外還有一種觀念，也有不少的影響。好似一切著作家及理論家，都是天生的欺騙者；只有共產黨，才是真理的擁護者。但在實際上，惟有那班以為到處可以發現真理的人，才是真正欺騙者幻想家呢！

其實最容易發生欺騙的地方，莫過於言論不自由的地方。在這種地方，欺騙的言論，不畏任何的監督。當統治者之地位，日趨危險，愈怕真理指摘的時候，利用欺騙的言論，蒙蔽民衆耳目的事實，即將層見疊出，有加無已。

所以取消輿論自由的政策，不但不能獎進真理的傳達；而且妨害真理的散播。

至於什麼是真理的觀念？我們必須和 *Platus* 一樣的發問，什麼叫做真理？吾人以爲世上沒有絕對的真理，僅有一種理解的進步；若是一個政黨，利用政權，把自己的觀念，視為神聖不可侵犯，強迫人家服從，或者壓迫任何其他的主張；無論如何，必將妨害人類理解的進步，與辨別真偽的能力。

多數派富有理想的領袖之動機，是純潔的；自以為多數派的主張，是絕對的真理，不必

多抱懷疑之念；惟有無恥的人，才有別的想法。但是西班牙神聖的 Inquisition，也有同樣純潔的動機；然而「文化之增進，國民知識程度的提高，」在這個政府之下，仍是一無所得。自然蘇維埃共和國的領導者，與西班牙的宗教審判官「Inquisitoren」中間，是有一種分別的：後者全不注意民衆的現實生活，與現世物質上的精神上的進步；祇斤斤於天國中靈魂的安慰。而蘇維埃的領袖們，迷信 Inquisition 的策略，以爲可以改善民衆的生活；他們完全不顧這種策略，是如何貶滴民衆的人格啊！

較高的道德觀念：與發達的國民教育，乃爲實行社會主義的兩個重要前提。而所謂最高的道德，不祇是表現發達的社會本能，同胞觀念，犧牲精神，而且要有把這些觀念，這種精神超越狹隘的範圍，擴展到全體人類的胸懷。我們在巴黎公社的無產階級中，可以發現這樣的道德觀念，和精神。但是今日鮑爾塞維克的無產階級，則缺乏此種道德觀念與精神。

多數派猶須加倍努力，創造這種道德生活，所以杜勞斯基大聲疾呼的道：

「同志們！我們的責任驅使我們。要立刻完成共產社會的道德，這是我們共產黨一切活動的中心問題。」[Anbeit, Disziplin, usw, S.21.]

唉！難道杜勞斯基的意見，以爲一種新的道德生活，可以毫不費力，祇需一夜的工夫，

就可培養成功？殊不知新的道德，祇能慢慢地發展出來；然而生產的運行，不容絲毫遷延，又將奈何！若是建設共產社會應有之道德，不在實行社會主義以前培養起來；而在沒收私產之後，才着手發達這種道德，那就未免太遲了一點。

如何才能發達這種道德咧？難道專靠傳道的辦法麼？他們似乎以為傳道的辦法，可以發生什麼相當的結果。但是一個馬克司主義者，希望以傳教的方法，獲得道德培養的結果；那末祇能證明他們走進死關，無處可通罷了！

所以一種新的道德生活，自然是不應當專靠傳教的方法，而賴維持之得法。但是怎樣才算得法呢？道德是生活與意向的結晶，從個人生活與個人意向中吸收營養的資料，決定其形式的實體。

鬥爭的無產階級之較高道德之發展，完全受兩種重力的支配：無產階級在社會上，是最貧弱的階級，他的生存，全賴同階級有親切的團結；所以服從的決心，與犧牲的勇氣，是無產階級最高的道德，應受大家的重視。而資產階級，則與此相反，他們的社會地位，完全以其所有財富之多寡為標準；至於這財富是用如何的方法榨取得來的，他們全不過問。

單靠這個聯帶責任觀念，還不是建設一個新社會的社會道德；假使這個聯帶責任觀念，

僅限於一個狹小的範圍，不惜犧牲其餘的社會利益，維持自己的特權。所以一個世襲貴族，一個官僚集團，或者一個將校團體，雖然富於聯帶責任觀念，反足以阻礙社會主義的進行。至於近代無產階級的聯帶責任觀念，所以成爲社會主義的道德之原故；因爲他發生了根本的覺悟，知道無產階級的解放，必須在人類全體得着解放以後，方能實現。

恩格司年輕的時候，根據這個事實的認識，豫期無產階級道德上最大的進步。他在「英國勞働階級狀況」一書內，說道：“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2 Aufl, S 209)

「無產階級中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成份愈多，革命時期的流血暴動，與殘酷的報復，將以同一的比例而減少。就原則上來講：共產主義，乃是超越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間的階級衝突的；祇認階級鬥爭，在歷史的意義上，對於現在有相當的價值，不認將來有存在的必要。而且共產主義終極的目的，恰是要從根本上消滅發生階級鬥爭的社會原因。所以階級間的衝突存在一天，無產階級反抗資產階級的憤怒，不但必要，而且是促進勞働運動必需的手段。因爲無產階級的鬥爭，不是工人階級片面的問題，而爲人類全體的事業；所以沒有一個真正共產黨人，對於任何個人，施以報復的手段；或者以爲資產階級在現存社會制度之下，可

以有另樣的做法。：所以英國工人階級中，接受社會主義理想的成分愈多，他們現在對於資產階級很強烈的憤怒，將以同一的程度，歸於消滅。他們反對資產階級的步驟，亦將喪失野蠻與粗暴的氣息。若在革命未爆發以前，整個無產階級完全受共產主義的薰陶，不是不可能的，革命的過程，將要減少許多無謂的痛苦，取極和平的方式。但是在事實上現已不可能了，時間已經太遲了！（恩格斯豫期一八五四年革命，就要爆發；剝後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雖也降臨了，卻不是在恩格斯所預想的英國與無產階級的革命；而在大陸的法國。）但是我敢相信在英國，不可避免的貧人與富人間，公開的直接鬥爭以前，無產階級對於社會問題，至少有了相當的認識。使共產黨因為意外事件之援助，可以永久制服革命流血慘劇，防止新 Thermidor 的復活。]

所謂新的 Thermidor 乃是推翻羅伯士比 Robespierre 與巴黎恐怖政府崩潰的那一天。恩格斯以此為殷鑑，想防止同一不幸的失敗，忠告共產黨人；勸他們制止無產階級反抗資產階級的鬥爭期內，採取野蠻與殘酷的手段，應以人類全體的利益，放在眼前。

從此看來；恩格斯心目中的共產主義，與今日俄國的鮑爾塞維克主義，完全不同。恩格斯所希望的革命，恰是俄國那些社會主義者所努力的事業；而多數派的革命，恰與恩格斯所

希望的相反。至於多數派能夠戰勝其政敵少數派的原因，因為多數派利用初期勞動運動的野蠻與粗暴氣習，作為革命的原動力。而且敢於更進一步，不惜貶滴社會主義運動的價值，以全人類的事業，視為僅是工人的事業；宣佈工資勞動者與農村貧農的獨裁政權，剝奪一切不贊成鮑爾塞維克主義的人的權利，使之流為乞丐。他們忘記了共產主義的目的是消滅階級的存在。他們反將從前的資產階級變為一個新的奴隸階級，以解放全人類的社會鬥爭，變成一種私人環循的報復，與憤怒的激發。酷待個人，嚴加拷刑，不但沒有增進無產階級的道德，反而使無產階級的道德，一落千丈。因為多數派沒有把沒收私產的事業，與創造新的社會組織的工作，密切的結合起來；更使無產階級的道德墮落了。社會的生產財立即變成消費財。於是所謂鮑爾塞維克與拉先 *Stenka Rasin* 式的強盜團體，相隔祇有一步。

「鮑爾塞維克的消費綱領，最容易為一班民衆所了解。實現這個綱領，毋須努力奮鬥，不受何種的束縛，每須履行任何義務，祇須佔有一切奪取一切，即可藏事。或者像列甯那樣驚奇的說法：『掠奪那些掠奪者。』“*Raube das Geraubte*” (D, Gawousky Die Bilanz des russischen Bolschewismus, Berlin 1919, S.39)

鮑爾塞維克，拿這樣的方法想創造或維持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的社會所必需的共產道德更

形墮落罷了。

這樣的結果，就是有理想的鮑爾塞維克黨人也爲之戰慄不已，可惜他們祇看見現象的外表，不明白發生這種現象的原因。假使他們明白這個原因，卽不啻搖動他們統治的基礎。

多數派失望之餘，極力追尋增進民衆共產道德的手段。但是這些自命爲馬克司主義的革命家，與社會改造家，竟找不出較好的口實；比舊社會企圖減輕本身所產的罪惡的種種方法：法庭，監獄，死刑，……。

列甯論及蘇維埃共和國的任務，曾在他的名著 (Die nächsten Aufgaben der Sowjetrepublik S, 47) 中說道……

『法庭是養成紀律的工具，飢餓與失業，是俄國的大不幸；但是醫治這種病症，不能靠強迫的方法；祇能以精密周到的紀律與組織，克服一切的困難。可惜這個簡單明顯的事實，至今尙沒有充分的認識。……因此在一切經濟團體，與任何事業上面，踐踏勢力的規律，對於飢餓與失業的痛苦，是要負重大責任的。——把這些負責任的人們，拘至公堂處以嚴刑，當爲世人所了解，不應加以反對。』

爲促進俄國無產階級的成熟，與增益無產階級的共產道德，力求社會主義之實現起見：

列甯主張使用嚴刑，懲罰不守勞動規律的人們。然而「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況且使用嚴刑，不但不能提高道德，反而把僅存的道德，更深一層地埋葬了。「嚴刑」是舊社會秩序必然的產物，與不可避免的罪惡；蓋善良道德之養成，有賴於生活條件之改善，乃為不移之真理。而舊社會計不出此，反而使用嚴刑，為維持舊秩序的手段，本算愚笨已極。不料社會主義的國家，為喚起無產階級良好的道德觀念起見，亦施行無情的法庭裁判制度，即無異宣布本身道德的破產。

C 狄克推多

從根本說起來，列甯並不以法庭為增進無產階級紀律化的唯一手段。他同時更進一步地，要求宣佈「工廠管理人無限制的權利與狄克推多」。(S 94)

「不論任何機器實業——此即物質生產的源泉，社會主義的基礎。——都需要無條件的嚴格的意志統一性。……但是怎樣才可以使意志統一呢？祇有多數的意志受一個單獨意志的支配之一法，這種支配，可以在理想的認識與規律上為一般參加公共工作的人，視為一種溫和的指導權，好像無數音樂師，受一個音樂隊隊長的指揮一樣。假便這種支配權沒有理想認識與規律之實施，即將形成獨裁的局面」。

我們以前假設這種認識與規律，是無產階級成熟的前提；並認定真正社會主義的建設缺乏這個前提即無從說起。列甯自己在「蘇維埃共和國的任務」一本書的開端就說：

這樣偉大的革命由大多數民衆——特別是大多數勞動羣衆——發揮其獨立的歷史創造力之下湧現出來，才可完成其歷史上的使命」。

列甯證明社會主義不是一部分民衆的事業，而爲大多數民衆的事業，僅爲勞働羣衆的特別使命，並非全是地們的使命以後，換句話說，違背自己的意志，替德謨克拉西辯護以後，又繼續說道：

「惟賴無產階級與最窮困的農民，有了充分的覺悟相當的了解力，與犧牲的勇氣，堅持的毅力之後，社會革命的勝利，才有保障」。

列甯接着呢：社會革命應以法庭與工廠管理者的狄克推多，（獨裁）爲保障其勝利的方法。

「這樣的革命亟須粉碎一切壓迫民衆剝削民衆的枷鎖，與一切根深蒂固的束縛，此爲昨天的事，但在今日爲着社會主義的前途，我們要求民衆，無條件地在統一意志之下，服從工廠管理者的指揮。」（S, 52,）

民衆昨日獲得到手的自由，今日又被剝削了，因為民衆沒有充分的覺悟，相當的了解，犧牲的勇氣，堅持的毅力。」列甯雖在第七頁裏面，反覆申述無產階級缺乏這些性質，社會主義的建設，即無實現之可能。但在同書第五二頁內列甯又要求尚未成熟的無產階級，爲實現社會主義的建設「絕對服從」獨裁的工廠管理者之指揮。於是無產階級的社會地位反比在資產主義的生產狀態之下，降低了許多。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之下，無產階級雖然要服從資本家的支配，然而尙非絕對服從！」

列甯現在不得不安慰自己與他的黨徒了，認爲這種獨裁與資本主義的工廠管理機關之獨裁，有一點大不相同的地方。前者是實現工人羣衆與被剝削者的意志之管理形式。」並且是一種喚起民衆完成創造歷史的使命的組織之實現。所以蘇維埃式的組織即屬於這一類的組織。

。] [S, 51]

禁止人家一切的批評，不能喚起民衆，完成其歷史上創造的使令，可以不言而喻。蘇維埃式的組織對此點亦毫無變更。但是在那種鐵一般的個人獨裁與民衆的「絕對服從」之下又如何能發展民衆組織的自由的獨立的活動能力咧？

必是一個由民衆選舉出來，並可由民衆召回，而且下次選舉又需民衆同情擁護的人，常

要受民衆的牽掣；假使民衆不與以同情，他即不能貫徹任何一種事業，所以他祇能設法打破選舉人的反對意見，不能強迫大家違反自己的意志，服從他的命令。否則必將歸於失敗。

所以個人獨裁，與德謨克拉西，是不能並存的東西，這個原則，也適用於蘇維埃德謨克拉西。列甯自然要申斥「這個觀察方法」是「一種最惡劣的批評」，以強烈的語調，代替他的有力之立論根據。所以他除此以外不知道別的理由和立論根據。他說：

「我們不是無政府主義者；我們承認有國家的必要。換句話說從資本主義達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還有強制的必要。」〔S. 107〕

在這一點上不用懷疑，我們是與列甯一致的：就是德謨克拉西也不是沒有強制的事實；不過祇承認多數強制少數，是合理的罷了。所以從資本主義，達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內之壓迫，即爲大多數工人，對於少數資本家的壓迫。但是這個原則，不能像列甯所說的一樣，應用於革命的第二階段，當無產階級已經粉碎他的架鎖以後，此處所謂強制，即爲任何非由多數選舉出來的人壓迫大多數工人羣衆。但是列甯對於這樣的強制，毫不加以批駁；並想以一種似是而非的論調，把大多數民衆爲實現社會主義而加於少數資本家的，並不違背德謨克拉西原則的壓迫，加以簡單的推論：認定任何一種強制行爲，祇要動機，是爲實現社會主義

，即使這種強制，是一種個人無限制的權勢，壓迫大多數民衆的行爲，也不算違反德謨克拉西的精神。

「因此蘇維埃，德謨克拉西主義，與個人獨裁的應用，絕對沒有原則上衝突。」「蘇維埃德謨克拉西主義即社會民主主義」

列甯的話或許是對的，但是需要一種證據，證明這個蘇維埃德謨克拉西主義是一種特殊的產物，祇要是在社會主義的名義之下，任何專制統治，皆可與之密接結合起來。

若是一個工廠的工人，應當絕對服從管理者之指揮命令，那麼這個管理者，就不應由工人選舉，而須有一個較高的權力機關，立於其上，而工廠評議會，亦無發言之權，於是任命工廠狄克推多的中央執行委員會，自身也變爲狄克推多了。所謂蘇維埃——即社會主義的民主主義——所謂民衆的政權，亦不過徒擁虛名，自欺欺人而已。

一個不自振作的人，終不能自拔於墮落之途。所以缺乏「充分的覺悟，相當的理解力，犧牲的勇氣，堅持的毅力」的無產階級，也難於選舉一個拯救他們的狄克推多，假使這個狄克推多，要求一種需要「充分的覺悟相當的理解力，犧牲的勇氣，堅持的毅力」的行動，他們就更難盲目地服從狄克推多的命令，滿足狄克推多的要求了。

但是這個狄克推多，又從何處獲得超越常人的知識與道德咧？而且專制統治的本身，已含有統治者腐化的危機。至於這個統治者，是一個獨夫，或是一個團體，完全可以不問，除非有超羣拔類的人物，才能保持個人的操守，不受腐化的影響；但是誰敢擔保俄羅斯的狄克推多，都是這一類的人物？所以列甯主張淘汰不良份子，補救這些不容諱言的弊病。

「我們很想向這條路走出，以慎重忍耐的態度，考檢真實的組織，選擇一羣聰慧而有幹才並且肯為社會主義獻身的人物；參加蘇維埃各種組織的艱苦工作。而且祇有這樣的人物，應當加以十倍慎重的考慮，使之能由擔任簡單的任務，進而擔任複雜的任務；取得行政機關的負責地位。我們至今還沒有學到這種方法；但是我們不久就會學到」〔S. 41, 42〕

但是列甯在此處沒有指出「我們」是代表誰個；自然不是那無知識無組織的民衆；甯可說是高級機關中央執行委員會。但是這個委員會，也還沒有學到選擇民衆工作的領導者的方法。列甯雖然希望學到這個困難的方法；但是沒有說明學到的時間。至於領導人物的選舉，至今尚無充分的準備，是全然確實的了。所以不祇是民衆尚未成熟，就是領導人物，也沒有養成。定要等待財產充公實行以後開始組織的時候，方才發現一切尚須學習；連選擇掌握全國經濟權的最高領袖的方法，也須從頭學習呵！

D 腐化

新政府內攪雜了一些什麼份子？我們且聽列甯來說：

「在人類歷史上，每一次深刻偉大的民衆運動，都有醜惡的內幕，與貪鄙的背景。——許多投機家，騙子執誇者，日伺無經驗的改革家之側，待隙而動，攫取高官厚祿，……沒有一次不發生無意識的來往奔走，無頭腦的行爲，與無益的事務。沒有一次不發生一個或少數領袖以一身兼數十要職，而終於一事無成的現象。[Lenin, die, nachsten Aufgaben S.40]

任何偉大的民衆，都要發生不幸的現象；是用不着疑惑的了。我們在德國也可發現同樣的事實。但是俄羅斯蘇維埃政府還有幾點特殊的地方。

任何一處的改造家，都沒有像俄國改革家那樣缺乏經驗。此乃不可避免的現象，因爲在專制的國家以內，任何進步的份子，都沒有參加國家行政或地方團體與較大的組織活動之可能。於是急進的革命家之興趣集中於祕密結社，與攻擊警察這兩點上面。所以他們得着政權以後，缺乏行政的經驗，是不能怪他們的，但是這種無經驗的事實，在另一方面給與一個有力的證據，證明革命爆發時代的俄國，是怎樣不適宜於社會主義的實現。而且這般居於領導地位的「改革家」，愈無經驗要想靠那班缺乏知識與訓練的民衆，實施社會主義的建設，又將

怎樣失望！所以德謨克拉西的民衆教育，與其領袖的養成，是實行社會主義的前提，我們不能夢想由極端專制的國家轉瞬之間即可樹立社會主義的社會。

但是蘇維埃政府與以往偉大的民衆運動不同的一點：就是蘇維埃限制言論上的自由消滅了監視『投機份子，騙子執誇者……』的極好手段。於是這些份子毋須有識方面的指摘和批評；他們所周旋的人物，盡是些無知識的工人兵士，以及新進而無經驗的『改革家。』因是這類投機份子，騙子，就愈聚愈多了。鮑爾塞維克的領袖們，此時要着手學習辨別真正富於犧牲的組織家與流氓地痞的方法了。但是他們在未學到這種方法許久以前，以俄國工人階級的幼稚狀態全國生產事業幾有全部停頓之虞。依鮑爾塞維克的領袖們之主張，以爲祇有施行管理者之狄克推多可以挽救經濟的危機。於是手忙脚亂付與他們——指工廠管理者——無限的權利，全無選擇的閉眼。而且狄克推多制度本來含有很大的危險！到了現在當然要發生惡劣的影響了。鮑爾塞維克事事不加考慮，以致一錯再錯，無法收拾。他們在任命一批狄克推多之後，然後才開始學習選擇狄克推多的方法，也如在私產充公之後，才着手組織的工作，同樣地犯了莫大的錯誤。

社會主義的實現，若祇以人類的意志爲出發點，不以客觀的環境爲支持點，這種顛倒是

無法避免的了。這般流氓蘇維埃政府的危險，不祇是因爲這班虛浮誇大的流氓之混入，不但受蘇維埃政府的制裁，而且他們一旦政權在手，任何對於他們的批評，概不可能。尤其使蘇維埃陷於窘迫的境遇的事，莫過驅逐知識階級中的優秀份子於政府之外。

沒有知識階級的合作，在今日的生產狀態之下，社會主義的實現，決不可能。社會主義一天尙在宣傳的時期，欲使無產階級明瞭自己的社會地位，與其偉大的歷史使命，社會主義就一天需要知識階級——不管他是資產階級出身的學者或是無產階級出身的學問家——從事於理論方面的研究工夫與普遍宣傳的工作。但是在這方面不在量之多寡，而在質之善惡。

現在完全不同了。我們今日已達到社會主義的實行時代了。社會主義的生產制與無產階級的國家，也如資本主義的生產制，與資產階級的國家一樣，需要一大批受過科學教育的人之援助；否則絕不能維持其生存。若是缺乏這種力量之援助，或反對這種力量社會主義即永無實現之希望。

從事社會主義的實際建設，雖然不如宣傳社會主義的理論，需要那種獻身人類解放大業的熱情。但至少要有他們當中的一大部份人確信社會主義生產制度的可能，與其長處；自願援助社會主義的建設。並明瞭社會主義的社會不會使他們的知識遭受任何的損失。姑就手工

業方面較精緻的生產來說，已經不能容忍強制工作的實施；至於精神方面的工作，更不能容忍發生強制的事實了。

所以祛除知識階級，對於社會實現性的懷疑，與夫他們獲得必需的權力以後，鼓舞他們獻身社會主義的決心，可以說是實施社會生產制的前提，促進社會進化，使之適於社會主義之建設的先決條件。這種前提與先決條件，實現社會主義的其他條件具備之後，更容易完成。因為客觀環境的認識，可以使胸無成見的知識階級，確信社會主義有實現之可能。

鮑爾塞維克，自始就不認知識界的重要，他們祇知利用兵士農民與城市小工匠盲目的衝動。

俄國知識階級自始即站在反對鮑爾塞維克的方面；即信仰社會主義的知識份子，也抱同樣的反對態度。因為他們認識了俄國尚沒有達到可以立即實現產業社會化的成熟時期，至於一班素來不問政治的知識階級，因為不堪鮑爾塞維克的酷待，又逃散四方，無家可歸，他們不但被工人趕出工廠門外，政治上的權利亦被人剝奪殆盡了。所謂工廠評議會，在實際上祇有工人才有選舉的權利知識階級所有的一切俱被沒收了。任何文化生活的可能性，都被剝奪了。有時且被罰做強制的工作，變為路上之餓殍了。

鮑爾塞維克起首以爲沒有知識階級與專門家，可以成功。俄國沙皇 [Zarismus] 從前也是如此想法；以爲軍官萬能不需特殊的專門的教育，可以擔任國家各種的職務蘇維埃共和國在這一點完全承收沙皇的意見；所不同的，不過拿無產階級代替軍官罷了。鮑爾塞維克的理論家將「社會階級」叫做「社會主義由科學到實際行動的發展。」“Die Entwicklung des Sozialismus von der Wissenschaft zur Tat” 其實不如叫做「社會主義由科學到外行」[非專家之意]的發展。]“Die Entwicklung des Sozialismus vor dem wissenschaftlichen Dilettantismus”

蘇維埃共和國的通例，一切祇靠意志的引導，毫不考察社會實際的環境如何，好像一個小孩墮入井中之後，才設法認識什麼是必需的辦法，掩沒這個水井。到了此時蘇維埃才開始吸收知識階級的力量；不祇付以強制的工作。在政府任職的知識階級，已不復被人認爲資產階級而受無禮的酷待了。他們的社會地位已經昇到「勞動」階級的地位，受法律的保障，領受充分的收入了。因爲他們也做「生產」與「有益」的工作了。

但是這班知識階級，擔任政府的職務，不是由於主義的確信；大部分還是由於貧苦與酷待的恐懼心理所鞭策。他們的工作在實際上自然不是「生產」和「有益」的工作。

杜勞斯基對於此點曾在「工作紀律……」一篇演說詞理表示十分的憂愁。他說：

『我們反對知識階級的第一個鬥爭時期，以嚴厲的才腕，毀滅他們的組織，完全是對的，而且是必要的。』

但是在蘇維埃的政權已達到鞏固時代之今日，我們目前的奮鬥，應當改換方向；將昨日的怠工者，變為新興政府需要的工程家與辦事員……』[S,13]

從此看來，杜勞斯基以為把知識階級變為社會的領導人與服務員是『必要而且對的途徑』；雖然主張先須毀滅知識階級的組織。

至於影響如何，且看杜勞斯基自己怎樣說法：

『我們已把老的 Sabotage [怠工之意] 鎮壓下去了，用鐵掃帚把舊的官僚掃除乾淨了。然而這些舊官僚的代理人，並不是時常是很好的頭等材料。政府各機關差不多都是如此：一方面我們黨裏的同志，佔據許多騰空的位置他們曾經做過許多秘密的工作，受過革命的訓練，可以說是些很好的份子，公而忘私的奮鬥者。但在另一方面却混進了許多蠅營苟且的東西，圖滑險惡的陰謀家，與那些在昨天猶無職業的生活落伍者。當事實證明有新政府於須臾之間，引用無數萬新的優秀工作人員的必要的時候，我們用不着詫異，為什麼會有許多掠奪者混入新政府的毛孔。』

我們還須聲明的：就是許多在各種行政機關與公共團體裏工作的黨中同志，也表示其無組織創造的能力。我們祇要是細心觀察在中央各部任職的同志，猶其是十月出身的鮑爾塞維克，雖然在那裏每天僅作四點到五點鐘的工作；也不很願意在這個嚴重的局勢之下努力工作，他們不知道在這樣的嚴重的時代，要求革命家做辛苦工作，不是由於恐懼心的鞭策，乃由於良心的驅使。』〔S,18,19,〕

這是蘇維埃政府對付知識階級前後互相矛盾的政策之『必然』結論；而且還不能因此就說是『對』的結論。不以信仰獲取知識階級的同情，而以暴力強取知識階級的援助，終是無濟於事的。

所以蘇維埃政府為增高工作的效率起見；又另外採取一種政策。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將政府官吏的薪俸減低許多，規定最高的年俸為六千佛郎。蘇維埃政府也想同樣做法，但是此路不通，仍須回過頭來。列甯論及此事說道：

『我們現在必須採用舊的資產階級的方法對於最好的專門人材，給以最高的『酬勞金……』這樣的方法明白的是一種妥協退讓的政策，違犯了巴黎公社與無產階級革命的原則……這樣的政策，明明白白表的不祇是進攻資本主義的攻勢之停頓，——有一定的範圍與一定的制

度——而且是我們的社會主義的蘇維埃向後退一步的表徵』[Die Nachrichten Aunbgalen dlr Sojwe
bracht? S.19]

根據列甯的意思以為捨此以外，別無出路。在這一點上列甯的話是對的。

至於高類薪俸，爲什麼『必要？』可以有兩個理由：

工廠愈大，工人就愈多；於是他們的生產的剩餘價值就愈大。例如一個工人每日生產五馬克〔德國貨幣名，每馬克約值中國大洋四角〕的剩餘價值，一百工人的工廠，每日即可生產五千馬克的剩餘價值。工廠的範圍愈大，組織與管理，就愈加困難，所以適當擔任管理的人材，就愈稀少；但是工廠所有主用以收買這種有恰當能力的人的財富也就愈大。因此工廠管理者的俸金，亦以工廠發達之程度爲比例而增加；有時竟可達到極大的數目。這種情形，政府方面也須加以顧慮，假使政府不把各級官吏的年俸，相當提高，社會上稍爲有用的人材，必被私人實業機關搜羅殆盡；行政機關，必會發生精神貧弱的病症。此即國家企業時常不能與私人企業爲平行的競爭，許多理由之一呢。

若是公社仍繼續存在，大規模的企業，漸向資本主義的途徑發展，——這是當時可能的事——公社是否能維持最高年俸六千佛郎的規定，還是問題。四月二號頒布的關於此事的佈告，

證明當時巴黎的實業，猶爲小資產的色彩所籠罩，至少也足證明公社人員大公無私的操守。但是在蘇維埃共和國內發達的大私人企業，完全不能提高頭等專家的薪俸；因爲這些企業，不是被人沒收，被人損害，不能給與私人以若干剩餘價值了。所以規定高額的年俸，在蘇維埃共和國，祇有一個目的。目的爲何？卽要籠絡一班有能力的知識階級，爲蘇維埃政府服務，引起他們對於新政府的興趣。因爲要使知識階級信服新政府的方法，沒有發生影響；飢寒的壓迫，也不能增加知識階級工作的效率。於是祇有用金錢收買這條路可通；爲他們恢復資本主義社會的生存條件。

我們現在可以發現蘇維埃共和國精選一些什麼份子，管理社會主義的生產事業：一方面有少數年老的革命家，心地光明的戰士在內，可惜他們在實際的事務方面，都是『缺乏經驗的改革家。』另一方面有許多知識份子，密佈心理所驅策；或者爲最高額俸金所收買。這些人都是杜勞司基所說的非頭等貨色。他們也許瞭解一些東西，但不是屬於品性很好的人物。至於品性純良事務經驗豐富的人物，又被他們視爲反動派而驅逐了。

共產革命的第二年。多數派爲挽救社會的危機，已將狄克推多的懼力落到這種份子的手上了。而工人階級則應毫無抵抗低頭降首於這種獨裁勢力之前。從根本上說起來，就是一

個品性最好的人，尚手握這樣無限的權力也容易發生腐化的危險；何況他們所信托的人，根本就是腐化的份子！

此時又因爲大眾的窮困，與普遍的財產沒收，遂由他們的手中，聚集了一個新資本主義的基礎。新的商品生產，日趨擴大；而且一定擴大，因爲私人經營的農業經濟，還是一種商品生產制度，可以支配全部的生活；所以農村經濟，愈少剩餘的生產品。蘇維埃共和國起始將鄉村的全部權力，付與一班既無寸土，又不能生產剩餘糧食品的貧農。而富農生產的剩餘糧食品，國家則不給以任何代價，強其交出，儲藏於國家設立的糧食儲藏所。這樣的辦法，祇可實行一次。在第二年富農鑑於政府沒收剩餘糧食品的事實，他們乃不願他生產超過自己消費量的糧食品了。於是農村經濟的發展，受了極大的限制；縱使有少數農民尚有剩餘的糧食品，不是秘密儲藏起來，也就祕密賣給偷運的商家了。

不幸同時實業也停滯了。國家支出上的虧空，僅有靠濫發紙幣以資彌補之一法。於是匯兌投機家，奸商與偷運漏稅的商人，一如法國大革命時代的情形，與夫德國最近幾年來的情形一樣，而最高形式的資本主義所發展的生產效率，爲民衆創造的較好生活的物質基礎，已被蘇維埃過早摧殘代之以低級的寄生社會形式了。蘇維埃政府自然也想如法國的恐怖時代一

樣，以殺戮奸商鎗斃投機家偷運，藉以鎮壓不幸的現象。不過那時以斷頭機為殺人之刑具，現在以鎗斃為時髦品罷了。此中惟一的結果今日之俄國，還是和一七九三之法國一樣騙人的資本之利息保證金，繼續提高這個新式的狄克推多授受的賄賂金之數目以同一的比例而加大。假使一個不小的人，被他們拿獲了的話。此即積聚財產的新基礎！

誰要了解俄國政治界賄賂公行的內幕；最好參看 Gawronsky 所著的『俄羅斯鮑爾塞維克功罪比較表 [Bilanz der Russischen Bolschewismus]』從五六頁起內面有幾章完全是紀載賄賂公行的事實。

工人既須「無抵抗地」服從新式的「狄克推多」，然則又如何統御這些新式的狄克推多咧？蘇維埃政府也祇知道運用法庭與警察的組織。無產階級的狄克推多，既為牠的「組織者」的狄克推多所制服；所以「組織者」的狄克推多，旋又為赤卡 [Tscheka] 的狄克推多所壓倒了。

革命裁判所與特別委員會——狄卡——之滿佈全國，密如珠網蓋欲藉以壓鎮反革命派的活動，取締投機事業糾正官署的錯誤。這個委員會有權任意裁判被人告發的人，可以任意鎗斃不合己意的人，與拿獲投機奸商以及暗援奸商的蘇維埃官吏。總而言之，多數派利用「反革命」這個總名義，屠戮驅逐一切的反動派，完全不問反動派的動機如何，手段如何，與夫目的如

何。

但是不幸就是這種方法，也無用處。這個特別委員會，雖然是挽救革命危機的最後之一點希望。可惜也同樣腐敗不堪。這種悲痛的經驗，在鮑爾塞維克的真誠之士，也為之戰慄歎息不已。Gawrynsky 引證[S,61]「特別委員會的週刊」一段沈痛的言詞如下：

「我們從各方面得着許多消息與報告，據稱有人在各省委員會猶其在各縣委員會之中，不祇是潛入了許多人格卑污的份子，而且直接地潛入許多犯罪的敗類。

Gawrynsky 寫信告訴西門 Simanau 明白指出這種「潛入」不祇是人格卑鄙的份子之企圖；而且時常達到「潛入」的目的。我們且看革命共產主義的中央機關報「工作意志」(Arbeitswille)一九一八年十月十號發表的一篇論文：

「一切回憶之中另外還有許多不幸的情形俄國地方蘇維埃被特別委員會徹頭徹尾地蹂躪得不堪了。於是產生一種自然淘汰的現象，各地蘇維埃尚保存一些較好的份子，而特別委員會，幾為流氓集中之所，到處幹殺人放火的勾當。

所以依鮑爾塞維克的方法，為實現社會主義改造人類的綱領，最後的結果，不外少數真誠的革命家捲入無知的腐化斯濼瀟中在失望的洶潮裏面，慘遭失敗的命運罷了。

Ⅱ 鮑爾塞維克的變化

許多西歐的革命家，常以驕矜的態度誇示鮑爾塞維克的勝利，讚揚鮑爾塞維克的勇氣，能維持其政權至如此之久，且有牢不可破之勢。然而仍有許多批評家，猶在他們握得政權的初期早已預料其必敗了。

在事實上，假使鮑爾塞維克，堅持原來的綱領，毫不讓步，鮑爾塞維克的崩潰或者早已降臨了。多數派所以能夠繼續存在的理由，全賴放棄自己的綱領，力謀妥協，不惜與原來的目的完全相反。

他們為取得政權計，把德謨克拉西的原則，拋棄得乾乾淨淨。又為保存既得的政權計，把社會主義的原則，隨德謨克拉西之後，化為烏有了。他們雖然維持了個人的勝利，却犧牲了主義的立場，變為純粹的機會主義者了。鮑爾塞維克雖然在俄國佔了勝利，但是社會主義確在那裏遭逢一次大的失敗了。

我們祇要看那在鮑爾塞維克統治之下發展出來的——應用鮑爾塞維克的方法必須發展出來的——社會形式，就會明白。所以我們不憚麻煩，將上面申說的理由，重復地略說一遍。

在今日鮑爾塞維克統治之下的俄國，我們可以發見一個以私有財產與商品生產為基礎的

農民階級，這些農民一生渡其孤陋的生活，與城市的實業，完全缺乏有機的聯絡。因為城市的實業不能生產剩餘的商品，供給農村的需要；所以農村的生產品供給城市的需要之事實，也為之停滯了。而且多數派救濟城市糧食缺乏的辦法：一方面以暴力掠奪農民的生產品，他方面以非正式的偷運方法，將城市以前聚積下來的剩餘實業品，與農民暗中交換。而且今日俄國的農民，又須將其生產品之一部分，作為租稅繳納於國家官吏之手了。

鮑爾塞維克沒收大地主的田地，將其分配與農民以後，再也沒有什麼貢獻農民了。於是前此愛戴鮑爾塞維克的心理一變而為懷恨的心理。他們懷恨城市中懶怠的工人，不能供給農村所需要的生產品；嫉視抽稅僱糧的政府，與在鄉村橫行暴斂的兵士；他們尤其輕視城市中重利剝盤的好商，以及各種欺騙的交換手段，暗中掠奪農民的剩餘生產品。

伴此純粹的小資產階級的農村經濟現象而生的，在城市中則產生一個自願社會化的社會，自願消滅階級的差別，着手打倒上層階級的工作；但是結果却樹立了一個新式的階級。所以俄國的社會，現在含有三個不同的階級。

最下層階級，係由從前的紳士階級，資本家，小商人，知識份子，所構成。他們在政治上的權力全被剝削，一切生產財與消費財，全被掠劫；有時被人強迫做一種令人厭惡的工作

作；而所得的生活品，不足一飽時時有餓餒之虞。這種黑暗的地獄，不啻資本主義制度下所產生的人間地獄。至於這個地獄的樹立，我們可以說是鮑爾塞維克空前絕後的暴烈行為，爲人類謀解放的第一個步驟。

在這個最下層階級之上，又湧現一個以工廠工人爲中心的中等階級。這個階級在政治上特殊的權利。照憲法的規定：惟有他們有選舉權與言論自由權與結社自由權。他們可以由選擇自己的職業，處理自己的工作，可以得着充足的報酬。因爲俄國的實業，受了俄國工人程度幼稚的惡劣影響，日陷於停止的苦境，而工人的言論自由權，結社自由權，旋即被人取消了。

在一切的無產階級的社團以內，不論爲蘇維埃也好，工會與合作社也好，工人毫無行動之自由，完全在共產黨的恐怖與官僚政治之下，度其可憐的生活。蘇維埃爲挽救其危機起見，必須創造一個駕乎工人階級以上的新官僚階級。蘇維埃的政治在事實上全在這個階級的掌握當中。所謂工人的自由，全是表面上的文章。工人階級自然有相當的反抗，尤其是在實業衰落與運輸停滯，城市與鄉村互相隔絕的時候！工人階級雖有較高的工價因爲糧食缺乏的關係，工人的生活境况，愈趨愈下，當然更容易激起工人階級劇烈的反抗。

於是工人階級，對於鮑爾塞維克的同情心，不似以前那樣熱烈了。但是這種反對政府的勢力，和一個有組織的知識程度較高的官僚階級比較起來，自然是散漫無紀，知識不足與之對抗了。

於是這個由工廠評議會的獨裁制度之下發展出來的統治階級就形成了。城市三階級中的最高階級而構成的份子，一部份是由工廠評議會出身的人物，一部份乃是由工廠評議會任命的，或由評議會特許的新式官僚。

於是如秦始皇的專制政體又復活了！就吾人所知蘇維埃雖然帶着新的面具，然而仍然是煥蕩不換藥。他們從這種專制政體當中，由於直接犯罪的實驗，反而形成了新式資本主義的胎芽，而其影響，遠在舊式的資本主義以下。

惟有陳舊的封建大地主不能復活了；因為俄國的情形，對於稍滅大地主這一點，算是成熟了。對於資本主義的剷除尚未達到成熟的時期。所以後者又有死灰復燃之勢，而加於之於無產階級的痛苦和壓迫，比之資本主義的形式，還要厲害百倍。於是私人資本主義，遂採取秘密貿易，與金融投機的方式，代替她的最高的實業的方式。而實業資本主義，由私人資本主義變而為國家資本主義在今日以前，國家官吏對於私人資本主義，有時抱批評的態度，有時

且抱敵對的態度。工人階級還可周旋於兩者之間，有時反對這個，有時反對那個，取得應有權利。但是今日國家官吏，與資本主義的官僚，已融為一爐，合為一體，壓迫無產階級了。此即鮑爾塞維克偉大的社會改造工作的最後結果，也可以說是俄國以往所有的專制君主中，最暴虐無道的暴君。而工廠評議會的專制統治，代替了德謨克拉西的精神；現在卻變成了新官僚的獨裁，且使德謨克拉西幾個字，就是對於工人也變成了紙上具文。在經濟上，工人階級反而同時做了新官僚的附屬品，超過了他們以前所能忍受的範圍。

工人階級自由的喪失，並沒有提高其生活程度，以為抵償。這個新的經濟狄克推多的效用，雖然比較從前經濟上的無政府狀態，略為好了一點，想把這個無政府狀態迅速告一結束。但是這個經濟上的狄克推多，祇把這個「終局」，遷延了許久，並沒有力求將這種經濟上的無政府狀態早告結束，因為這些「新式官僚，經營生產事業，也不大十分經濟呢！

這個新組織的效用，是怎樣的不滿人意，我們最好拿人民交通委員克拉先「Knaštin」氏於一九一九年之初由「Pravda」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機關報「上發表的佈告作為證明。

「1.管理鐵道的現成制度，與五年世界大戰的影響所遺留的客觀上之困難，已使全國交通陷入敗壞不堪的地步。而全國交通完全停滯的狀態，將隨之而來。

2, 這種腐敗的情形，不能完全歸咎於組織的形式與管理的方法，以及辦事人員的溺職。而管理的方式與行政的組織，時常變動，搖惑不定，也須擔負大部分的責任。

3, 我們目前的要務是——恢復鐵路運輸的效率，至少要能滿足實業上燃料與原料的需要。——這個任務祇有靠努力擴大鐵路的效率，方能完成。

4, 這個工作必須馬下完成，不許有一時一刻的因循。否則革命所成就的事業，行將化為烏有。

5, 我們要實現個人管理與絕對責任的原則，替代委員會的管理。因為這個委員會，在實際是一個不負責任的管理機關。——一切辦事人員，不分大小，必須精確無誤遵照我所頒佈的一切文告辦理。任何改良的提議，都須停止；須儘可能範圍以內，恢復原狀，將所有各段各站的舊式機器工具，儘量恢復，努力維持原狀。

6, 實施協定工價，是一件必要的事情。」

克拉先在蘇維埃政府的人物當中，以富於組織的天才著名。經驗學識兩俱豐富俄國的鐵道工人，是俄國工人階級的精華，帝政時代，他們已經形成了一個很好的組織時常表示過很大的智慧；然而革命後的交通狀況，還是如此！

這個佈告，明白地表示出來俄國在革命後的飢荒，與貧困。不能完全歸咎於世界大戰的影響，像普通一般說的一樣，世界大戰的結果，不過加重了飢荒與貧困的程度罷了。使「革命所成就的一切事業化爲烏有，」還是因爲社會環境的幼稚。爲補救革命的危機起見，「取消一切改良的計劃，力求恢復舊觀，努力恢復原有的器具。」似乎是當時急迫的需要。從此看來，爲護衛革命的人物，竟不惜拋棄制度的革命！

這個佈告自然也如以往的佈告一樣，不能變化這些執行事務的人之氣質。

這個新的「共產主義」也如資本主義一樣，造成了埋葬自己的墳墓，然而資本主義，不祇爲自己掘成一個墳墓；他還產生了龐大的物質生產力；容許掘墳墓的人更代死亡者的地位，得着新的較高的生活形式。而共產主義在俄國今日的客觀條件之下，祇能阻滯生產力的發達，他的掘墳墓的人不但不能達到新的較高的生活形式，反而須從新再渡野蠻的生活。

一個這樣的政府，既使他有強大的威力與盲目服從的軍隊，也是暫時的現象。不夠永久維持。鮑爾塞維克雖然創造了這種力量，也就恰恰在這一點上面，散播了原則方面失敗的種子。

鮑爾塞維克的出發點，是要把這副「固定的國家機器」和其軍事工具與官僚工具擊個粉

碎。但是在他們完成這件工作以後，他們爲維持本身的利益起見，又感覺有從新創造這樣一副機器的必要了。鮑爾塞維克以代言者之資格，主張由兵士代表大會解散軍隊，任免軍官，並決定是否服從其命令而獲得政府權。所以兵士代表大會與工人代表大會，是鮑爾塞維克的兵士政策，高揭一切權力應屬於這個代表大會的旗幟。

但是不久，就變卦了。鮑爾塞維克一旦遇到有力的抵抗，即需要一種勇於作戰爲服從命令的軍隊；不需要一種各自奔潰與各自爲戰的部隊了。

在革命起始的時候，兵士的奮發與熱忱，也許可以替代僵屍式的服從。但是當工人的熱忱開始消沈，志願入軍的人，日漸減少而各種部隊開始崩潰的時候，又將怎樣辦法咧？在實業界裏，一個德謨克拉西化的工廠，已需有相當的物質條件與精神條件，在軍隊裏，假使不是一些烏合之衆，要發展成功一個勇於作戰軍隊。那末照軍隊的本質來說，德謨克拉西，卽爲不可能。因爲戰爭時常是埋葬德謨克拉西的墳墓，時間較長的內亂，更是如此。鮑爾塞維克主義的結果，必定生出內亂，所以兵士代表大會，旋被解散，至於工人代表大會，也被鮑爾塞維克的狄克推多，弄成了表面文章；藉以增加新選舉的困難停止反對派的活動。

兵士代表大會一切重要的機能，與選舉軍官的權力，同樣地被鮑爾塞維克剝奪了。於是

任免軍官的權力，仍和帝政時代一樣由政府執行。因為志願兵不敷分配，鮑爾塞維克乃更進一步，恢復革命前的舊制，實行強迫徵兵制度；引起了人民無政府間的衝突。許多次數的農民暴動，即以此為導火線，而這種暴動，又使政府有擴張兵額的必要，於是軍隊譁變的事實，幾為每日必聞的消息；大批逃亡兵士的鎗斃，就成為懲戒逃兵惟一的方法了。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巴黎「人道」報「Humanité」登載一個同情鮑爾塞維克主義的消息，標題為「Les Princes Communistes et leur Application」據言係一個在俄國親眼看見的人的觀察之結果。末尾有下面一段話：

「俄國的赤軍，是協約國的工具。鮑爾塞維克政府曾三番兩次，宣布反軍國主義的主張。而酷愛和平的俄國人民，今日之厭惡戰爭，亦如昨日與任何時代之厭惡戰爭一樣。以強硬的態度，反對強迫徵兵制度的實行。在赤軍中，兵士逃亡的事實之層見疊出亦東亞於從前俄皇「沙」的軍隊。有時且因兵士逃亡的數目太多，使一個聯隊無法補充規定的兵額，亦為數見不鮮的事實」。

這就赤軍一種稱為特殊一點的風氣，足以表示人們對於鮑爾塞維克主義的興奮和熱忱！

假使我們就事論事，不作辯護的言辭。立即可以發現在軍事方面，鮑爾塞維克也恢復帝

政時代的舊觀了，不過更壞一點罷了。但是新式軍國主義，雖然宣布了反軍國主義的原則，却發展成功了比較舊式軍國主義更大的威力。又演一次法國大革命的故事，與拿破崙帝國準備了軍事的基礎。

然而列甯終非俄羅斯的拿破崙。而哥爾西王室(Dovysichw Tnapate)之所以能獲得法蘭西人民之愛戴者，因為他有能力使法國的國徽飄揚全歐，使法國一部分人民得着滿足認為侵略全歐是革命的原則。或者可以使另一種人得着更快意的滿足，以法國的軍隊掠劫全歐的財富，為法國致富的途徑。

俄國在防禦方面，可說是強而有力。俄國因為交通的不便，固然阻止外寇的侵入，但是同時却又阻止了本國的軍隊，有超過邊境戰勝敵國的能力。列甯未始不想把世界革命的旗幟，遍插於全歐領土之上，卒因為交通不便的關係，必須放棄這種企圖。鮑爾塞維克的革命的軍國主義，不但不能使俄國致富，而且為俄國增加貧困的一個新的源泉。今日俄國的實業已經整理的部分，也係用於兵工製造方面，並非從事生產的工作。俄國的共產主義，就任何方面來觀察，在事實上簡直變成了軍管式的社會主義了。[Kashin Kozabsmus]

因此鮑爾塞維克在經濟上的與在道德上的失敗，乃為不可避免之趨勢。惟有一次軍事上

的失敗，才可以掩護經濟上與道德上的失敗。

世界革命的成功，與任何外方面的援助，決不能阻止鮑爾塞維克經濟上的危險。所以歐洲社會主義，對於共產主義的任務，是另一種的任務。就是歐預防鮑爾塞維克道德上的損害，變為社會主義一般的損失。尤須嚴格區分鮑爾塞維克的策略與馬克司的策略不同之點，使民衆了解這種區別。許多急進社會黨的報紙，好似鮑爾塞維克與社會主義混為一談；他們相信蘇維埃共和國，是建立於工人獨裁與社會主義名義之下，在實際上表裏一致的，若以之向民衆宣傳，即為保障社會革命的勝利，可以說犯了莫大的錯誤而不自知。

F 恐怖

這裏描寫的事實，自然不是出於鮑爾塞維克的本意，而且恰與鮑爾塞維克的原意相反。他們曾經用些各種方法制止這類事實的發生，不過他們所用的方法，還是鮑爾塞維克的方法，不惜採用暴力，推行少數狄克推多的獨裁，不許人發生絲毫的懷疑，與合理的批評。所以恐怖政治是鮑爾塞維克的策略，必不可避免的結果。制止這個必然的現象的發生，可以說是有一種根本沒有希望的企圖。

恐怖主義，是鮑爾塞維克所表現的許多現象中最顯著的一種現象，以限制一切言論上的

自由首開其端，旋以鎗斃大批公開仇視鮑爾塞維克的人殿其尾。大凡歷史上一個廣大的羣衆運動，假使我們談到責任問題，祇能說這是他們可憐的命運，絕非他們罪過。從根本上說起來，也祇能說是一種個人的罪過。誰要討論這個責任問題，儘可考察個人違背道德的地方，正如意志這件東西，嚴格一點說法，也常是個人的問題一樣。一個民族一個階級與一羣民衆，在事實上沒有什麼意志可言。因為他們缺乏這種機能，當然也無從說起犯罪。一個組織與一羣民衆可以一致地行動，然而行動的動機，儘可各不相同。但是道德上的責任問題，最後的決定，全是一個動機的問題。

鮑爾塞維克的動機，是很純潔的絲毫不容懷疑。卽在他們握得政權之初，也曾充分表示過無產階級的人道精神。他們首先頒佈的佈告，就是宣佈廢止死刑。若是我們真要討論他們的罪過，可以說恰恰在這個佈告頒發的時期發生。鮑爾塞維克爲鞏固自己的政權，竟不惜拋棄德謨克拉西的原則，背叛幾十年來自己努力辯護的歷史「唯物主義。」若更進一步來說，他們最大的罪過，乃在他們不應和一八七三年西班牙的巴枯寧派一致不顧俄國經濟社會落後的情形，立即宣佈「工人階級迅速的完全的解放。」並且爲求達到這個目的，德謨克拉西在此處「不行」乃在無產階級獨裁的名義之下，建設共產黨的獨裁。

此處或許可以發現他們的罪過，他們既已選擇這條路徑，即無法避免恐怖主義的發生。若想建一個和平而無暴行的真正秋克推多，真無異是癡人說夢。

恐怖主義的工具，即為我們在前面已經提過及的革命裁判所與特別委員會。除開為軍隊所殺傷的無數犧牲品以外，這兩個機關會幾煽起過很可怕的騷擾。特別委員會前後處決的人犯，雖無從調查其確數，至少當在幾千以上。一九一九年最少的數目已達六千餘人。據其他方面的推算當在此數之兩倍或三倍以上。此外尚有大批疲死獄中凍死囚牢的人犯，還沒有載入這個數目之內。

同情鮑爾塞維克的人，時常拿反對派芬蘭白黨巴爾梯貴族「沙」的海陸將校之殘暴，辯護自己的恐怖行爲。這真是笑話，難道我們能因爲人家也偷東西，就能證明我們自己的偷竊不如是犯罪的行爲麼？

鮑爾塞維克爲維持自己的統治權，不惜以人命爲草芥，在別一方面來看也許不算違背自己的原則。但是鮑爾塞維克素以人道主義相號召，根本就不能違反自己的立場，以人命爲芻狗。難道我們反抗這些貴族與其軍事走狗，不是因爲他們能賤視人命，以之作爲達到自己的統治權威的目的之手段麼？

自然有人要說，手段雖同，目的各異。爲達到崇高的目的，不妨使用統治階級，爲求達到卑鄙的目的所施的手段。爲目的不擇手段，究竟是不對的。祇有與目的相合的手段，才是合理的手段。違反原來目的的手段，不是值得尊崇的手段。我們不應犧牲生活的內容與目的，而求生存。同樣我們不能使用一種手段拋棄自己的原則。良好的目的，也許可以作爲原諒使用錯誤手段的人的理由。但是這種手段的本身，仍須加以不客氣的攻擊，且視其損害之程度，決定攻擊力的強弱。

但是鮑爾塞維克恐怖主義的目的，也非沒有令人可以非難的地方。他的重要任務，是在維持鮑爾塞維克樹立的軍事政治機關，特別是要檢查制止這些機關腐敗的現象。

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一日杜開斯基教授(Rof Dukelski)在真理(Prawda)報上發表一封公開的信，要求共產黨與政府機關淘汰一切附和共產黨的盲從份子，強盜土匪，與地痞流氓，以便預先制止他們犯罪的企圖。列寧在答覆杜開斯基的回信裏說：

杜開斯基教授，要求我們共產黨淘汰黨內的流氓與盜匪，完全是一個正當的要求。我們早已把這件事當作我們刻不容緩應當執行的事。我們早已鎗斃了許多流氓與盜匪，我們還須繼續鎗斃他們。然而要怎迅速地澈底地肅清這種份子，我們須要主持正義的與無黨派色彩

的智識界的援助」。

鎗斃——變成了共產政府的哲理之A與O。然而列寧不是要求知識界的援助，反對流氓盜匪麼？當然，知識階級能夠援助共產黨的方法，惟有利用輿論上的自由。但是這個自由權，又被他們剝奪了。制裁流氓與盜匪祇有靠自由輿論的監督方可以生效。輿論不自由的結果，隨時可以養成一般流氓與盜匪，使其有混入一個不受輿論監督的政府的機會。

然而俄國的報紙，至今仍在政府機關掌握之中。而政府機關內面，又充滿了流氓盜匪一類的人物。在這種情形之下，誰又敢保障流氓與盜匪不混入革命法庭與特別委員之內，利用這些機關的力量，鎗斃「主持正義與無黨派成見的知識界」咧？

偏偏這個防止腐化的機關特別委員會，具有絕對之權威，完全不受任何方面之監督。所以這些機關在最有利於腐化的條件之下，開始工作。一七九三年的革命特別法庭，已經握有不可思議的權威，被人告發的嫌疑犯，絕少法律上的保障。幸而審判公開，還有受社會輿論的監督的可能，但是蘇維埃共和國的特別委員會，處理案件，絕對保守秘密，以致政治上的嫌疑犯，簡直沒有法律的保障。有時不但提訊證人，就連犯人也加以審問。祇要有人告發，或有些微嫌疑，即可執行處決。

這種不幸的情景擴延到這樣的地步，終非取消不可。於是蘇維埃政府規定特別委員會不得於未審問判決之前，執行鎗決犯人。但是這種專制是與狄克推多制度混而爲一的，所以狄克推多存在一天，這種專制即隨之而存在一日。加之同一的條例又添上一條例外，對於所謂公開的反革命的叛亂，何可自由行動。於是前條規定効力幾等於零，爲隨便鎗斃犯人之行爲，又大開方便之門了。即使嚴格執行這種條例，也祇是與流氓盜匪增加一層保障，不能護衛那些「主持正義的無黨派成見的知識界。」他們要求淘汰政府機關內部的流氓盜匪，誰又敢於擔保這種肅清流氓的主張，不被人視爲「反革命」咧？

凡稍有不滿意的表示，即以處治強盜的嚴厲手段對待之。而這種脅迫並不以其反對作用而相觸。因爲在一點上真誠的共產黨人與盜匪流氓有同一的利益。他們對於蘇維埃所下的批評，是一致反對的，要想他們的手段溫和一點，那是絕不可能的事。

一九一九年的初期，全俄鎮壓反革命特別委員，發表一個佈告，內容如下：

許多次的騷擾在最近期內爆發出來證明克拉克司洛夫 Knassnoff 的 Lorbeerin 與社會革命黨左翼以及少數派左翼，也不能安分守己。

他們的活動，完全在煽動我們的軍隊，「Brjansk Slanena, Smolensk」破壞我們的實業

，[Pa ragnad, Tula]擾亂我們的交通與糧食運輸。「鐵道罷工」

全俄特別委員會於此鄭重聲明：對於克拉西洛夫的白衛軍，與少數派左翼社會革命黨左翼的白衛軍，均一律看待，不加區別。

全俄特別委員會將以同樣嚴厲的手腕，懲罰反革命的叛亂，不稍寬縱。

那些被我們捕拿的社會革命黨人與少數派黨人吾將暫以俘虜視之，他們的命運全視這兩黨之行爲而決定。

全俄特別委員會主席德秦司克 F, Derschitski]

由是看來，因爲鮑爾塞維克的軍隊，露出瓦解的象徵，實業界工人與鐵道工人不滿的空氣有潛滋暗長之勢，於是凡非屬於鮑爾塞維克的社會黨領袖份子皆被捕下獄，以便無產階級的反抗再度發生的時候，即可任意鎗殺社會黨人。

鎮壓不滿意的無產階級！——這就是使今日在俄國橫行的屠殺手段神聖化的高尙目的。蓋欲使多數派不致因經濟上的失敗，形成政治上的失敗。

這種政策的結果，祇能使俄國的民衆對於鮑爾塞維克的失敗，不能如巴黎無產階級對於第二巴黎公社的失敗，抱同樣的態度。但能如俄國的民衆將如一七九四年法國的民衆慶祝羅

伯士比的失敗，一樣慶祝鮑爾塞維克的失敗，故幸得從嚴重壓迫之下解放出來絲毫不感憤怒的痛苦。

G 蘇維埃共和國的將來

列甯所建立的政府，行將與一七九三年的恐怖政府一樣遭受同一失敗的命運，乃是可以斷言的也許結局有點不同罷了。歷史的事實，不易重複。若是一個政府的目的在現存的環境之下無法可以達到之時，必遭失敗，但失敗的途徑可以有兩種不同的方式。他若緊守原來的政綱，一絲不變、終將被人推翻。他若參照環境，修改或放棄原有的政綱，或可維持政府的生存。但在事實上前後二者失敗的方式雖然不同，而其同為失敗則一。然而對於政府的人員卻有一個極大的分別。他們或仍掌握國家政權，或者在被人推翻在敵人憤怒之下，任其人宰割。

羅伯氏比的坍台，是在 Thermidor 九號，然非一切雅各賓派都與他遭受同一的命運。

且有許多雅各賓派，知道運用靈敏的頭腦，適應環境，反而提高了個人的地位。拿破崙自己就是屬於恐怖團一流的人物，而且與羅伯士比昆仲友誼甚篤。羅伯士比的姊妹馬利亞 "Mar

ia" 刺後說道：

「拿皇原是一個共和黨人，並且我要說他是一個山嶽黨人……他對於我長兄的崇拜，與我二兄的友誼，或者因為我自己不幸的命運引起了他的同情，使他為我備辦了三千六百法郎的養老年金。」

不祇個人可以變化，一個整個的黨，也可發生本質上的變化。用這種方式，有時可從搖動的地位危險的地步中從新鞏固起自己的聲望與權勢，並非絕不可能的事。共產主義在俄國試驗的失敗，遂使鮑爾塞維克變換了原有方向形成一個統治的政黨，繼續掌握俄國的政權。今日的鮑爾塞維克，已選擇這個途徑，在他們統治期內，已經知道模倣真正的實際政治家發展一種適應環境的高度技術。

鮑爾塞維克原來是極力主張以普通選舉平等投票權為基礎的國會制度的。但是這個國會制度一旦對於他們不便的時候，即刻被鮑爾塞維克取消了。他們原來是澈底主張廢止死刑的。他們今日反而樹立了一個嗜殺的政府。他們放棄國家德謨克拉西以後本是無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的熱烈擁護者，他們現在卻以個人的獨裁，壓倒了無產階級德謨克拉西。他們已經除了包丁制度，他們現在又恢復包丁制了。他們在掌握政權之初，原於粉碎舊式國家的官僚統治機關，認為他們的任務，現在卻以一個新式官僚統治機關，代替舊的了。他們以紊亂軍

隊的紀律，使軍隊瓦解，爲奪取政權之張本，他們現在又已建立了一個嚴格紀律化的軍隊。他們原來的目的，是要消滅階級的差別現在卻喚起了新的階級差別，形成一個居於無產階級之下的社會階級。使無產階級變成一個特權階級，而於無產階級之上，又發生一個收入甚大的新特權階級。他們原想在農村中付與貧農，政治上的權利，抑制自耕農富農的勢力，他們現在又允許富農也有選舉代表的權利了。他們起始想將一切私人資本悉行沒收，但在今日他們爲求美國資本家的援助，已將俄國地藏之一半，允許美國資本家開採了，並用盡各種方式歡迎外人的投資了。

法國軍事新聞記者蘭島氏 [Ludovic Naville] 曾於一九一九的初頭在泰晤士報上發表他與列寧氏的談話，列寧表示歡迎外資的意思。他說：

「我們願意提議承認繳付外債的利息，並且因爲缺乏其他的支付手段，主張以小麥煤油與各種的原料作爲支付的代價。祇要俄國的生產工作，能夠完全恢復原有的狀況，我們毫不懷疑，俄國將有許多剩餘的小麥與原料。我們也決定根據以外交手段從新審訂過的國際條約，允許列強的臣民，開發俄國的森林與鑛業，這自然是要以承認蘇維埃共和國的政府基礎爲先決條件。我們尤其很知道英國的日本的美國的資本家都樂於獲得這樣的讓與權。……」

一國要人的談話，雖非政府的正式文獻，不足以證明一國的政策，但是蘇維埃共和國的目的，吾人可從許多可靠的關於俄國情形的報告中，得着證明。列寧這番話的意思，證明人類對於生活的實在性，有強度的了解。而共產主義的計劃，更因為蘇維埃政府將俄國一塊土地，以八十年的長期，租讓外國資本家，延長其實現的時期了。

以共產主義作馬下解放俄國無產階級的手段，現在已經算是失敗了。現在的問題是：鮑爾塞維克政府設法遮蓋他們策略的破產繼續持下去咧？還是湧現一種敵視的力量，將這個政府推翻，以殘忍的手段，宣佈他們的破產咧？

我們希望前者見諸事實，能使鮑爾塞維克重行歸到馬克司進化論的觀點，知道革命事業，亦不能超越社會發展的自然道程。這樣或者可以減少無謂的痛苦，對於全世界的無產階級，更許有益。可惜歷史的推動，並不與吾人之希望相符合，又將奈何。

鮑爾塞維克的罪惡，就是不應當以獨裁式的政府，壓制真正的德謨克拉西。這種政府祇有一個意義：或者形成個人無限制的暴力統治，或者成爲一個有堅固組織之小團體的獨裁。

狄克推多與戰爭，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一班受了俄國時髦品的影響，表同情於狄克推多的思想之人，或可從俄國的狀態中觀察出來這個道理。可惜他們不肯思索到底，探求事

實的本質。狄克推多和戰爭一樣易於開始一旦政權在握一度開始之後。不能任意中斷了。於是此處祇有兩條出路可供選擇：或者奮鬥到底戰勝敵人，或者慘遭失敗。

俄國需要外國資本的援助，甚為急迫。但是俄國一天沒有合法的國會與輿論上的自由以前，外國資本就不容易到手。這並不是說這些資本家許是民主主義的理想家，他們曾經供給俄國帝制政府無數兆億的借款。但是他們對於革命政府的信用心，極其薄弱，假使這個政府不受輿論的批評或者缺乏大多數民衆作他的後盾，他們當然會懷疑這個政府的壽命。

但是蘇維埃政府是否與能否了解輿論自由與召集國民會議的重要，還是問題。

許多共產黨人都異口同聲，他們並不懷疑這兩件東西。——輿論自由與國民會議——然而爲什麼他們到如今還不允許言論自由呢？爲什麼他們嫌棄這個，可以增加他們道德力量的與增加民衆對於他們的信任心的手段呢？拉的克 Radek 在布哈林所著的 *Program der Romanisten* 「共產黨的計畫」一書的序言裏說道：

「考次基與其同志提出的革命之條件，以爲革命雖有向資產階級表示其意志的權利，但是革命必須允許輿論自由承認召集憲法會議的義務，使資產階級有伸訴的可能。這無異一個熟練的健訟家，提出這種有意義的要求，不在乎權利之取得，抽象點說，僅在乎控訴建到圓

滿的結果。但是革命的事業，原本是一種內戰，社會各階級互以大砲機關鎗，保障自己階級的利益，何暇作此豪爽的辯論，革命與其敵人絕無妥協之餘地。革命家必須將其敵人擊個粉碎，反革命方面亦復如是毫無徘徊遲疑之可能。所以兩方面均須明白承受人家的詬罵，說他們毫不顧及德國國會的議事日程。」[S, XXIII]

拉的克這樣替卑鄙的暴烈行動與反革命的殘酷作辯護人，假使我們拿著著者在以前幾更論及革命所說的話，比較一下，真足令人氣憤。

「社會革命是一個很長的社會進程，以打倒資本階級開始，以變更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構成一個共同勞動的社會告終。在任何一个國家之內這個進程將歷一代之久。這個時期即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時期。革命的無產階級，在這個專政的時期以內，必須用盡左手之力，鎮壓日謀死灰復燃的資產階級，利用自由的右手從事社會主義的建設工作。」[S, XVII]

由此看來革命與內戰初無二致。不知何謂饒恕，祇知互相仇殺，但是沒有永久的征服。因為照拉的克的話，這個社會革命的進程，「至少要歷一代之久」！

這種破壞性很大的內戰，以機關鎗與綠氣砲為武器，焚家劫舍，田廬皆墟，悲慘之狀，較之卅年戰爭有過之無不及。以致人口減少十分之一，生產源泉為之毀壞無餘。這樣叫做達

到社會主義之路，謀爲民衆創造「較高的生活的形式，」豈不令人悲憤呵！

這樣有「豐富理想」的社會革命觀念，必定不是「職業的好辯家」的社會革命觀念，確爲一職業的革命家的社會革命觀念，以武裝暴動視爲與革命有同一的意義，認定爲革命的成功由於民主的方式，不由於內戰的方式，革命就失却了原有的內容。

有一點卻是對的，革命的成功，祇有兩種可能性，不是德謨克拉西，就是內戰。取消這個方式，即須採用那種方式，絕無中立之餘地。除非這個國度裏的人民，盡是一些無希望的無感覺的蠢才，方不致因狄克推多而引起內戰。

所以祇有兩條出路，可供吾人之選擇：德謨克拉西與內戰任擇其一。若社會主義不能以民主的基礎在一國以內建設起來，換句話說，人民的大多數，對於社會主義猶持反對之態度。我們即可由此斷定社會主義的時期尙未成熟。而鮑爾塞維克的意見，則與我人相反。以爲社會主義的理想到處可以以狄克推多與內戰的手段，利用少數強制多數實現起來。

鮑爾塞維克主義，自知不爲大多數人民所同情，所以堅決地拒絕民主政治。他雖然保證不致因此而妨害革命的進行，我們卻由此了解鮑爾塞維克拒絕民主政治的理由。若是鮑爾塞維克相信有大數民衆作其後盾，即無須如此放棄民主政治了。假使有一個革命的集團做他的

後盾，既使他們認定以機關鎗與大砲爲武器的鬥爭，爲革命鬥爭的惟一方法，也將如一七九三年革命的巴黎人民一樣，毫不費力，進行革命的鬥爭。

但是不幸得很，鮑爾塞維克偏備缺乏一個這樣的革命集團做他的後盾。當鮑爾塞維克走進了政府機關之後，他們對於民衆工人兵士一大部分農民，已握有無上的威權。然而那時還沒有勇氣，用普通投票的方法，訴諸國民的公意。他們不於解散憲法會議之後，準備從新選舉，反而驅散憲法會議，建設狄克推多。

自此以後，反對鮑爾塞維克的聲浪，日高一日而鮑爾塞維克的信徒，亦如瘋狂之徒，打毀一切非官辦的報館，放逐社會主義的批評家於蘇俄國境之外，形成極端恐怖的政治。即此一端，已足證明反對鮑爾塞維克的空氣之濃厚了。

在這樣嚴重的情形之下，要想取消狄克推多恢復德謨克拉西，很少可能性。鮑爾塞維克準備與官僚專制軍國主義資本主義作各種可能的讓步，藉以維持其地位。但是要他們對於德謨克拉西作些微的讓步，即認爲是一種自殺的政策。然而祇有德謨克拉西，才可使俄國的經濟復興，文化復活，且可發展較高的生活形式，他們則置之不理。沒有德謨克拉西，俄國必定崩潰無疑。而鮑爾塞維克亦必以此而潰敗，這個結果，是可預先料到的。卻不一定要是

Thermidor 九號，但是我怕爲期已不遠了。

II 世界革命的將來

鮑爾塞維克是否能得最後的勝利，他們自己也無多大的把握。然而他們卻把一切的希望，放在「世界革命」這個救生的鐵錨上面。俄國人民若一旦停止他們是領導「世界革命」的優越民族這個夢理的時候，然後救世主的革命，必將湧現拯救俄國的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

但是世界革命作何解釋呢？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下解釋：一方面可以把世界革命認爲是社會主義的理想，同時普遍於無產階級的羣衆中間與劇烈的階級鬥爭，使社會主義形成一種世界的力量，時常支配一切國家的生活。另一方面也可照鮑爾塞維克的解釋：把世界革命認爲世界各國的無產階級，在最近期內奪取政權的爭鬥。——否則世界革命，不能拯救蘇維埃共和國的生產了！——建設蘇維埃的政體，剝奪非共產黨內的份子的政權，建設共產黨的獨裁，煽動全世界各國的內亂，歷一世而不衰的企圖。

鮑爾塞維克現在進行一種熱心的宣傳，謀世界革命——依後面一種解釋——的成功。但是鮑爾塞維克式的世界革命，我敢斷其必無成功的希望。既使倖而成功，將使西歐在世界革命另一種意義上感受莫大的危險。

因此宣傳世界革命的重要任務，在俄國鮑爾塞維克的意識中，就是煽動無產階級互尋仇讎了。

鮑爾塞維克的發生，原是俄國社會民主黨分裂的結果。所以他們於奪取政權之後極力壓迫其他的俄國社會黨。他們自始即以製造內戰爲維持政權的手段，且以分化其餘的社會黨，爲其維持政權的最後手段。——假使這些社會黨還是統一的整個的，鮑爾塞維克設有佔着優勢的時候，此即多數派組織「第三國際」的意義，以爲如此，可以使世界革命，抵於成功。

民主政治在西歐各國，不是像在俄國一樣，認爲昨天得來的東西，西歐的民主政治是經許多次大革命與幾百年奮鬥的結果，已經深入民衆的生活中間牢不可破了。要想在西歐各國剝奪一個較大的社會階級的政治權利，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法國的農民，是一個偉大的不容輕視的社會勢力，對於私產制度是素主擁護的，而法國與英國的資產階級，又爲慣於鬥爭的階級。但是俄國的無產階級的勢力，較之西歐的無產階級自然很弱，俄國的資產階級，亦軟弱無力這班資產階級在這些軍事統治的國家之內對於政府的態度，不是心懷卑怯的恐懼心，就存盲目的信用心。因此俄國的自由主義真正幼稚得可憐。一旦政府瓦解軍隊潰散無產階級將政權奪到手裏之後，這些從未參加過政治鬥爭的資產階級，自然驚惶無地，束手待斃，

祇得將大好河山拱手讓之敵人而已。

在西歐各國，不祇是下層階級因為幾百年的階級鬥爭，本身得着許多有益的教訓。即是上層階級也得着許多的經驗。他們不但獲得了下層階級的尊敬，並且熟練一種技術，知道在適當的時候對於下層階級的進攻，表示讓步藉以避免無謂的衝突。撒克遜諸國的資產階級，從古以來，即不需國家的常備軍隊可以支持自己，並且知道對於政府的壓迫對於無產階級的進攻祇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不容易為危險的境遇所震撼。

這些國家，都是此次世界大戰中戰勝的國家。他們的軍隊，亦非疲敝不堪完全解體的中歐諸國的軍隊與俄國軍隊可比。在東歐諸國軍隊，一旦解體的時候，不論兵士由那種階級出身，都是促成革命的要素。這種促成革命的偉大勢力，在戰勝的國家以內則完全缺乏同樣的現象。但是這種勢力，也可促成軟弱無力的革命黨派，得到政權太早，沒有完成建設的能力。——社會主義在這些國家，要想獲得政權須有充分的實力，在民主政治的範圍以內，制勝其他的黨派，絲毫沒有要反對民主政治的理由。這些國家內的無產階級，也不至於贊成那在實際上容易變成個人獨裁的狄克推多制替代民主政治。

法國的社會主義者當中，卻有一個時期，極表同表於鮑爾塞維克。但是這種同情心的出

發點，僅僅由於反對本國資本家，政府以暴方壓倒外國社會主義的政府之企圖。也許有人相信以爲鮑爾塞維克的策略，是很適宜於俄國的情形。他們從未想在法國施行同一的策略。然而布蘭葵派的遺傳，與蒲魯東的反巴力門主義，至今尙未完全滅絕。所以這兩個敵視政府的原素，互相攙祕，形成法國今日的工團主義無形中爲鮑爾塞維克留了一個基礎。

但是要想法國的，或者英美的無產階級完全爲鮑爾塞維克主義所感召，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事。鮑爾塞維克在這些國家內的發達，祇能促成無產階級在廣大的鬥爭場合裏面，喪失原有的統一性，引起劇烈的分化。所以共產黨的宣傳，不但不能促進世界革命的成功，反而危及世界革命的前途。

共產主義已經因爲他的分化策略，危及德國的革命的事業了。歐戰以前，德國社會民主黨是全世界最強大的社會黨，團結在一個單純的社會觀念基礎之上，並且經開始獲得大多數人民的同情。要是能夠使那些在中央黨旗幟之下的工人（*Partiische Arbeit*）齊集於社會民主黨旗幟之下社會民主黨即可佔有多數，而民主主義的鬥爭，——在普魯士選舉法的鬥爭——就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鬥爭。若是德國的無產階級能於當時奪得政權，一定可以發生很好的結果，因爲德國資本主義，已聚積了無窮的富萬，民衆的生活狀況已有改善的可能。

可是世界大戰的結果，又把德國的富萬推殘殆盡了！凡爾塞和約更使德國瀕於絕望的境地。無論實行那種生產制度，德國人民的生活，都沒有馬上改善的可能。而德國軍隊的崩潰與解體，雖然使德國社會民主黨獲得政權，却非是由於本身的力量之充實，全由於他的政敵之破產。並且這個時候，社會民主黨又因黨內分裂的現象，自己亦感覺無力了。

社會民主黨要相維持在朝黨的地位，就必須力求黨內的統一。我們希望這個當日的要求早日實現，從前召起黨內分裂之原因，亦隨大戰之停止而歸於消滅。

但是不幸，自從蘇維埃共和國成立以來，因為鮑爾塞維克的宣傳，要求我們放棄民主的基本，要求實行工人獨裁的政治組織，又在德國社會主義者當中，散播了分裂的種子。鮑爾塞維克為遮蓋他們拋棄那個與我們社會的黨不可分離的原則起見，他們停止稱呼自己為社會民主黨，而以共產黨自稱。顯然是想藉此表示自己是真正的的馬克司主義者。他們忘記了馬克司與恩格斯起草共產黨宣言是在一八四七年之末，幾個月以後，馬氏主刊「新萊茵新聞」即命名為「德謨克拉西之工具」，所以在馬克司與恩格斯的眼光中，共產主義為德謨克拉西，毫無衝突之處。

維克推多與德謨克拉西兩個原則的衝突，在德國不但引起社會民主黨分裂，為社會民主黨

與獨立社會民主黨兩黨，而且又湧現出來，第三黨——共產黨——這種衝突，時常使其餘的兩黨的政策，發生內部的暗潮與動搖。而獨立社會民主黨則發生極強度的傾向鮑爾塞維克的趨勢。而右派社會黨又因為反對這種趨勢，不惜遠離自己的目的，捲入反動的漩渦，與資產階級的政黨謀妥協。直到十一月革命的時候方才斷絕與資產階級政黨的關係，重行與獨立社會民主合作。可惜這祇是暫時的現象！

在德國與在西歐一樣建設「狄克推克」這個口號，不能形成一個真正的永久的包括全國的獨裁政體。德國人民的程度，早已超過了這個界線。任何一切建設狄克推多的陰謀，祇能有一時的結果，帶地方的性質。而狄克推多普遍之結果，必使全國政治經濟破產，促進反革命的軍事獨裁，使全國陷於反動的局面而後已。

但是這種軍事獨裁，亦不能維持長久，在今日的德國，任何違反工人利益的政府都無法存在反動軍隊在柏林的暴行與在門奧「München」釀成的恐怖，不但不能證明這是政府獨裁的權利，而且證明政府思想的軟弱，祇知採取極殘酷的報復手段，沒有領導國家的能力。而左派與右派傾向狄克推多的熱望，亦無法使之實現，一個真正的狄克推多制度。結果祇有使德國全國陷於無政府所狀態，經濟完全破產，一切生產事業陷於停頓而已。行見所有生活品

浪費罄盡，使吾人所謂創造「較高生活形式，」流入率獸食人的慘象而已。

一切建立狄克推多的陰謀，在猶未成爲事實以前，惟一的結果，不外增加民衆的殘忍心，製造恐怖的空氣，使政治上與經濟上的鬥爭愈趨猛烈，擴大無謂的犧牲，妨害積極的建設而已。

或許有人要說狄克推多祇是短期的現象，無需採用暴力可以實現。這真是可憐的幻想！在一個國家以內，社會上各階級，都已經有了政治上的覺悟，苦想一個推行狄克推多的政黨，不施行暴力，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事。無論這個政黨的目的怎樣和平，他的志願怎樣純潔，或者祇想利用狄克推多，獲得積極建設的能力，但是政權一旦到手之後，這個政黨除了施用暴力以外，恐別無途徑可循。

祇有德謨克拉西，才是避免暴力與達到積極建設的惟一途徑。

尤其謊謬的地方，莫過於在莫斯科舉行的第三國際大會所採納的議論，把巴力門與德謨克拉西的本質，認爲是資產階級的政治組織。在事實上巴力門與德謨克拉西，不過是政治組織的形式，可以因人民的程度與階級之分化而互異其內容。在一個議會裏頭資產階級的政黨若佔優勝這個議會當然就變成資產階級的政治組織，若是這些政黨根本無用，由他們所構成

的議會自然也無用處。若一旦社會黨佔於多數的議席。那末議會的面目。必將爲之完全一變。

現在又有人要說社會黨要想在議會中佔多數，就是施行極自由的不記名投票選舉制，也是不可能的。因爲資本家掌握輿論的機關，可以欺騙民衆，並有許多金錢可以賄買工人。那末我們就要反問，資本家既能以這種方式在大革命之後，收買工人，爲什麼不能用同樣的方法操縱工人評議會——蘇維埃——的選舉。

因爲資本家人的金錢勢力，對於無產階級的影響，就假定社會黨即在自由投票不記名投票的選舉制度之下，與夫工資勞動者人數的增加之後也不能在議會佔有多數席次，這種議論不啻宣布無產階級的破產。假使無產階級真正是一些這樣的可憐虫，無論施行何種政治組織，也無法保障他們的勝利了。

至於德國國會具有資產階級的性質，吾人不必歸咎鮑爾塞維克的宣傳。而大多數工人階級與獨立社會民主黨人，對於國會制度根本懷疑與缺少競爭選舉的興趣是須負責的。另一方面所謂信奉加特力教的工人，脫離資產階級的羈絆了，現在又因環境的影響，取消原意，從新服從資產階級的領導了。

若共產黨人認定德謨克拉西，是資產階級統治的工具。我們就必須如此回答他們：認爲民主政體與獨裁政體的變換之結果，不爲恢復以前的野蠻的霸權。根據歷史上的判斷，實行普通選舉的德謨克拉西，並非資產階級統治權的表示。資產階級在他們的革命時代，不論在英國在法國或在比利時……都是實行以財產爲標準之選舉法。所以普通選舉仍爲無產階級長期奮鬥的結果。但是共產黨人與其朋友們似乎忘記了這件明明白白的事實。若民主政治能以平等爲基礎的普通選舉爲其實現的方法，可使社會的階級鬥爭，由力的鬥爭，變爲智的鬥爭。然後在這種鬥爭的場合裏，祇有道德知識勝個敵人的階級，方可以制勝。所以德謨克拉西，是實現社會主義的惟一策略，提高文明人類的較高之生活形式的惟一方法，而狄克推多祇能引社會主義走入亞細亞式的社會主義路上去。這種命名，還是不大妥當，因爲亞細亞是孔子與釋迦牟尼的誕生地，我們最好把這種社會主義，叫做韃靼式的社會主義。

德國的工人階級，所以不能由勝利的鬥爭中，獲得本身的利益，並且不了解充分運用德謨克拉西，作爲解放自己的工具之原因，世界大戰的影響，自然要負主要的責任。但是大部分還須歸咎於共產的分化作用，折散了無產階級的力量，使之參加投機事業的活動。

西歐各國與美國的民主政治，爲社會主義的前途創造了較大的希望。在這些國家以內，

經濟方面並未受過戰事上不好的影響，無產階級的一點一滴之進步都可促成生活條件的改善，產生「較高」的生活形式。

同時無產階級反抗資產社會的鬥爭，在英美諸國，比較大戰以前，日呈強烈之象。而當時支配人心的愛國熱，雖然在過去產生了此次世界的大戰，與促成協約國的勝利，但是現在也迅速地沈靜下去了。

當無產階級認識了自身的力量非常的增加以後，無產階級的反抗手段必定日趨激烈。而德國與俄國革命的影響，更將如火山爆發一般，震動全世界的無產階級。

無論我們對於鮑爾塞維克的策略，抱若何的態度。然而一個無產階級的政府，居然能夠在一個龐大的國家之內獲得政權，而且也能在極困難的環境之下維持其生存以至今日，使全世界的無產階級為之非常奮發這一事實，是不可一概抹殺的。鮑爾塞維克對於世界革命的功績，就在這一點。至於他派赴各地的間諜，對於世界革命的前途，却種下了不少的惡因呵！

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已經捲入了，革命運動的漩渦。而國際間的壓迫，又日見緊迫。吾人希望今後經濟的發展，不再蹈資本主義的覆轍，以便早日轉入社會主義的新途徑！

然後這次的世界大戰方可以說是資本主義墮落社會主義崛起的時期。我們決不夢想以一朝一夕之力，從資本主義跳到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不是一副機器，可以依吾人預先規定的計劃製造出來。而這副機器更非於一次開動之後，常常循着同樣的方式進行。他是一個長期的社會進化的過程，受一種社會法則的支配。但是這個法則的範圍以內，可以產生各色各樣的方式。至於發展的歷程，就非吾人今日所能預知了。

就是今日我們還沒有一個『由人民決議施行的固定的烏托邦。至於吾人目前的工作重在開放為發展社會主義必要的原素』使之有自由的發展。若是我們以這種工作認為即是世界革命的工作，那末世界革命的成功即在目前。但是世界革命的成功，絕不能靠狄克推多大砲與機關鎗……這些東西，必須以德謨克拉與人道的精神為具實現的方法。吾人以爲祇有如此，才可達到我們理想的生活，完成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

中華民國十七年七月初版

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 (全一冊)

每冊實價大洋八角

原著者 考茨基 Karl Kautsky

譯者 黃惠平

發行者 新時代叢書社

上海四馬路

世界書局

自來尼亞馬路

復旦書店

霞飛路霞飛坊十九號

新生命月刊社

各埠世界書局分局

各埠各大書坊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分售處